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輯

少年中國學會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說明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輯，原為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之一，於民國十四年三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銷行甚廣，風靡一時。嗣於民國十九年二月，以「宣傳國家主義」橫遭通令查禁，遂成絕版。茲特加景印，以示真理是非，久而益顯，非徒恃政治壓力所能統一思想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沈雲龍識於台北行都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集

本集凡得論文十七篇，散見於醒獅少年中國，中華教育界，新聞報，教育彙刊，新教育六種出版物，爲吾人年來鼓吹國家主義的文字之一部分。

吾人感於國內割據之形勢已成，外來之侵略方興未艾，而異說紛起，國民思想久已失其重心，非以國家主義齊一國人之心志，將無以挽此危局。

抑吾人非爲言論而言論，蓋將本此原則以應用於各種實際問題，而排去國際主義世界主義種種浮說，一以國家主義之精神貫徹今後之教育宗旨，尤爲吾人所願首先致力者。

世變方劇，自救之機會無多，邦人君子，倘有爲同聲之應者乎？是固吾人所祝禱者也。

十四，三，三編者。

醒獅歌

曾琦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試唱醒獅歌。亞洲大陸有一物，龐然高臥嵩山阿。當其醒時，百獸王，虎豹熊羆莫敢當。如今酣睡昏沉去，狐鼠縱橫戲其旁！歐風美雨向東來，亞洲門戶忽然開，排山倒海聲怒壯，棟折榱崩事可哀。此物驚醒自徘徊，一聲長嘯震山隈，黃毛倒豎千羊駭，黑眼圓睜萬馬奔。封豕長蛇齊斂跡，城狐社鼠自亡魂。嗟哉此物一何雄！以擬漢族將毋同？惟我黃帝昔開國，南征北伐有雄風。子孫不肖頻失地，未免無顏對祖宗。睡獅之說有由來，昨日亡遼今割台，昏然罔覺似心死，坐見侏儒長蓬萊。徐福之後竟忘本，凡有血氣誰能忍？報仇雪恥衆志同，世人齊說睡獅醒。睡獅醒兮百獸驚，醒獅睡兮萬類鳴。欲把睡獅齊喚醒，且聽尼山木鐸聲。

國家主義論文集目錄

- 一、釋國家主義……………李璜
- 二、國家主義正名……………李璜
- 三、國家主義之今昔觀……………陳逸凡講 吳俊升記
- 四、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陳啟天
- 五、國家主義答客難……………李璜
- （一）答無政府主義者
- （二）答共產主義者
- 六、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曾愚公
- 七、推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靈光
- 八、醒獅運動發端……………陳啟天
- 九、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曾琦
- 十、中國的國家抵抗及其步驟……………靈光

- 十一、教育建國論發微……………余家菊
- 十二、中國教育宗旨問題……………陳啟天
- 十三、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吳俊升
- 十四、再譚國家主義的教育……………李璜
- 十五、國家主義與教育……………陳啟天
- 十六、國家教育政策發端……………陳啟天
- 十七、國家主義與國民教育的改造……………陳啟天

國家主義論文集

釋國家主義

李璜

(一) 國家主義的真意義

請先言國家 (La nation)。國家是甚麼？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權；而此人民本其自愛的心情和其生活的條件，此土地也，不容人侵奪，此主權也，不容人干犯；有前人時時締造的艱難，即有後人世世保守的責任，有一種特殊文化的貽留，即有一種相當感情的回顧；因而國家不獨有其實質，又復具有其靈魂。

中國人有這樣的國家觀念沒有呢？曰有。就常識言之，中國人如果沒有這樣的國家觀念，又何必反對歐美人來在中國開發富源？同是世界的土地，讓世界上的人來開發，又有甚麼不好，而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必一致起而反抗之，可見中國人未嘗不知有國家。

然則中國人便能說都有了國家主義 (Le nationalisme) 嗎？曰未能。主義者有一定明瞭的意識，不徒恃盲目激刺的感情。社會學家曾在社會的趨向上面分出兩種狀態：一種是含混的狀態 (état flous) 一種是意識的狀態 (état conscient)。在含混的狀態之下，趨向雖似乎一致，然而彼此善惡的判斷既不一樣的明確，彼此所標的對象便有遠近之差，彼此所具的分兩便有輕重之別，因而說法便多端，感情便散漫，而動作起來便減却了多少的力量。所以主張國家主義的人便是要將這種含混狀態的國家觀念，加以明確的解釋，誘進之使為意

識狀態的。

本來一種對於社會上的主張都是根於這種含混的社會心情，這種社會心情，又本乎這個社會的歷史，換言之，即其自身的組織與其所處的境地。因此一種主義并不是少數人可以不問社會情形，隨意杜撰，隨意移植的。歷史不同，境地兩樣，心情便異。徒有主張，不能共喻，不能相生，便不能同往。譬如在從前中國還不知有外國而以國爲天下的時候，便來提倡國家主義，或是今日中國還沒有大實業而未成資本制度的時候，便來提倡集產主義，都是一樣的違反了這個不可抗的事理。主張國家主義的中國人也無非是認定在社會的進化程途中間，此時具有這樣的組織，處在這樣境地的中國有國家主義的要求與必要，因又從而長養之罷了。這種主張是應乎時勢而生，是一點不用勉強手段的。

然則國家主義的要求是些甚麼？我們上面說過國家主義并不是少數人的杜撰，則其產生與其意義，自有他的事實的根據和歷史的背景。請略述之。

原來國家的存在雖已是很早的事，而國家主義的發生不過近百餘年的事。這是因爲拿破崙要想征服世界，已經將許多國家用兵力壓制在他的威權之下。於是被壓迫的國家便由於這種境地生出一「國性」(Nationality)的問題。受拿破崙之威迫最甚者爲德意志與西班牙，於是德意志與西班牙對於這個「國性」的要求也最烈。於是一「國性」的學理便一時流行於政治界，全歐各國家隨着這個學理而有趨於改造的現象。

「國性」乃是國家的人格。每個國家從其靜的 (Static)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種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

自其動的 (Dynamique)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特殊，信仰之特殊。於是每個國家所有的國民其生活的志願便不能盡同於其他一個國家的國民。本着這個特殊的生活志願，便發現特殊的生活狀態。因此由內而外，皆認識得一個羣體的自我 (Le moi collectif)。這便是國家人格的構成與表現。每個國民在性情與行為上皆具有其國的國格。我們偶一接觸英、法、德、日等國人，便分別出他們各國的人性情不同，思想兩樣。我們可以一指出他們不同的特點來。這些特點便是國民的樣範 (Les types nationaux)。法國國民有法國國民的樣範，英國國民有英國國民的樣範。未有一國國民的人格不表現出他的特別的樣範。明白言之，這種每個國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這種國家人格的縮小便是每個國民的人格。所以國家人格受了損失的時候，國民人格便立刻感覺得受了損失。全靠這小己與大眾的情感意志相黏着，相影響之力，便成功國家的意識 (Le conscience nationale) 和國民的靈魂 (l'âme du peuple)。

國性問題及其學理便基於這個國家意識和國民靈魂。在拿破侖威力最盛時代，在被壓迫的國家裏，大事活動起來，對內喚起國民的精神，對外要求民族的獨立。拿破侖雖挾雷霆萬鈞之力，而終莫可如何。但是這個國家意識，國性問題的顯著，一半雖由於拿破侖壓迫，一半還與當時文化的程度與交通的發達有關係，然後方才真正認識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嚴格對於這一點最看得清楚：『一文化愈進步，社會意識愈明瞭，由回想的生活而方了然於彼此權界之義。個人與個人，社會與社會間方顯出了自由的人格。野蠻人是隨乎習性的生活，只知服從強力，施用強力，而不知主張其相當的權利的。』(見法國社會學年報第四卷第一四一頁)

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諸文明國家既已有了明瞭的國家的這個社會生活，而交通發達，一國內的人接觸頻繁，而與他國人接觸亦頻繁，因此此十分認識了本國人，更漸漸認識了別國人。於是黑格爾所謂的一國國民共有的「志願的統系」(Le système de volonté)便自然發生。這種「志願的統系」既成了一國國民的「智識的本體」(l'essence intelligible)，所以萬萬受不得外國的無理壓迫，而要全國共起，以謀抵抗。因為有了這回抵抗，志願愈堅，團結愈緊，因此拿破侖之壓迫便恰恰足以助成國性的伸張，民族的獨立。隨着拿破侖之敗，「國性」的要求便在歷史事實上大大發展起來。最著名的如一八一五年日爾曼聯邦之成立，一八二七年希臘由各國承認而獨立，一八五六年加富爾之再造意大利，一八六三年鑷刀黨之要求新波蘭，皆本這個「國性」的主張。既然這種主張深合乎事理民情，而又有德意等國的大成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勢不可遏，傳遍全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隨之而起。十九世紀中間，以國家主義相號召相集合的政黨，便不斷的成立於各弱小國家中：愛爾蘭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英倫而要求獨立，捷克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奧國而要求獨立，波蘭國家主義黨專設於全歐而為獨立的運動，土耳其青年黨也同此意義。——這四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在今次大戰後都成了功：波蘭，捷克，土耳其均已復國獨立，愛爾蘭雖未能完全獨立，但已得着相當的自由，不過愛爾蘭國家主義黨不能滿意，而尚在極力運動中。

法國在一八七〇年大敗於普魯士，受了城下之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也張大起來。一起首便由他們教育家出來主張以國家為前提的教育方針，風行全國。後來因為得來非事件 (Tallaire Dreyfus) 發現了有

人賣國，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出來專反對外國人在法國國內的勢力，而尤其注意於猶太人的行爲。後來雖發現得來非賣國事件不確，而此黨仍舊成立，以至於一九一四年，歐戰開了的時候，便由此黨出來主張，不分黨派，一致對德，於是有右黨的以國家爲前提的聯合（*Union nationale*）與共和派以國家爲前提的合作（*Cartel nationale démocratique*）其宣言均以一致反抗德兵侵凌與保障法國領土主權爲言。

戰後德國因受凡爾賽條約之壓迫及英法兵之久占其領土，感受痛苦甚深，於是以國家主義相號召的政黨復盛於其國中，但分兩派：一派以舊日軍官爲首領，力主報仇雪恥，法人呼之爲急進國家主義黨（*Parti ultra-nationaliste*）；一派以文學者及政治家爲首領，以抵抗外力，重興德國爲務，這後一黨要算是現在德國政治界最占勢力的了。

國家主義的發生及其政黨的成立略如上述，本着這些歷史的事實和國家主義者共有的要求，而國家主義的定義遂如下式的發現於辭典字典中：

國家主義乃是對於其所屬的國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願（*La préférence déterminée pour ce qui est propre à la nation à laquelle elle appartient*）。

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要求（*la revendications politiques des nationalités opprimées*）

國家主義乃是疾視一切所有不以國家的舊信仰爲根本的學說（*Qui considère comme mauvaise toute doctrine dont le fondement n'est pas la tradition nationale*）

國家主義乃是反乎國際主義而言 (ils' oppose à l'internationalisme) —— (以上定義皆見法國辭典 Nouveau Larousse 與 Larousse universel 中)

國家主義乃是一國國民對於其國所特有的一定志願，國家主義乃是被壓的國性的政治要求，此二要義已經在前面略為解釋。至於國家主義何以疾視一切不以國家舊信仰為根本的學說？何以反乎國際主義而言？下節當釋之甚詳。我們還願再在這里對於「國性」問題繼續說幾句話，因為集產主義的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本他們的經濟史觀，無政府主義的蒲魯東和克魯泡特金本他們調劑生產力的說法，都在在否認這個「國性」的存在，我們不能不將他們的說法略為評判一下，以便兩相對照更表現國家主義的真意義。

我們知道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專是從經濟方面着眼來解釋社會現象的。他很足以表示出他們的意思的兩個字，就是社會的信仰，組織法制等均是一空虛的間架 (Superstructure) 惟有經濟纔是「實在的間架」 (Infrastructure) 也是從生產力 (Forces productives) 來的，這個力又是從平民階級來的，因此他們只見着階級的利益纔是真的，國的利益乃是假的。主張和實行國家主義，無非是某一階級欲藉此說以擁護他那個階級的利益罷了。譬如馬克斯解釋德國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十年的建國運動，便完全以為這是德國資本階級主張他的階級利益的運動。他以為其所謂「國性」乃是一種「階級的國性」 (Nationalité de classe) 這種資本階級的國性的要求，是平民階級對之不能生出感情，而所不願意參加的 (大意見 Charles Audier 的 Commentair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 P. 69)

蒲魯東雖然主張無政府主義而與馬克斯異其旗幟，但他也是特別注重經濟生產力，他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認國性的成立在在足以蹂躪生產力，妨害生產力，他要把這個國的範圍除去，然後纔能得世界經濟生產力的平均。因此他在書中特別加上一章，叫作「反對國性的原理」(Contre le principe des nationalités)。他爲擁護他那個超國界的生產力平均的說法，他簡直承認維也納條約宰割弱小都是對的，因爲足以平均一部分生產力。他甚至說波蘭既已表現無能力再生活下去，便該當讓別人來開發以平均生產力，不該當再要求獨立生活了。(見原書 1.320-324)

克魯包特金要比蒲魯東的主張溫和一些，他在一個反抗者的話 (Les Paroles à un revolté) 上面說明國與國爭純由經濟使然。普法之戰便是柏林銀市與巴黎銀市的戰爭。照他的意思，只要這個國與國的經濟糾爭一旦解除，則國與國便不會再有戰爭，於是也就無分國與國的界限的必要了。

馬克思與蒲魯東，他們倆對於取消「國性」的目的雖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倆皆純從經濟方面着眼却是一樣的。我們一到眼，便可以覺着他們以經濟史觀，唯物觀念來解釋國性，否認國性的說法過於簡單。所以他們的結論便都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的地步：一個說國性是資本階級的，平民對之不會生出什麼感情，而且是他不該當要的。一個說國性原理根本不能成立而且有害，因此波蘭便不該當再要求獨立了。天下事那有這樣簡單的道理！最可怪者！馬克斯蒲魯東都是根本主張自由與正誼的人，個人的自由正誼，階級的自由正誼便千真萬真，一個人與階級受了壓迫與侵凌便能生出「不平則鳴」的情戚，而一個國家受了壓迫與侵凌，便不能生出

要求獨立的情感。這未免有些不合邏輯的道理！因此關於「反對愛國情感」一義，就是馬克斯的門徒也覺不能始終主張。意大利一個信奉馬克斯學說的健者拉卜里約拉（Labriola）便在他那本論加爾倫馬克斯書中指出：一國家要求獨立的需要與一階級要求獨立的需要是根於一樣的情感的。他書中最明瞭的話是：如果反對愛國情感這一派（Antipatriotisme）一定要堅持到底，引中到頭，他會一直的自家弄得否認了他本意所欲增護的「階級戰爭」。因為階級獨立的需要，其自身也是基於一種情感的事實。如果誰覺得國家要求獨立這種情感，不合邏輯，那嗎便該當覺得階級的要求獨立這種情感，也一樣的不合邏輯。（見原書法文譯本，211）

況且我們前面曾經說過國家所以能够成立的要素不獨在經濟所需的實質，特別在歷史所付的靈魂。德謨特（De Motu）說得好：一個民族的「國性」的成立是基於他的過去的回憶的；這種回憶並且是全民族無分階級，都一樣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刺激便同時一齊感覺得不安：一個國家被了侵凌而全國國民都要起來抵抗，便全靠這個共同回憶而發的情感，絕不是只靠利益的觀念。不然，何以馬克斯本人平時只知有階級利益，不知有國家利益，而到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要開的時候，當時德國國內空氣特別緊張，他這些輕視情感的人也動了感情，發出第一個宣言，承認「德國有自衛之權，因為他被人侵犯了。」戰爭開了，空氣平靜一點，馬克斯才變了論調，發出第二個宣言，勸兩國平民要停止戰爭。但是完全不生效力，德國工人既不斷的打着馬克斯所謂「自衛」的旗子上前敵去，而法國「巴黎工人國際聯合會」也都到前線去打衝鋒去了！（詳見C）

Guyau 著 *Le Message des section francaises de l'Internationale après Sedan* 馬克斯兩個宣言文見 Charles Longuet 譯本 *La Commune de Paris* 中)

馬克斯這個失敗，不但足以證明國性的學理不單是爲的經濟利益，而且足以見得平民不只有爭麵包的問題，不然，爲什麼在巴黎工人國際聯合會爲主任幹事平日那樣主張得起勁——馬克斯很誇獎他們——而德兵一入法境他們便忍不住的要去效死呢？這就是因爲工人對於國家還是一樣的有共同的回憶：無論何人，他的人格絕不只受經濟生活的支配，他有社會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則一國亡了，豈能說那一國內的平民便無所損失嗎？至少他們精神上，感情上之不安與其他階級的國民是一樣的。

國家主義的真意既不只是建立在經濟上，則純從經濟方面着眼絕不足以說明國性，純從精神方面下手，絕不足以破壞國性。此所以共產主義自馬克斯以來日日欲將他們的一階級戰爭，做到超國家的地位而至今未能！

(二) 國家主義的真精神

我於前篇已略說過，國家主義乃是基於一國國民所共有的志願，則國家主義的精神所在，已略可見。茲篇願進而細細的闡明此特有的精神：

唯物史觀的集產主義以爲社會只受經濟條件的支配，人生只重物質欲望的要求，換言之，只要大家肚皮一裝飽，則萬事如意，天下太平。無政府主義也對於他的理想偏於經濟方面的解釋，以爲只要做到「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的地位，便算滿足了人生的理想。集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都未免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生活看得太機械了！人類不只是一個飢了要食，渴了要飲的機體，他還有喜怒哀樂愛惡這一些情感，明白言之，他不但有物質的生活，而且精神上的生活還更重要一些。孟子把這個意思說得最清楚。他道：『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所以我們常以爲中國儒家所說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道理不是講唯物史觀的人所能了解得到的。人生不是死板的，隨着環境與習性得過且過便算了，他時時都有一種願欲，一個要求。所謂「一生之欲求」(Vondra-Virtu)是繼長增高，無時或已，而且精神上的欲求比物質上的欲求還急迫得多！一個人精神上無所系屬或有所需要，往往雖有美食，不能下咽，雖有華屋，不能安寢，因此食前方丈，席豐履厚的人常常憂慕坐樹蔭下吃黑麵包的人之樂爲不可及；人生苦樂的懸殊或大半在此面不在彼咧！

執此義以推理，然後舉凡精神上的事物，倫理上的主張便有了他的真實的根據地，而爲經濟史觀的論調所不能動搖得到。試略舉一個實證來說：

歐洲人的物質生活總比中國人豐富多了，歐洲一個工人每日的享用遠過於中國的縉紳。以歐洲人比較中國人，真可謂特別有生之可樂，該當是特別惜死之可悲了！然而每逢國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則歐洲人無論英、法、德、意那一國的國民皆不能一日安於故常，很規律而且熨貼的一日三餐，很溫柔而且美麗的少妻稚子，沙發椅何等的舒適，比雅樂何等的悅耳，皆一旦捨去而不顧，置身戰壕，飽受炮彈，十人而九死，懷唯物思想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必定很詫異道：何苦來！何苦來！無以爲解釋，則仍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而推論此不過

由於少數精神階級欲保全其私利，或圖謀其榮名而假執政的權威以驅衆人於死域而已。定說在事實上不可通的地方，即是歐洲習於爲國而死的國民皆係採的徵兵制度，人人須當兵而上前線；戰爭一開，精神亦不能倖倖免死。死既不能免，私利又於何有？假使人生只重物欲如唯物主義者所言，則物質上最能滿足之歐洲精神絕不打這樣蠢的算盤。即使少數將算盤偶然打錯，多數又何以如此其信從之？前仆後繼，父促其子，兄促其弟，「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詩人史家哀惋之辭，毫無所動於胸中，是何所爲而然？是不能不說本國家主義而爲犧牲者有精神上的要求的原故。

我們既不能不承認這種愛國精神的存在，於是更進而解析這種精神，說明這種精神。

解析精神上的事物，在一些哲學家眼裏看得很神秘。他們以爲凡屬心理尤其是感情的現象，便不能解析而且難於說明。他們便付給一些神秘性在精神生活上面，使他變成好像不可捉摸的東西——便有時因此引起唯物思想的一種反感，而遂生出唯物方面的解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中間交替那一百年的哲學思想，便是神秘派惹起唯物派的反響，而唯物主義特別反精神主義（*anti-spiritualism*）以自張其軍。

近今一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對於解析精神上的事物又另有其蹊徑。他們應用生物學上的環境說，遺傳說，感應說，將精神生活的來源大半歸之於外界的陶鎔和社會的影響。譬如說愛國，則近今一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大半說因爲一個社會裏衆人都愛國，潮流所及所以一個人便不能不愛國。并且既有了國的生活，受着許多這種生活上的激勵，所以愛國心便隨着這種國的生活爲相對的發展。

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這種說法當然比一些哲學家那種神秘態度高明多了。他們究竟給我們一個解答，而且這個解答將我們生活實況的各方面都顧到了。不過他們不能使我們十分滿意的便是這「愛」的源頭他們終沒有捉住。他們說衆人都愛，所以一個人不能不受這種潮流。那嗎，這種愛在他們看來，似乎有些被動和勉强的意思。說他被動和勉強本來未始不可，因為玄學上的「一個人自由選擇」(libre arbitre)一義本來是難迴的事，不過愛的趨向雖不能不與外界生活生密切關係，而愛的本體（或稱良能）終有他的獨立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們談感情生活，在在不能離却人的天性說話。認識了天性上本有這種愛，則愛國、愛鄉或愛人方有真實的源頭，而不是虛浮的。於是方了然我們愛國并不是隨聲附和或有意鋪張，是本乎天良而又緣於實際，有不得不然的意。

孟子最能形容出人之天性，他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他在前面更設證道：「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這一些話是本於孔子在中庸上所說的「天命之謂性」，性就是喜怒哀樂。我們每個人本着這羞惡是非喜怒哀樂的天性，所以一出世來便有愛和惡這兩種相反的情感——或者說有所愛便有所惡，有所惡便有所愛；甚至愛之便欲其生，惡之便欲其死，也是人之常情。

孩提之童何以便莫不知愛其親者，因為他既本着赤子之心，而出世以來便受着他雙親的保育、衛護之、撫養

之，使他能暢其所以生，但是，一人不只靠父母的恩惠便可以長得成人，出世以來靠社會的恩惠也很多，并且社會愈進化，一個人依賴社會方面的幫助更重要而繁多；野蠻人不靠社會大家的幫助去抵抗食人的猛獸和嗜殺的鄰居，一個或一家的野蠻人便早被猛獸食了或被其他部落的人殘殺了去。所以野蠻人時時受着他們部落保護的恩惠便很愛護他們的部落；他們部落中的一個人被外人殺了，全部落的人都要爲他報仇的。因爲能够這樣，他們全部落的生活纔會繁榮，纔不會爲猛獸或殘鄰所隨意蹂躪。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常說「野蠻時代只知有部落，不知有個人」，這個話是真的。因爲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個人也就隨着部落早消滅了去了。部落進化便成功市府。上古希臘人那樣愛護他們的市府，殺身保有之，悉心粉飾之，今日只餘一磚、一石、一歌、一事，還令許多文人遊客發思古之幽情，詠嘆之不置！市府進化而成功今日的國家。國家雖比部落和市府擴大得多，文明得多，但是其所以成功爲社會的意義是一樣的。有了這個社會，個人的能力便不單弱，便不容易被外界摧殘，可以相保共存，力圖向上的發展；有了這個社會，個人的活動便有所依據，分功勞，作有相當的場合，有選擇的範圍；尤其是有了這個社會，便可以將先人的恩惠流傳下去，個人的精神纔有所依歸。所以國家這個字在精神上言之又稱爲祖國（La patrie）。祖國這個祖字便是表示依戀之意，所謂安身立命之地是也。

試想一個國民自從呱呱墮地以來，受着國家的澤惠（Le patrimoine）是如何的大！無論穿衣、吃飯、說話、睡覺、讀書、一舉一動，皆要靠國家所有的制度爲之規定，文化爲之導引，文物使之享受，信仰使之依歸。這些都是祖宗歷世屢代，經過若干的艱難，費了無窮的心血，然後纔給出這種種方便與後人。因此，無論生在何種文明國家的

國民，如果自謂有生以來未曾受着這個國家文明之賜，則真未免有些忘恩！主張馬克斯之說者動輒說：『平民不有國家寸土，便不受着國家的澤惠，於是便不該當愛他的祖國。』我們要問：『一國平民穿衣、吃飯、說話、作工等，等能逃出其國的習俗麼？這個習俗究竟與他有益與否？如果一個國民真不要受着他的國家的澤惠，則不該去應用通行一國的語言以表示他的意思，通用一國的工具以完滿他的工作，他該當自己去發明，既不能單獨發明，單獨生存，而事事皆必與國家這個社會的習俗相融，則個人之爲個人，焉能認爲是赤裸裸的，而與社會無因緣，而鄙習俗爲無用！要知這些習俗自其靜的方面言之便是制度，自其動的方面言之便是文化，自其實質方面言之便是文物，自其精神方面言之便是信仰。制度、文物、文化、信仰種種皆是一國家的民族性的結晶。既生在一個國家裏，便無法逃脫這個民族性，既無法逃脫這個民族性，則一個國民的精神在在都含有他祖國所積累，同族所共有的那種精神。因此我們所以在理論與事實方面都能够得祖國的靈魂便是國民的靈魂。祖國一旦失了面子，國民精神便要立刻不安起來；祖國亡了，國民便要喪魂失魄，無所依歸，萬劫千磨，都非得國命重光，國魂恢復而他的精神纔得安寧。請看猶太人亡了國幾千年，宗廟已化爲邱墟，而年年從歐美往東方哭祭於耶路沙冷荒煙亂草中的猶太人，尙至今不已！又看滿清馴服漢族至二百餘年之久，到了末年，只要幾個書生出來不惜頭顱，登高一呼，而全國響應，不數月便推倒滿清，這是何等的神速！這些往事都足以證出全國國民的精神自有一致的所在。本了這一致的精神，大家始有了共同的希望，本這種共同的希望，大家便有了共同的責任。這個責任便是共同保守祖宗之業而光大之。

責任便是良心上的承諾，所以是倫理上的第一義。一切倫理皆本於這個承諾：當父母的人對於他的兒女能本這個承諾而去盡教養的責任，便謂之慈親；當兒女的人對於他的父母能本這個承諾而去盡供奉的責任，便謂之孝子；當鄉邑的居民能本這個承諾而對於他的鄉里去盡保護的責任，便謂之義士；當一國的國民能本這個承諾而對於他的祖國去盡保護的責任，便謂之愛國男兒。原來道德是甚麼？能有所承諾，能盡其責任，而犧牲其一己之私利以爲人或爲社會耳！父母之慈，兒女之孝，義士之行，愛國之忱，皆在能犧牲與否而爲其道德之標準；真能愛國者即是真能犧牲其一己之私利以爲國家之公利，是爲國民道德之極致。反之，自命清高，只顧一身干淨，如中國式無政府主義的道德，便是國家主義的道德的仇敵。戰國策上趙威后問齊使曰：『烏林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諸侯不得臣，衆人不得友，何以至今不殺也？』陳仲子這一流人物看來好像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很好的人了。何以趙威后還要殺他？因爲假使衆人都學陳仲子，一個社會便要解體，便要消滅！一個社會之所以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關係而生出互助，利他，種種行爲以爲社會的樞紐。陳仲子要勉強除去了這個關係，不但是不合情理，而且足以消滅社會自然的生機。并且他這種絕對的個人主義的辦法也是很不能澈底的。陳仲子自以爲樂兄之室弗居，樂母之食弗食，干淨得了不得！其實他還是要靠他的老婆織麻布度日。井上的野李子只不過供得三個，那有那樣多的野李子來供給陳仲子一生咧！所以孟子譏諷得他最妙：『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者也。』陳仲子要想真正自由，一介不與，一介不取，除非他不要吃飯，去變蚯蚓。

陳仲子這種精神是正與國家主義的精神相反的。陳仲子這種道德，在國家主義者眼中看是，來非道德性的。

(immortal) 因為國家主義者深信「人爲社會的動物」這個原理。既然人是社會的，則該當處處顧到人的道德是含有社會性的。質言之，忘却了社會的一種倫理主張，便失了他的道德的價值了。道德的一個主要目的，本來在使一個社會有個相同的路子，本一種同樣的「價值判斷論」而全社會的行爲方纔有個重心，因之各自分離，足以破壞這個重心的倫理解釋便爲社會道德所不許。——其所以不取，還是因爲他忽略了社會性，而不能圓滿其理論與其行事的原故。——中國社會常常講究私德，在私德的行爲上本來還是含有社會性的，如像節儉安分等都是與社會有益的，不過推而至極，如像上面所說陳仲子的那種辦法，便不近情理了，便反有害社會了。中國有句俗話：『各人打掃門前雪。』各人打掃門前雪本來是好的，但大家只管門前的雪，絕對不過問街中的雪，結果各人門前雖掃得干淨，而街中間還是無路可走，可見這種絕對的只講私德，就是在一件小事上也，不能得圓滿的結果的。

我們在說明國家主義的真精神以後，而要略將個人道德與社會道德在這里比較其得失，因爲中國守着個人道德數千年，太固蔽了一些。國家主義的道德便是要將家族道德之義推而廣之：愛己愛家的精神本來不錯，不過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要其能安身立命，以保妻子，則非善推其恩以愛護國家不行。此所以國家主義的真精神爲今日中國國民所必具也。

(三) 國家主義的真趨向

我們抱着前面所說的那種明瞭意識，本着前面所說的那種根本精神，則國家主義的真趨向已不難引伸而

出就原則上言之，凡足以恢復或表現國家的人格，凡足以振起或團結國民的精神，凡足以發展或豐富國民的生計，則國家主義的政策當期不遺餘力以趨赴之。就事實方面言之，國家主義的政策亦不過在安內攘外而已。非安內不足以攘外，非攘外亦不足以安內，現在中國譚政治者已十分留意及之。但是內將如何去安，外將如何去攘，則說法多端，極不一致。在這異說紛紜中間，國家主義者願明白地宣布他的意見：要以國家爲出發點，則安內攘外，都纔有個明白的根據，明白的對象。對人對己都纔有個始終一致的態度，前後貫徹的精神。請在事實上略爲說明之。

茲先言攘外：

攘之義，卽屏之於門外之謂。齊桓公尊周室必攘夷狄。因夷狄侵入周室，非攘之則周室且不能安然存在，何能言尊。自尊者當不欺人，更當不受人欺。凡入我門來，我以禮遇之，處處讓步，而客乃目無主人，得寸進尺，大逞其野心，未幾欺人太甚。我如係自尊之主人，則必立屏之於門外。因此門內我有主權故也。本此自尊之心，與此主權之界，則凡侵我者欺我者皆在所必攘，毫無疑義。中國人盡力與歐美日本人周旋已幾十年了。始而譏我閉關，我則開關以納之。納入之後，客使不斷的侵略主人。既已鴉片毒藥害及我身體，又以天主耶穌害及我精神，以兵凌，以利誘，其惡不勝枚舉。我雖欲親之，其奈此客實在不可親！因爲此客自來便認此主人爲奴隸，身份與他不相等。我們雖想打親家，「齊大非偶」，這個親家實在打不成，還是照着子曰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我們要想免於侵略，只有求之在我。自堅其壁壘，自求其解決。國家主義的對外政策是不願依人爲活的。親日親英既所深惡，

親美親俄亦所不取。不但這種搖尾乞憐的態度有損國家的人格，并且乞憐一會，毫無效果。中國人也曾經上過當兒！總之外交之義，是彼來我往，受施相報。善遇我者我亦善遇之，利我者我亦利之，仇我者我亦仇之。此人與人間之誼義，何獨於民族國家間而不如是。

有人要說「弱國無外交」——中國許多媚洋人畏洋人的外交官失敗了便以此話卸責——我們要請他翻一翻十九世紀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歐洲的歷史。一八一五年，戰敗了的法蘭西還能有操縱維也納會議的達列朗 (Talleyrand) 一八五六年得統一的意大利全靠有氣魄有手腕的加富爾 (Cavour) 大戰失敗之德人至死抵抗，而有今日法人之讓步。四面被困的俄人拚命幹去，而有今日列強的承認。誰言「弱國無外交」！其所以無外交，實在是無有手腕有氣魄的外交人才，無富理想能犧牲的勇敢國民以與強者相抗而已。強者既有意凌我，安心害人，則除拚命抵抗以外，還有何種辦法？始終捨不得拚命抵抗，故始終無外交之可言。受氣讓步已成習慣，自然東交民巷一聲呵斥，便嚇殺了政府中人。

別人又說：列強凌我，我固當抵抗之。但又有外人願助我去其患者，則我們的態度又將如何？助我者我自然歡迎之，但是世未有徒賴人幫助而能終去其所患者。牆壁不修，主人疲病，夜有賊來，鄰人為趕去之。這種隣人之助固可貴，但是如果主人終久疲病，牆壁終久不修，則盜賊將又來不已。鄰人之助又焉能終久依靠！姑不問此種隣人之助中間有無野心，而一個大國豈有能依人爲活之理，故所以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全依賴性的親善主義，而主張自強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能力，全國拚命，在帝國主義中間殺出一條活路來。

不過歐美近來侵略人國，已不同於從前專以兵力從事了。他們已發明了經濟政策，殖民政策，來特別吸取弱國的骨髓，使弱國精華盡竭，只餘形骸，以免費兵力去占領。而只要握了關稅權財政權以後，再派幾個資本家去經營，幾個傳教士去欺弄，便好了。這種計畫真是省事，不煩一兵，不遣一將，便能將像中國這麼大一塊領土的經濟生活把持在手裏，弄得中國人實業無法提倡，生計無法發展，窮餓不堪，爭奪不已。十餘年來內亂之源大半在此；經濟權不能獨立操縱，對外不能保護商業而與人競爭，對內不能發達國貨而力求自給。因此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能不主張李斯特的國家經濟。

李斯特 (List) 是國家經濟 (economic nationale) 的提倡者。德意志一八三四年的統一關稅，實行保護政策，便是實現他二十餘年所堅持的主張。他所主張的根本的意思是：一、國經濟權不能獨立操縱，便算不得獨立的國家。所以他為德意志所要求的兩條是：(一) 國家要得着他自己所應有的經濟自治權 (autonomie économique)；(二) 國家要保護着他自己國內生產者的國內市場。前一條便是收回關稅，後一條便是保護貿易。中國今日的經濟政策尚有更重要於此者的嗎？我們不首先向外國收回關稅，以調劑生產，獎勵生產，不行保護政策，那能與外人言商業的競爭？洋貨稅輕價賤，自然把力弱本小的國內土貨衝滅了。我們自家的實業品一天不能在國內占勢力，使一天要被人剝奪。像今日這樣門戶大開外貨充竊簡直可以使骨血盡竭坐而待亡。因此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在首先向外人爭回關稅權，而實行保護貿易。以理爭不行，則以力爭。以力爭不勝，亡也亡得痛快一點，免得暗受損害至死不悟。而一班自命學者的中國所謂名流先生尚在那里說：「中國既成了歐美

人的好商場，歐美人便不會侵略中國了。他不知好商場便已經是侵略地了。

對外尚有多端——如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國家教育權等，一時難於盡述。但其重要莫過於上面的兩件事，即自主權與保護權之收回。中國人一日不爭回此兩種權利，便一日不能有蘇復興之望。雖然像今日這樣藩籬盡撤，內爭不已，焉能驟然得志於此。必先除我內患，後修我內政，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之後，歐美日本人當有所畏忌，而能向我讓步。於是我們又說到安內上來。

內國之不安寧，而且自相殘殺，在這二十世紀的國家中，要算是中國所獨有的特殊現象了。中國何以獨有此怪現象？偏於經濟的解釋者曰：生計問題使然而已。但是中國現在之亂，并非階級戰爭，而純為的是餓餉問題。一班好亂的偉人，奔走的政客，且皆是面團團的富家翁。偏於地理的解釋者曰：幅員太廣，難於統治故耳。要知中國幅員雖廣，而乃在一大塊土上，如謂地廣便難統治，則大不列顛帝國殖民地遍全球，又將何法以統治之？并且中國這塊土地在歷史上曾經受統治過數千年，何以至今乃不可收拾？於是我們不能不去用歷史哲學的比較方法，以求解答。我們先用內比，以本國歷史的前後相比較一下，何以從前安而今日不安？何以從前易於統一而今日不易？然後我們再用外比，以他國歷史比較我國歷史，去看出彼此的經歷或有程度之相差，或有早遲之不同。比較而觀，不難見他國亦曾經過中國這種現狀，而他國用何法以出此現狀，則大可注意矣。

在歷史上，今日的强大國家皆有所謂他們的民意建國時代。如英吉利之法典運動，法蘭西的大革命，德意志的聯邦政府，皆是為脫離內國的專制暴力，抵抗外國的侵略行動，而一致的團結起來，穩固他們的國基。當其在

未能團結以前，還不是有宗教之爭（如法之望代戰爭 *Guerre de Vendée*）藩王之戰（如十五世紀之日爾曼帝國）其間也曾經過多少年，但他們怎樣的去團結，而終能聚散沙於一盤呢？他們利用兩種共同之點：即共同利益與共同志願。我們前面曾經說過，德意志之建國，全靠統一關稅，法蘭西的大革命也是由於要統一法律。關稅法律一經不受外界威權的任意支配，則全國人的利害便日趨於共同。既然能共同其利害，則長相保守而勿失墜的共同志願，也就格外堅固起來。請看德意志人本其民族民權之共同志願以攻拿破侖，及外力既去，關稅法律統一而德意志人民便相結不解，以至於今，在患難之中而聯邦尚毫不有分裂的現象，再請讀法蘭西大革命時全國各省區代表在巴黎（*Champs de Mars*）的誓言！歷史家都說自有此誓言後，法國方纔建立真正統一的國家。從前的統一皆帝王兵威征服之力，非全國民意的統一。威力一衰，勢將瓦解。有此誓言，便表示出全民真正共同志願的集合，而能始終相守不衰。（大意見米失勒 *Michalet* 法國史）

中國全國國民今日已有這種志願否？曰沒有。其所以能偶然共同起一些反對列強的呼聲，皆受一時的激勵使然，而且只限於少數人。若則尚有政客武人，利用外力以傾異黨，反能號召為亂於國中。因此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國民尚沒有共同利害的十分感覺，所以沒有很熱烈的共同相保的志願。國家主義的對內政策，便是針對這兩點下手做去：一方面固然要在國外國內的暴力之下收回經濟權法律權而統一之，而一方面更要極力訓練團結全國國民，滋長這個共同的志願。國家主義便要全靠這個全民共同志願，把中國建設起來，使各行省區域本自由意志，重興聯合一過，成為一個不但形式上統一，而且精神上統一的國家。因此國家主義者所主張的統

一乃是民意的統一，所主張的聯治，乃是民意的聯治，而最反對少數武力的統一與多數軍閥的聯治，更明白些說，便是國家主義者主張全民政治，而反對獨夫或一階級的專制。

且在今日這種強鄰思逞，國賊專橫的時代，國家主義者更要極力團結全民之力以共抗惡魔。因此他主張「階級合作」，而反對「階級戰爭」。階級戰爭之是非，我們在此姑不具論，而在處境如斯的中國，國家主義者認爲主張階級戰爭者，算是藥不對症，於國事有損無益。因此國家主義者不但在此日驅除國內外暴力的時候，要主張各階級合力同心去從事於革命運動，並且來日全民革命之後，也要一樣主張各階級合力同心去從事於建設工夫。因爲國家主義者既以國爲唯一的對象，則國家若全國人之國家，不是幾個人或一階級的人所能私有的。既不應私有，則國家的利益即是全國人的利益。不但當與全國人謀之，且當聽全國人謀之。因此國家主義者的立國政體必須是全民共和，而不是獨夫或一階級專政的。

說到這裏，留心社會問題的人，必定要問國家主義便不問平民生活，便與社會主義無關了嗎？國家主義既處處留意到全民幸福，豈有不顧慮到平民生活之理？并且一國內如果平民失業，社會不安，又那能說得上與強隣相抗呢？不過國家主義自有其對於平民生活的社會政策，而不同於一班的社會主義罷了。求之經濟學史上，則有德國學者講師所主張的國家社會主義（Socialismus d' Etat），求之歷史事實，則有俾斯麥克（Bismarck）的社會政策，請略述之。

最早提倡國家主義的德國哲學家非斯特（Fichte 1762-1814）便主張以國家這個機體來實現社會的

正誼，他所謂兩種社會上的正誼，即是經濟上的平等與精神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便是一國之內，人人都得着相當的生活，精神上的平等便是一國之內，人人都受着相當的教育。他說國家的第一個責任是在盡社會分功的能事，而使全國國民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國家的第二個責任是在盡化育全國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而使全國國民都能增其知識，展其個性。他做了告德國國民書（Discours à la nation allemande）這本書，對於德意志國的統一影響很大，而且便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導師。國家社會主義便是主張以國家的能力來調劑生產消費，保護工人農人。關於分配方面，他雖然仍贊成私產制度的重要，但特別注意勞力報酬當否，利益取得的公否，務使工資足以支持工人適當的生活，而同時并主張抽財產稅以爲設置救護工人的機關。華格爾（Wagner）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兩件事：即以國家能力去用資產者的錢來抬高工人物質與精神的生括，去用抽稅的方法以免財富集於少數之手。至於在生產方面，則由國家以公利爲標準，而來經營林、水、路、鐵諸大實業，而以其他小實業俾國民自由經營，以便盡分功合作的能事。這種主張在德國立刻得着俾斯麥的贊成，而實現之於其社會政策上面，由國家提倡企業，爲工人設保險機關，使德國工業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而德國工人生活亦比他國爲抬高數倍，不獨俾斯麥克行之。今日法內閣愛里友（Herriot）之社會政策，英首相馬克多拉（Mac Donnell）之工黨政策，也是一面特別保護生產者，而一面抽財產稅於資本家，且勵行保護貿易，而提倡國內實業。那一點不是根着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而以國家的權力來實現社會的正誼的。故國家主義的政治，是或存或廢，說上，或在事實上，從來沒有忘却平民生活的。

綜上所言，國家主義所有對外政策是仗着全民自家的力量，以期完全獨立的自決，而不贊成依人爲活的國際主義的解決。國家主義所有的對內政策爲團結全民共有的志願，以求真正民主的自治，而不贊成任何階級的專制。至於普及全國國民教育，增進全國國民生活，國家主義者既欲強國而必須其國的份子各各健全，當然不能忽略了的。現在更簡單的歸納國家主義的政治在兩個形容辭之下，便是這種政治是「止國的」與「民主的」(National et republicaine)。

國家主義正名

李璜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e) 這個字，被有些人譯作民族主義，我們認為很不適當。

(一) 近代國家的內容不是民族兩個字所能包含，所能代表的。固然在拉丁文裏 (Nation) 這個字有民族的意思，但國家乃是近代的產物，便不單含民族的意思了。譬如我們解釋國家的內容的時候，必定要聲明近代的國家不只是一個民族構成的。一個國家裏往往有幾個民族同住著，而并不妨害他的國家的統一和發展。今世的強國如法國，如美國，他們構成的份子很是複雜。反過來說，意大利，西班牙本同是一個拉丁民族，而結果成為兩個國家。所以說民族這個字在事實上不能與國家這個字相代。並且在近代國家的構成上面，在實質上言之，所謂領土主權之意很是重要；在精神上言之，信仰與共通歷史的回憶也大有關係的。常常是幾個民族同保一個疆土，同擁一個主權，文化相融，有了共通的信仰，歷史既長，有了共同的回憶。於是患難安樂都能長相保守，而不分離，以失墜此領土主權。此種精神與此種事實便成功近代國家的穩固基礎。而國家主義也是本此精神，本此事實，來在強鄰迫人，大盜亂國的時候，叫一國的人共同協作以安內而攘外。因此國家主義的根據和內容是與近代國家的根據和內容一樣而并不加增別種成分的。於是國家既不能夠叫作民族，而國家主義也就不能叫作民族主義了。

(二) 有人以為國家主義這個字容易誤會成帝國主義 (Impérialisme) 或軍國主義 (Militarisme) 所以專

肯譯爲民族主義。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小心了。不但在字面上，這三個字本來是三個寫法，在字義上，這三個字本來是三個意思，而且在百年來歷史上這三個主義常常是對頭冤家，怎樣能混爲一談呢？舉幾個例罷：有了拿破崙的帝國主義，把德意志的國土分作幾塊，給了他的子弟，把西班牙用兵守着，硬要霸佔；纔引起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國家主義。西班牙的國家主義是鼓吹農人集合起來與拿破崙的兵爲難，講帝國主義的拿破崙到此遇着了講國家主義的西班牙農夫，四面八方和他野戰起來，戰無不勝的拿破崙在此第一次喪失了三十萬精兵。（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十九世紀中間被壓迫的國家如波蘭如土耳其等都本着國家主義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英俄德要求解放，先圖自強，後謀獨立，難道我們說波蘭土耳其這種講自強謀獨立便是講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嗎？所以將國家主義誤會成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人乃是缺乏歷史上的常識，我們該當積極的多讀一些歷史去使他明白，不該當怕他誤會便消極的把國家主義這個字牽強的譯作民族主義。

（三）并且國家這兩個字，在字的構造上，也特別能形容出近代（Nation）這個意思，國字的一個口，便已足以表示疆土回合之意，而內面這個或字照說又從口從戈取人執戈以守土圉之義。於是領土人民主權三種要件都合在這個國字內面了，并且國家這個家字，在精神上言之，是有所依歸之意，所以在英文稱作 home，在法文稱作（Patrie）都表示依戀歸宿之意，因此國家這兩個字一個完全的表示出他所指的實質內容，一個親切的表示出他所指的精神生活，中國字裏像這樣形容得出的真很少！何況我們已用慣了，

我們總是稱比國，法國而不稱比民族，法民族，當其特別稱比民族、法民族的時候，必定是特別注意血族關係的分辨上，而不含國家的意思。因此我們譚國家主義既完全沒有分辨血族的想法，便不必用民族主義這個字。何況國家主義的對待主張，如像（*Informal nationalism*），却叫作國際主義，又何以獨稱（*Nationalism*）爲民族主義呢？一定要稱民族主義，那嗎國際主義也就該當稱作民族間之主義或民際主義，那更易使頭腦不清，歷史不熟的先生們容易起誤會了。

（四）有人說民族主義是美前總統威爾遜所提倡的——民族一國家的主義。——如果是這樣，便與我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是兩回事。威爾遜的一民族一國家的主義是否適當，我們不在這裏來評論。不過我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雖不與威爾遜的一民族一國家的主義相反對，但是我們既以國家爲單位，而對於已經同化在一個國家下面的各民族便不贊成他們分離了。如像中國裏的滿族和回族，他們既與漢族有幾百年真正共處，相安於一個文化的歷史，則同爲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不但不加以歧視而且要更使他們了解我們是同處於一個現狀，患難是相共的。我們今日言救國，不只是救漢族，是連滿蒙回藏各族一齊要救。因爲他們都是中國的一份子。既同是國家的份子，他們也該當起來同我們合作去打破這個現狀。因此我們更不願意把（*Nationalism*）叫作民族主義，而使他們誤會成這只是漢族謀自救的主張。

以上就字義說，就歷史說，就字的内容說，并且就我們國家構造的情形說，我們都明白指出（*Nationalism*）這個字譯作民族主義之不適當，而應該明白了當的稱國家主義。我們更希望言論界一致的用這個名稱，以免後

斯的誤會與糾紛。語云：「必也正名乎。」我們既主張國家主義，繼此關於這方面的言論，必強聒不已，所以願本此義先自名稱上，與國中言論界以共見之誠。至於國家主義的定義，精神和其趨向，另詳於「釋國家主義」一文中。

國家主義之今昔觀

吳俊升記

東南大學政治學教授陳逸凡先生講

國家主義這個題目是很老的，我們今天研究這個題目，也許有人要嫌太老了，不適用於用，沒有研究的價值。但是老的東西，未必無用，比方「老書」、「老朋友」等等都是最可貴的。自歐風東漸以來，一般人多趨新厭舊，新者固多可取，但舊者亦不可一概抹煞。有時也許舊的還要比新的好，中國古語說得好：「新人不如故。」我今天講國家主義這個老題目，正像尋訪故人一樣。

我從前在外國時，看見形形色色的繁華都市，種種燦爛的物質文明，非常羨慕，但是雖然羨慕他，却不愛他，還是想回到祖國，重歸故鄉。回來之後，一進里門，覺得風景不殊，家山無恙，父母兄弟，握手言歡，不由自主的悲喜交集。這種愛戴故鄉的感情，這種「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鄉」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的感想，是與生俱來的，是有生命者所同具，便是國家主義的源泉。現在先講國家主義的源流變遷。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一字，包涵種族、歷史、宗教、語言各項。最初國家主義，起於同種的國家 National State。國家主義的要義，在以國家為前提：個人依國家而存在，無國家即無個人，所以應當犧牲個人，盡忠於國家。在十九世紀以後國家主義的觀念，漸漸變遷，同種同文，不是國家組成的主要條件了。一個國家只要他的人民本自決的精神，互相結合，一方面更有公共的歷史，便可產生國家主義。瑞士國一國有德、意、法三國的人，瑞士非無國

家主義地內部團結，禦外侮，頗具有國主義的精神。在十九世紀之初，『國家有機體說』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大盛，此說和近世國家主義的發達關係最切。『國家有機體說』之發生，這在十九世紀以前，古代希臘大儒柏拉圖嘗以人身之構造比國家之組織，謂個人之不能脫離社會，猶如細胞之不能脫離機體。這可說是『國家有機體說』的起源。其後羅馬法學家西細魯 Cicero 與中世紀之 Salisbury 等把柏拉圖的學說，更加擴充，直到十九世紀伯倫知理斯實塞等起，『國家有機體說』已是登峯造極了。這種學說的根本精神，和國家主義的一樣，近代國家主義，受其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確實不小。

十九世紀初期，拿破侖蹂躪歐洲，促醒了歐洲各國的自覺心。拿破侖敗後，維也納會議，是近代國家主義之起點。維也納會議以後，歐洲提倡民族主義的國家，National State 一種的民族，應當結合一個國家，因此意大利、德意志、比利時、波蘭諸國，有民族獨立的要求。當時一班政治學者、文學家、戲劇家莫不竭力提倡國家主義。在十九世紀和國家主義並起者還有憲政主義 Constitutionalism 以改君主專制為立憲制為要義。法國革命後，此種主義風動一時，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憲政主義漸就衰息，而國家主義瀰漫歐美，勢力極大。在一八七〇—一八八〇之間，德意志和奧國統一，論者稱此為國家主義之全盛時期。國家主義在德意志一變而為軍國主義，再變而為國際帝國主義，其發展尤臻極致。現在且以德國為例，說明國家主義發展的經過。

德意志聯邦成立雖在十九世紀，但是從馬丁路德提倡新教，已經為國家主義的張本了。馬丁路德提倡精神自由，推翻舊教，後來康德根據馬氏精神自由之說加以擴充，便完成國家主義的哲學方面的根據。康德把世界

分爲兩重，一是科學界 *Realm of Science*，一是道德界 *Realm of Moral*。前者是外觀的，客體的，物質的；後者是內在的，精神的，自由的。兩重世界絕不相同，前者是物，後者是心。人的自由，以精神的自由爲最高。物質機械的束縛，無妨內在精神的自由。政治組織，乃物質的機械的，故不能損傷吾人的精神自由。康德此種學說一方面容忍了專制的政治，一方面更提倡個人效忠國家，以求精神的自由，減免了個人和國家的衝突。康德的學說，既然爲國家主義打了基礎，但他自己並未明白提倡國家主義。德意志的國家主義到了斐思脫 *Fichte* 時候乃大昌明。一八〇七年普魯士爲拿破侖大敗於哇哇 *Toula*。斐思脫在柏林演說，謂普魯士所以失敗，就是因爲大家把個人主義看得太重，把國家主義看得太輕。這種情形，實在是可悲可怕的。又謂普魯士爲提倡精神自由的第一個種族，要把精神自由的學說，推行於全世界，必先把普魯士變爲強國。他又說教育實業應歸國家直接監督。國家對於工人應有相當的保護。後來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是受了斐思脫的影響，即社會黨首領如拉薩爾 *Lasalle*、各比他士 *Robertus* 等都是宗師斐氏之倫理社會主義的。海格爾 *Hegel* 和斐思脫同時，他提倡國家主義，也很出力。他說國家是最高無上的，個人的道德責任，在犧牲一切，擁護國家。這種玄高熱烈的國家主義，深入條頓種族的腦海，故一八七一年德意志聯邦的成立，雖然是由於俾士麥鐵血政策的強迫，但是種因者還是康德斐思脫海格爾一班哲學家。俾士麥不過收果而已。歐戰以後，德國千瘡百孔，元氣漸喪，然而仍能忍痛圖存，未始非百年來提倡國家主義之餘烈猶存也。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德意志其可以當之矣。

歐戰以後，國家主義的發展，一日千里。捷克斯拉夫、巨得斯拉夫等國，或是已亡之國，或是保護國，均一一宣告

獨立。奧匈兩國，因為種族和歷史的不同，亦相攜貳，這便是國家主義的表現。斐列濱、愛爾蘭的要求獨立，也不過受了國家主義的影響。論者謂歐戰以後，國家主義已歸消滅，豈切事實之論乎？

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社會主義發達，社會主義者以爲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衝突，社會主義發達後，國家主義終歸消滅。Bebel 卽主張此說者。他說國家完全爲國內有產階級而存在，階級打破，國家自無存在之必要。Augé 亦說國家以少數人治多數人，以資本階級治勞動階級，資本階級推翻以後，國家亦應連帶推翻。但是這些說素，未免將因果倒置了。國家之存在，正所以謀羣衆生活，防止階級之爭，非階級之爭因國家之存在而始有也。取消國家，怎樣取消得階級？這正和老子所說『鬥折衡而民不爭』同樣倒置因果。政治有好有壞，壞政治可以改好，何能因壞政治而取消國家？且國家有四種元素：土地、人民、主權、政府，政府不過其一端。Bebel, Augé 輩蓋誤認政府卽國家者也。

社會主義中和國家主義相近者有國家社會主義。此派主張抑個人，尊國家，一切教育、實業、交通、生產機關，皆歸國家管理，此實發源於斐思脫海格爾的國家學說。

以上所論，皆國家主義既往的歷史。現在要研究國家主義究竟價值如何？欲明國家主義之價值，應當先知道國家存在的目的。從近代政治眼光立論，提倡國家主義實屬應有之事。但是有一班國家主義者竟把國家自身之存在，看做一個目的。State as an end in itself。這未免是嫌過分一點。國家實爲個人之幸福而存在，自身並非一個目的。不過要達到發展和保護個人幸福的目的，却不可不以國家全體爲前提罷了。所以以理論，個人先

於國家，以勢論，國家却先於個人。歐戰之後一班夢想世界和平者，多傾向於社會主義，以為國家主義為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始作俑者；欲打破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必先打破國家主義，把種族界限一筆勾銷，以謀世界永久和平。從哲理方面說來，這種學說似可贊同，但是實行起來，果行得通否？提倡和平主義最力的宣莫如威爾遜的十四條原則，試問有一條能實行否？國際聯盟，本謀世界大同，可是美國不加入，法國不裁兵，五年來所討論的問題，不過是德國賠款問題而已，對於世界和平的建設，絲毫未有。美國哈定總統所召集的太平洋會議，本以裁兵為目的，但是列強至今未解一兵一甲，其麗隆上之國際和平主義，其前途於茲可見。

二十世紀是平民主義最發展的時期，我是承認的，但這種主義之發達是有天然的界限。界限為何？即國家和種族的界限。瑞士的土地僅一萬餘方哩，人民不過四百餘萬，尚不能實行國民直接會議制；俄國採社會主義，到了一九二二年，採新經濟政策，也把共產主義幾乎完全取消了。由此可見，平民主義之實現，非無制限。而且即使讓步立論，承認全世界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到了既經實現社會主義以後，仍然是不能保持永久的和平的。何以故呢？此時全世的勞動階級因為有公敵——資本家——在前，大家同病相憐，所以能聯合起來，同心一德的推倒資本階級。但是等到把公敵打倒以後，種族的成見和國家的成見，又會漸漸發生了，結果仍然逃不了種族或國家的爭鬥。原來同舟遇風，胡越可成一家，等得風浪平靜以後，恐怕彼此不能這樣協作了，這是生物的本性，是無可如何的。平民主義無論如何發展，總是免不掉人類本性的限制的！

中國自歐戰以後，一般人士，皆傾向和平主義，凡講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者，皆認為不識時務，此等見解，非常

危險！歐戰以後，如大同主義真正可行，何以美國不加入國際聯盟？何以法國不肯裁兵？何以美國限制移民？巴拿馬運河何以永不開放？法國軍隊何以由八十萬增至一百萬？大不列顛帝國海軍何以永不裁減？威爾遜一方面在巴黎和會提倡裁減軍備，何以一方面打電到美國國會催促通過擴張海軍的議案？今後世界惟有實力能戰，爭者能言和平。中國山東問題之失敗，即是從信和平主義之過！弱國無外交，要講國際平等，非自己先發憤圖強，不可。要發憤圖強，非提倡國家主義不可。德國戰敗之後，仍能自存，即百年來提倡國家主義之功。英國政治不本於成文憲法而根據習慣，國民能服從習慣法，亦因國民富於愛國心。現在吾國人往往於豔羨西方文化之餘，遂唾棄本國的一切文教禮俗，慨然相率自賤其宗，亦大可哀矣。

世界人民從無蔑視本國文化而能獨立者。政治可以改良，新文化可以振注，但自賤其宗，捨己從人，生存活剝，不知抉擇，乃是國民的劣根性，不可不除。中國東漢尚氣節，南宋講理學，明末競文章，一時何嘗不彪炳卓絕，使全國向往，究於天下事奚補耶？讀歷史者以爲東漢之亡亡於內豎閹宦，南宋之亡亡於秦檜韓侂胄，有明之亡亡於魏忠賢，馬士英，阮大鍼，我以為東漢之亡乃亡於拘迂堅僻空談氣節之名士，南宋之亡乃亡於一般腐心於「天理人欲」人心道心」的理學先生，有明之亡乃亡於分門別戶以文章爭相標榜的東林黨和復社。何以這樣說呢？凡到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士君子不謀結合求治標救亡之法，徒率天下之英俊高譚不切實用之學術理想，坐使權奸得志，馴以亡國。書生誤國，其罪真不可追。中國近日一班學者，好高騖遠，不問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現時的危機，徒然剽竊國際主義大同主義社會主義等相誇炫，慨然以新文化運動名流自號，勢不率國人直入九重地獄。

不止此等「名流」直亡國的「名流」而已。

國家主義使德意志聯邦成功，使意大利南北統一，使美利堅內訌止息，國家主義使歐洲中部亡國復活，使巴爾幹各弱國復強，使彈丸三島之日本一躍爲世界第一等強國，這種大功是永久不能磨滅的。中國此時，救死良藥，也是止有國家主義。大學生領袖羣流，尤當以身爲天下倡。近來全國人士，皆以個人爲重，以國家爲輕，與斐思脫所論德國當時情形，會無二致，我們應當極力矯正，共挽危亡。否則，惟有準備做猶太人了！諸君甘心嗎？

愚公按此文爲陳先生在寧應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分會之演講，蒙會友吳俊升君筆記見寄，披閱之後，覺其言淋漓痛快，所見與吾人完全相同。可見在今日之中國提倡「國家主義」爲「救時良藥」，已成天下之公論，非吾輩之私言矣。

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

陳啟天

（原名何謂新國家主義）

自歐戰結局以來，文人談士莫不痛詆國家主義的流毒，可以擾亂世界之和平，可以摧毀人類之文化，可以殺傷好生之人類，可以消耗無數之金錢，可以淆亂宇宙之真理，可以惡化國民之心理，幾若國家主義爲萬惡之所歸，無復存在之餘地者，是未免反動過激耳。在歐美國民苦於戰事者數年，一旦歐戰告終，自必讚歎和平，而向慕世界大同之呼聲大噪一時，此自然之趨勢也。我國素以和平著稱，益以歐美之和平聲浪，乃乘機大放厥詞，轟動全國，一若世界大同之局即在眼前，而我數千年之中華民族所託生之中國，可以自行毀棄無復顧惜之價值者，是又未免理想過遠耳。

我人若就國家主義爲公正之討論，則其罪惡固有不可掩者在，而其功勞亦未可純以過激之反動與過遠之理想而一筆抹煞之。若更就中國目前之現狀與其在世界之地位，中華民族之將來各方面從長計議，則採行國家主義實爲目前之急務，未可以時代錯誤目之也。不過吾人所謂國家主義與德國及日本所採用之國家主義大異其旨，爲免除與習見習聞之國家主義相淆混而發生誤解計，可不名爲國家主義 Nationalism，而以新字冠之，標爲新國家主義 New Nationalism 焉。

何謂新國家主義？非數言所能盡也，請分爲三方面疏述之：

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

1. 新國家主義之消極的意義

從消極方面疏解，則所謂新國家主義者與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武力主義 Militarism 誇大 Chauvinism 狂瀾 Fanaticism 仇恨 Antagonism 等主義，宗教主義 Clericalism 無抵抗主義 The doctrine of Non-Resistance 與頑固主義 Conservatism 相反者也。

1.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相反也？所謂帝國主義以侵略為職志者也。攫人財權，掠人土地，侮人種族，毀人國性，而日事擴張本國之勢力，惟恐或後。此非非洲、南洋羣島之所以瓜分，印度、朝鮮、波蘭、安南、緬甸之所以相繼亡國也。而擁有四千三百萬方里之中國亦迭受帝國主義之荼毒，而先後失去澳門、琉球、臺灣、朝鮮、香港等地而不復成為無缺之金甌矣。昔日列國在中國之勢力範圍固帝國主義之產物，而尊重主權保全領土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之倡言，亦帝國主義之出品，均與新國家主義絕相反者也。新國家主義之精神不在侵略而在反對侵略。凡屬國家皆有其存在之價值，應當互相尊重。所謂門羅主義者似乎近之而猶嫌其過也。『某國者某國人之某國也，他國人不得干涉之』此標語也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而無從前國家主義之流弊，為新國家主義不可少之一義。如此，則帝國主義不得假新國家主義之名以實行侵略政策之實，乃吾人所首當辨明者也。

2.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武力主義相反也？武力主義為侵略主義與帝國主義之產兒，狼狽為奸而不可或離者也。貫徹帝國主義之侵略政策，則不得不以武力主義為前驅與後盾，而消耗國幣之大部分以供養過度之海陸軍人。如此不但平時國民不勝其負擔，而國際戰爭亦易勃興，國民尤不堪其痛苦矣。此歐戰時人民之所親受，

而爲醉心大同者之所痛心疾首也。武力主義之不能存在於國際，已經歐戰之試驗而顯明，莫敢倡言獨佔中國國內之武力主義，猶爲少數軍閥所迷夢，致使國亂不知伊於胡底。吾人爲擁護國家之統一與奠定國家之基礎計，不可不急起反對而謀切實剷除軍閥之法也。若專令少數軍閥迷信武力，蹂躪全國，則國家永無統一之日，人民只知有國之苦，而不知有國之樂矣。此非有國之過也，武力橫行，軍閥當道，國以不國耳。故吾人所標舉之新國家主義，不但反對國際之武力主義，以減少國際戰爭，尤當反對國內之武力主義，以消弭國內戰爭。

3.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誇大、狂溺、仇恨等主義相反也？舊國家主義之所以爲害者，又以國家獎勵國民之誇大、狂溺，而仇恨他國不顧公理也。西語曰：是乎非乎，吾國是矣。此用國家主義過當者，而新國家主義不取焉。凡舊日任何大主義，如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日本主義，皆只知己國之大，而不知他國之大，勢必至於兩大不能相容之局，與新國家主義之精神相反。新國家主義只認各國皆有其固有之特性，可以發揮光大，而無害於他國國性之發揮光大。任何國家皆無超越一切國家之特性，而可以凌駕之、征服之、奴使之、敵視之，而成自大之夜郎與黷武之威廉第二也。新國家主義固主張尊重本國之國性，同時亦尊重他國之國性。毀己以利人，固所不願也；毀人以利己，亦所不取焉。媚外固所不願也，敵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棄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此新國家主義之真精神，爲吾國民所當具備者也。

4.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宗教主義相反也？宗教在以一种神的信仰拘束人的思想，是吾人所當反對者也。而宗教利用政治之勢力以圖擴張，尤爲吾人所當反對者也。歐洲自教會政治之勢力墜落，而後國家乃得發

揚光大以增進國家之地位與貢獻，歷史垂示，昭昭在人耳目。國人早知政教混合之弊，與宗教眼斷國民思想之害，不惜激烈攻擊與中國文化最有關係之孔教矣。不圖孔教之勢力甫衰，而耶教之勢力轉大。在昔日以吃教誘致流氓而貽禍鄉曲者，今日以學校誘致青年而摧殘國性矣；在昔西洋之教士鼓肆贊舌於教堂者，今以中國之宗教職業家奔走於青年會矣，昔爲個人之宣傳者，今爲團體之運動矣，昔日在社會傳教者，今漸入於干涉政治之途矣。推其極也，至有所謂『中華歸主運動』(The movement of China for Christ)將使國性喪失，殆盡舉國而成外國之順民，而猶美其名曰『宗教救國』、『人格救國』，吾實不知其居心若何也。近二十年來我國先知先覺用九牛二虎之力，先後闢發孔教眼斷國民思想之害，而今之耶穌教徒復假外人之勢力，以摧殘國性，使全國國民盡奉耶穌爲聖人，信約書爲金科玉律，又何異孔教徒奉孔丘爲聖人，信經書爲金科玉律哉？於孔教則詆實無所不至，而於耶教則容忍無所不至，何國民思想矛盾之甚一至於此！且就嚴格之宗教意義言之，則中國爲無宗教之國，應永遠保持此特性，而欲實現國家主義之思想，尤不可不極端反對任何宗教之宣傳並剷除其勢力。法國之前例具在，吾人可急仿而行之。

5.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無抵抗主義相反也？新國家主義固當反對國際與國內的侵略——如當今軍閥的侵略不惜糜爛全國以遂其私欲——尤當反對對於國際與國內之強權全無抵抗之態度與預備。日事侵略者之害，在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而純持無抵抗主義者之害，在只知有人不知有己。換言之，前者之害，在以他國或他人無存在之價值，而後者之害，則在以本國或本人無存在之價值，均無當於新國家主義之新精神也。愈無抵抗，

愈無存在之價值，個人然國家尤然，應抵抗而不抵抗，在個人失其人格，在國家失其國體，尙有何面目高談無抵抗主義哉？自中國近三十年來迭次外交失敗，而全國心理遂漸由自大排外而變爲自卑媚外，自大排外固不可也，自卑媚外尤不可也。苟中國全國國民不急起振作精神，改正自卑媚外之惡習，剷除無抵抗主義之謬言，則中國永無建國之可能，而與印度朝鮮同作可憐之亡國國民而已。高談主義，乞憐於人，又何益哉？

6.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頑固主義相反也？新國家主義在認一國之歷史與文化有其優點亦有其弱點，優點則滋養之，弱點則改正之。改正與滋養之所資，不妨酌採外國之文化，益求發皇精進。故新國家主義者非守舊黨，非頑固派，非國粹家，只知有古代之文化而不知有現代之文化，只知有本國之文化而不知有世界之文化焉。新國家主義在求全國國民再造中國文明，是吾人之責任，不重在過去之保存而重在將來之創造也。吾人固不可廢棄中國之文化，亦不可抱殘守缺，徑徑然以古人之糟粕自豪而自封焉。

II. 新國家主義之積極的意義

再從積極方面解釋，則新國家主義爲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和平主義 Pacifism，人道主義 Humanitarianism，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社會主義 Socialism，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民主主義 Democracy，之基礎或與之相輔也。

1.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爲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基礎也？今人之懷疑國家主義者，以其爲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蠹賊也，而新國家主義則反是，而爲其友或基礎。何者？當今世界組織之單位爲國家，由國家分立而進於

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間所可幾及。苟全含國家而言世界，視為理想則可，按諸實際則有不可能者在；期之他日則可，求之目前實絕不可能也。吾人多驚於將來之理想，而不顧及目前之實際，此世界主義之所以成為空談而無益於危亡之中國也。況世界以國家為單位者也，國家不存何有厚顏高談世界主義，更何有厚顏建築於國家基礎之上之人道主義？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我非不欲其實現也，其知不由國家主義則無進於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資格何以不能自振之國與亡國之民，而高談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縱不以乞憐為恥，獨不聞他人之冷嘲熱罵，而不以人道相待同處於一世界乎？歐美對於中國人之通稱為 *Chinaman* *Chinaman* 者其意無異『支那蠻』也。以歐美人心目中之支那蠻高談世界的人道主義無怪乎目笑存之而不以為意焉。故中國今日之急務，不在大吹大擂所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而在使中國如何成為世界上之一國，可與列強同等，然後有進於世界主義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之人，可與西人同等，然後有進於人道主義之可能。不然，則鐵路共管與長江聯合艦隊之說將日益加多，誰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可以拒絕之乎？而美洲虐待華人與日本殘殺華人之事，亦將日益加多，誰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即可救濟之乎？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非不美也，而無高談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資格，斯其所謂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永無實現之日矣。是以吾人不但為增進中國在世界之地位，在今日須極力提倡新國家主義，而為求實現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之理想，亦非實行新國家主義莫由達也。

2.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為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之基礎也？自歐戰結局以來，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之聲浪已

高唱入雲，可謂極一時之盛。然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須有相當之基礎，而後可以推行。日本何以不與朝鮮講國際主義？美國何以不與菲律賓講國際主義？英國何以不與印度講國際主義？法國何以不與安南講國際主義？一言以蔽之曰，以其無國家之資格耳。中國之與列強在名義上固爲國際也，而實際則更爲附屬，尙無完全平等之國際關係也。不觀海關乎？關稅立法權固操之列強而不能自由增減稅率，即關稅行政權亦全操於外人之手而不能自由處置。以如此之地位，而侈談國際主義，未免令人齒冷耳。我非反對國際主義，乃反對不注意國家之獨立與統一而空吹國際主義，斯無由實現耳。

至和平主義爲中國人之祖傳，固一良善之國民性也。母如常用和平主義只有消極的平和態度，而無積極的平和方法，以故雖可偷安於疲於歐戰之國際，而無術保持國內之和平。夫和平誰不欲之，而達到和平須有相當之代價，豈有大呼和平而即至者乎？故欲實現國際之和平主義，須先使中國成爲獨立國，而不爲列強破壞和平之導火線。欲實現國內之和平主義，須先使中國成爲統一國，而非軍閥破壞和平之修羅場。實言之，和平主義不能即以和平主義實現之，非有待於新國家主義。不可凡擾害我國家之和平者，無論爲國際之列強與國內之軍閥，應以不和平之方法應付之，然後無人敢藉和平之名以行擾亂之實。近三十年來中國在國際上之恥辱與國內之混亂，皆由多數國民太好和平而無保障和平之方法所致。雖切望和平不可得矣。爲今之計，我國民莫若一心一德以新國家主義爲實現和平主義之前提，而共以實力赴之也。空談和平統一與和平會議，不獨無益於國，而且益增軍閥之專橫而無所忌憚，豈有貴之國民所宜出此哉？

3. 易言乎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也。社會主義之最大理想，在重新改造社會經濟組織，使個人均在經濟上有較為平等之機會與待遇是義也。自工業革新以來，因資本家與勞動者階級之懸殊大爲甚明，自勞農俄國成立與歐戰停止更爲流行。中國則宿好理想之文人，亦先後大唱社會主義以爲救國之不二法門。此無論何人不能預斷其不能實現於將來之中國也。然若謂其即可完全實現於今日之中國，則雖熱誠之社會主義者，亦將斷定其迷於理想忽於事實而不可能也。故中國目前之緊急問題不在可否實行社會主義之理想，而在能否實現社會主義之理想。不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於今日之中國，而在如何使今日之中國可於將來有實現社會主義之資格。此吾人不可不明者也。然則如何可使今日之中國於其將來有實現社會主義之資格乎？吾應之曰，舍新國家主義莫由焉。我國舊實業雖敵不堪與列強比武，而新實業又未振興，以故全國國民生計之大權均落於外國資本家之手。鐵路也，郵政也，航政也，消耗品也，日用品也，幾無不仰資於外人民生如此安得而不窮哉。雖有衆民博物，只足供人驅遣使而已，何從實行理想之社會主義？故爲今之計，應假借國家之力開發全國實業，不但爲世界之消費者，而同時猶爲生產者，則外資壓迫之禍可以稍減，經濟操縱之權可以收回矣。夫如是，然後可以自由商量實行如何之社會主義而無阻。此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之理由一也。

抑社會主義者之所痛心疾首者，爲大產業之權操於少數資本家之手，而剝削勞動家之脂膏也。今吾國國內之大產業尚未發達，欲與列強比武，自不得出於振興之一途。而欲開發大產業不爲少數資本家所操縱，則不得不藉國家之力以實行大產業國營制度，以調節資本與勞動之關係，是又非有賴於新國家主義不可也。苟依新

國家主義之理想切實施行大產業國營制度，則以國家爲一國惟一之大資本家故，可減少資本與勞動階級之懸殊。所謂社會主義之理想，然後易於推行不致顛蹶矣。此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之理由二也。

尤有進者，社會主義之理想，不僅在經濟分配之平均，而尤在人生相處之安適。夫如是，則以目前中國之國民，非有數十年之教導訓練，又安足以語高遠乎？與其空談高遠之理想，無濟於目前之危亂，不若暫時集中全國之聰明才智於國家思想之養成，而後易於趨赴社會改造之思想。故在社會改造思想未成熟之際，不能，亦不可不借助新國家主義以訓練國民之國家思想爲未雨綢繆之計。此新國家主義爲社會主義之基礎之理由三也。

由以上三種理由觀之，則社會主義不能實行於今日之中國，當爲聰明之社會主義者所熟知，而不得不暫時改轍易途，而趨重新國家主義焉！

4. 易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之輪也。我國自古四運動以來之最大特徵，爲個人主義之昌行。反對舊禮教也，批評舊學術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文化者。打破家庭也，自由戀愛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婚姻者。白話詩歌也，自由創作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文藝者。經濟獨立也，口頭禪的共產主義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經濟者。虛無主義也，無政府主義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思想者。選科制也，道爾頓制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教育者。買賣總統也，擁兵自橫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政治者。劫車奪印也，綁票勒錢也，此個人主義之見於兵匪者。若是者，吾人可累數至數十而不能盡。個人主義實當今時代之驕子乎？然個人主義善用之則爲國家生機之所萌，不善用之則爲國家禍源之所伏，吾人不可不明辨之而加以修正也。修正之道，在以新國家主義防止極端之個人主義流爲

單純個人之享樂而不顧國家與社會之安寧。與其爲戀愛屈膝，不如爲國家獻身；與其爲物欲折腰，不如爲正義擊楫；與其爲衣冠粉飾，不如爲學業努力；與其炫耀個人之虛名，不如促進社會之事業。果我青年羣有此氣概，則個人主義無害於新國家主義之推行，而新國家主義亦所以實現個人主義而矯正之者也。若夫無社會與無國家之個人主義，已釀成中國之危亂，無論其爲積極者或消極者，吾人當一律加以嚴格之排斥也。

5. 曷言乎新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相輔也？吾人言及國家主義即覺與平民主義相反，此蓋以帝政下所實行之國家主義而推概一切也。法國非實行國家主義之國乎？然其民治不以行國家主義之故而有所動搖，反以行國家主義之故而得保持法國人自由平等博愛，不見敗於德意志帝國。美國非平民主義盛行之國乎？然所謂門羅主義者國家主義之雅號也。所謂美國化（Americanization）者國家主義之別名也。美國一面實行平民主義，而一面仍行門羅主義與美國化，可見其絕不相抵觸也。不獨此也，平民主義建築於國家基礎之上，舍國家則無所謂平民主義。而平民主義之推行，在今日尤必賴國家之力，乃克迅速普遍。故新國家主義可謂平民的國家主義也。德意志帝國非厲行舊國家主義之國乎？菲斯的（Fischer）非首先提倡國家主義於德意志帝國者乎？彼於告德意志國民之演說中不但闡發國家主義之必要，而且闡明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之關係，主張國家以教育訓練普通國民爲國家服務之能力。惜後人只注意其國家主義之說而忘其平民主義之說，此舊國家主義之所以爲人詬病也歟？

III. 新國家主義之主要目標

吾人由以上討論可知所謂新國家主義者，與向之國家主義迥異，在消極方面與帝國主義、武力主義、誇大狂瀾、仇恨等主義、宗教主義、無抵抗主義、頑固主義相反；而在積極方面與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國際主義、國家主義、個人主義、平民主義相輔而為其基礎也。然則吾人欲於今日之中國，對於武力主義、帝國主義、誇大狂瀾、仇恨等主義、宗教主義、無抵抗主義、與頑固主義為有力之反抗與割去，不得不實行新國家主義，而欲於將來之中國有實現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國際主義、平民主義與社會的個人主義甚至社會主義之可能，亦不可不實行新國家主義矣。

關於中國實行新國家主義的必要與方法，吾人他日當為文詳論之。今於未結束本篇之先，不可不揭示明瞭者，即吾人所謂新國家主義之主要目標是也。新國家主義之主要目標為何？曰有三：

一曰國家的自覺。National awakening and consciousness。國民對於國家應有相當之自覺，然後國家有維繫國民之道，而不致散無友紀無以立國。我國國民果無國家之自覺心乎？然而數十年來志士仁人之奔走呼號迄今未斬，雖德意志、奧大利、義大利、美利堅諸國建國運動中之豪傑亦不是過也。獨惜少數仁人志士漸次云亡，而多數之國民震於歐美物質文明，遂自暴自棄以為中國不足有為，是何喪心病狂而自居於亡國之地乎？以國民之如是自暴自棄，縱列強容我存喘息於天地間，尙有何面目以偷生乎？況自暴自棄之國民絕無俾理可以立國者哉？吾國民苟不欲保持中國於不墜則已，如欲之，則不可不急喚起國民之自覺，完全剷除自暴自棄之心理，然後可以有立。今日之中國固有令人不滿意者，吾人之責任即在去其不滿意者而造其滿意者，萬萬不可以其不

滿意遂棄之不顧，甚至毀之亦不惜也。德意志帝國未成立以前，非受拿破崙之蹂躪乎？然卒能與法國抗衡者，以其國民具有國家之自覺心也。意大利未獨立以前，非受法奧軍隊之蹂躪乎？然卒能成獨立國者，以其國民具有國家之自覺心也。日本未維新以前，在世界之地位較愈於今日之中國者幾何？然不數十年以嘉爾之島國而傳於世界列強之林者，以其國民具有國民之自覺心也。美國南北戰爭時之狀況較愈於今日之中國者又幾何？然卒能成世界之大國，執列強之牛耳者，以其國民具有國家之自覺心也。自是推之，中國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強之壓迫，軍閥之專橫，議員之無恥，而在多數國民無國家之自覺心，而自號才智之士，又從而摧毀之，此國家之所以解體而軍閥議員遂得乘機狼狽爲奸也。嗟！果我國民均覺我祖先遺我之民族歷史甚長，自然產物甚多，而又肯殫策羣力加以二三十年之努力，未嘗不能與歐美列強比武者也。嗚呼！我國民乎！中國前途之命運，完全存於我國民對於國家之自覺心如何而定，吾人果何樂爲亡國之民，亂國之民，而不振起精神以再造中國乎？嗚呼！我國民乎！惟有我中華民族之國民有光大中華民族之責任，亦惟有中國之國民有再造中國之可能，又何爲長噓短嘆，束手乞憐於人哉？國民，國民，魂兮歸來！中國前途之命運，即在吾人之手。中國國民，魂兮歸來！中國前途之命運，即在吾人之手中！

二曰國家的正義 National Justice 國家雖非社會組織最終之理想，然爲今日社會最強之組織，必有道焉以爲全國國民之準繩而後內可以保持統一，外可以保持獨立，是曰國家的正義。中國今日之亂象，即在國家的正義爲國際的壓迫，與軍閥的專橫，與教會的教育所摧殘殆盡而幾無完膚。今後國民之急務，即在認明國家正

義之所在，而以全力主張之，擁護之，保衛之，雖出於個人之激烈手段，亦所不辭。果國民有此擁護正義之決心與氣節，誰敢長此侵犯我國家之獨立而破壞我國家之統一哉？吾人莫不知今日之國家正義已掃地殆盡，而以口舌筆墨電報爭之也，然而大盜視若罔聞者，則以正義之不能徒以口舌筆墨電報爭，必更有進乎此之實際動作，然後大盜乃知正義之不可侮，無人敢再蔑視之矣。嗚呼，我國民乎！擁護國家之正義，非我國民之責任乎？今正義久不存矣，我國民將何以擁護之？我國民將何以擁護之？吾人讀史知馬志尼之於意大利獨立，葛蘇士之與大利獨立所造之功烈不少，而我中華民族之擁護正義若徐錫麟、秋瑾、唐才常、譚嗣同、蔡鍔諸先烈者，亦更不紀其獨立無繼之者乎？先哲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嚮往正義之健兒，舍我國民其誰屬？

三曰國家的服務，National service。我人既棲息於國家之下，則對於國家而欲維持其治安增進其文化，則不得不從事於國家之服務。數年來社會服務之說尚矣，然成敗罕見者，則以社會之名詞過於空洞，易爲人所假借。不若國家之爲物較爲具體，易於體認，苟非以國家爲目的之服務，則不得亂屬於其間矣。我人今後不必空談社會服務，而認定國家之目的，以喚起並培養全國國民爲國家服務之精神。果如是也，則謂十年二十年後中國而猶混亂不能與歐美列強相抗者，吾不信也。我國民乎！國家是吾人目前之目的，服務是吾人目前之責任，苟吾人忽視此目前之目的與責任，而空談任何高尚之理想，或沈溺於任何甜蜜之個人享樂，均無濟於國家之危亡也。吾人今後之言行，可不知所擇哉？吾人今後之言行，可不知所擇哉？

附註：此文乃予受少年中國學會南京總會同人之囑而作，所以使新國家主義之涵義較為條理明晰，而非一空洞之新名詞也。既成，又於南京總會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之常會宣讀，羣以為大體無異議，故此文雖為予一人所草成，而其意則略可代表南京會友目心中之新國家主義也。又此文搜集材料，曾得吳君俊升之助，附此致謝。

附本文主要參考書

1. Scotts Patriots in The Making
2. Reiser's Nationalism & Education Since 1789
3. Perry's The 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
4. Monroe's Democracy &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5. 余家菊李璜國家主義的教育

十二年十二月南京。

國家主義答客難

李 璜

(一) 答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好以其見地攻擊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每以當前的，一時的情景爲不足慮，而以趨赴遠大的理想，除去最終的禍根相號召。因此我們在此不必向無政府主義者去辯論今日世界形勢與中國狀況，有主張國家主義之必要與否。我們願就無政府主義之根本見地來評判一番。

無政府主義不但反對國家主義，而且非難國家這個政治社會存在的理由；不但反對國家，而且否認一切政治社會。因爲他們覺得一切政治社會都足以妨害個人的自由，而非人類本來所要求的。我們因此願與無政府主義者平心靜氣，細細譚論政治社會以及國家這個政治社會的起源，去問一問他究竟有存在的價值沒有。其次研究一下人類究竟能否免却政治這個社會的拘束，去問一問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就照他們的辦法，是否便根本取消了政治這個社會，最後再略論政治社會的行爲是否與個人自由全相衝突。

無政府主義者論到政治社會的起源，多以爲這是由於古代術士巫師，秘密結社，創出一些說法，一種階級，以欺騙無知愚民；便由這種欺騙，陶冶鍛鍊，而演成較大的地方的政治社會。以建立近代所謂國家的基礎——近今有名無政府主義的學說家蒲魯東，如克魯包得金與爾勒克呂斯（Reich）等大半如此說法。——無政府主義者這種推論我們認爲過於簡單。那有一種「社會建設」已經過了幾千年而只是由於欺騙就這樣的

混到如今！假使他不能應人類一種事實上的需要，不合人類一種精神上的祈求，人類何必要去白白受他的拘束。即使遠古愚民無知被人利用，而這幾千年來人類知識總算略進了步，而反變本加厲，政治社會愈形繁密，古哲先賢也概不覺察。無政府主義者這種看法恐怕頗欠周到。并且近今社會學家告訴我們：就是野蠻民族，他們開始被範圍於一種政治社會之內也并不是由於神騙的結果。

不錯，在某一個時期的政治社會是由宗教信仰的結果，而其組織乃術士巫師爲其中堅份子，因此造成了一種特權階級。在東面的神話史上既已看得出來，而在近今社會學家對於北美及澳洲的圖騰社會更證得清楚。但是我們於此，不能使用現代脫離了一切宗教迷信的眼光，去從這個事實上立刻下個斷論是：『政治社會是術士巫師爲騙古代愚民而捏造的，所以我們用不着，而要取消了他。』這種結論至少都有一些武斷。我們該當去考察這種術士巫師是如何發生的，他們所依據的宗教信仰是否由他們一手捏造，隨着這種宗教信仰而組織的政治社會是否含有少數人勉強多數的意味；這都有很繁複的事實。願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下輕捷淺顯的結論之前，去略一留意。

社會學家追溯社會的起源時，起初由於推理，如像孔德的家庭的單位，斯賓塞的「穆爾德」(Murd)，皆是想像或理論的原始社會。不過近今社會學家注重事實的觀察，他們就五十年來的初民社會觀察，認北美及澳洲的圖騰社會爲在文化歷程上比較最幼稚的社會，所謂初民社會，無非就所知而言，此種圖騰社會(totemic societies)同時是家庭的團體，政治的團體與宗教的團體，并且其家庭與政治之起源皆於宗教的

信仰而有神祕的性質，這就叫作圖騰主義(Totemism)。圖騰主義是一小部份人因迷信大家同出於一源，以爲其祖宗或係蛇，或係犬，而大家遂有一些特別的禁戒(Taboo)，一些特別的信條(Prescriptions)。

這就是原始的憲法。這種帶神祕性的原始憲法并且是沒有少數專權的意義，因爲他所根據的圖騰信仰并不是由一兩個人所捏造的，而他所付給的圖騰魔力(Magic)也是一個圖騰社會各份子都具有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Durkheim)在社會學年報(Année sociologique)和他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上歸納近今社會學家的觀察，將這種圖騰社會的組織及變化解釋得很清楚：一個圖騰社會所以能聚集一些份子，在一個社會裏生活，彼此同化，完全與其他一個圖騰社會明白的分開毫不混雜，便全靠圖騰信仰的關係。譬如相信大家祖宗是蛇的與相信大家祖宗是犬的絕對的成爲兩個獨立羣體，各有各的禁戒與信條，換言之，憲法不同。他們兩個社會的政治規律更不一樣，因此也便不能彼此相制裁。這個政治上的區別與統一并且不是由於地域或血族的關係，因爲原始的圖騰社會還不是農業的社會，而沒有一定的地方界限。他們的份子雖然都認爲是同出一源，其實并不是真的父子昆弟，而完全因爲共同信仰圖騰上所繪的那個禽獸或草木是他們共同的祖宗罷了。他們相信都有這位祖宗的血和肉在他們身上；他們祖宗是一個狼，他們便都是狼。這個祖宗狼所有的魔力，他們人人也都有的，并不是那一個特別所能專有。因此在這個原始的圖騰社會裏還沒有術士巫師的蹤跡，他們也沒有存在的可能。所以涂爾幹說：『這種社會的連帶關係，完全從他本有的兩種主要性格而基於成立：第一是宗教的信仰支配了一切的社會生活。這個社會』

的家族的集合，政治的組織，都是一些由信仰而來的共同禮節；便由這些禮節而使這個社會的份子一律的具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其次便是這種社會是有共產的形勢，全靠這種共產的組織，纔將個人完全吸入羣體，使他沒有獨立人格表現之可能。個人產業的制度本是個人觀念成立了以後的事。在這個社會裏，所以只有羣體而無個體，因為在物質與精神的生活上個體與羣體都早由那種圖騰信仰打成一片。在這個信仰之下，各份子皆應為絕對的犧牲；這個犧牲并且是一律平等，自然發動，而沒有特權階級驅使的事實。因為個體與羣體由信仰而絕對相粘着時，幾個份子沒有獨自擡起頭來的可能，更沒有建立特權階級的可能。術士巫師建立治者階級是要等圖騰信仰衰落了，而使個人有獨自擡頭的時候。（涂爾幹此說原文見他的社會分功論 *S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第一五〇頁及以下）

以上一段事實的敘述與解釋，無非說明原始政治社會并不是術士巫師所捏造，用來作欺騙愚民的工具，而是本着一社會全體的信仰自然發生的。原始的政治社會並沒有治者或特權階級；在信仰之下有平等精神，有「德模克拉西」的意味，不過這種「德模克拉西」是機械的，而不是自由意志的結果罷了。讀者看到這裡或者要懷疑問：這種圖騰信仰又是如何而會成立？如何而會衰歇？并且術士巫師是何時而始發生在這漸進化的政治社會裏面？

關於圖騰信仰的根源，近今有名宗教比較學家英人胡拉塞爾（James George Frazer）曾著書多種以論之。最近他更印行一本小書只數十頁名叫家族之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and the clan*），羅列歷來

各社會學家對於圖騰信仰的解釋，不下二三十家，我們把他略為分類，可以分作三派：（一）是靈魂說，以為文明人對於靈魂之義尚多迷信，何況野蠻人，并且做夢和生死的事實時時呈現於眼前，野蠻人無以自解，則或相信動物界遊魂的作用（*Transmigration de sâmes*）；因此圖騰信仰便近於死人與祖先崇拜。主此說者為威爾抗（*C. A. Wilken*）。或相信感物生人的作用（*Conception mystique*），因野蠻人不能了解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的實況，而懷孕之婦每自覺有感於外物，如中國神話履大人腳跡，吞燕子遺卵的故事，便是使圖騰信仰的成立。主此說者甚多，胡拉塞爾本人即其一也。（二）是自然說，以為野蠻人知識短淺，時受自然界的恩惠或摧殘，莫明其妙，欲發抒其感謝或畏懼之情，則只有崇拜一種辦法。主此說者多為神話史家，如有名文化史家英人戴意羅（*Taylor*）其特著者。（三）是論理說，以為野蠻人知識短淺，不能辨別名與實，文明人取義之稱呼，在彼則皆認為實物。譬如今人名小孩為狗娃子，在今人不過取「賤而易養」之義，而在野蠻人心中則狗娃子之與狗必有實質上的關係。且在野蠻社會其所應用之語言也不足以嚴行分辨名與實，故偶因其祖宗形狀或類某物，名或取某名，後遂認為實物，便成圖騰信仰。主此說者為名社會學家英人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與現今巴黎大學哲學教授來威卜呂爾（*Lévy Bruhl*）等是。

這三類解釋皆各有其理由，或者說這各種理由皆同時為圖騰信仰的原因亦無不可的。因為一種社會建設（建設二字係由 *Instruction* 一字譯來，此所謂建設，并不是實物的構成，如一社會共通之語言，一社會共有之信仰，皆為社會建設。）之所以發生及成立，其根源絕非甚簡單，而可一言以蔽之。我們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稱政

治社會之生爲少數巫師所捏造，由欺騙或強力的手段去勉強衆人加入，這種簡捷了當的說法足以使常識去認爲當然的事，所以不能不對於政治社會的原始狀態及其發生略略加以說明。現在我們再來略說圖騰信仰衰歇，術士巫師發生的這個事實。

圖騰信仰衰歇的時期便是社會權力個人化 (Individualisation du pouvoir) 的時期。我們前面不是說過，當其圖騰信仰正盛之時，一種由信仰而規定的原始憲法——當然是不成文的習慣法——雖然十分嚴厲，將個人活動完全限於社會目的之中，但是當時社會的份子人人都認爲同具一樣的魔力 (Mana)，在信仰之下，一律平等，而並沒有特權。特權者之發生由於這種魔力漸漸個人化，其原因乃是在某一時期，圖騰信仰由全社會的共有狀態轉變成各信一物的狀態。(有名英國社會學考察家斯賓塞與紀倫 (Spencer and Gillen) 哈東與爾里威爾斯 (Hart and Ellis) 在澳洲一帶所觀察皆有這樣的結論：各信一物則社會失其重心，而個人便遂以其魔力相爭衡，於是生出兩種現象：(一)是圖騰社會不能維繫份子，而地方社會——即部落社會——以生；(二)是爭衡結果，魔力歸於少數以制服多數。這兩種現象，據近今社會學家考其主因，還是因爲(一)當時農業進化，漸漸地減輕觀念強了，便代替了一部份圖騰信仰吸引份子的力量；(二)由於地域有定，村莊成立，便足以使女繫制 (viliation abetive) 衰落，而男繫制 (viliation masculine) 伸張，於是父權 (patriarchat) 成立，外族不得干預本族，而權力集中的趨勢日益擴張，術士巫師有發生的可能，所謂特權——即特別魔力——的成立確在這個時代。請看現今法國有名古埃及史家穆爾來 (Morel) 的敘述：『在十五年前，我們對於埃及的

主權可以忽然集中，有那樣大的特權，跟不能夠了解。……後來白特里（Pulley）和慕爾根（Morgan）的古物挖取，得着許多年代悠遠的埋藏物，纔使我們升到來源處，而認識一種新石器時代的古埃及文化，知道在權力集中於一主之手以前，埃及曾分作無數小部落，而各有其宗教與信條；其時信仰之各種神多係獸類。……根據舊物以推究，則埃及在遠古時期曾爲圖騰社會，漸進而爲仇對之部落，由「德模克拉西」意義的圖騰政治社會，漸進而爲主權專制的社會。……在原始埃及社會所有之圖騰信仰，既因分歧過甚而衰歇，遂由少數以至一人獨攬支配社會之權，而彼少數或一人便成爲多神或一神之子，可以上及於天，下及於地，同時爲國王，爲巫師，爲主教，以引人由地下之生活歸向天上之生活」（原文見由圖騰社會到帝國 *Des tribus aux Empires*）

書第二部第一章

根據上三所敘及之社會之存在發生，政治特權之在彼成立這些事實，我們至少可以得兩種教訓：（一）政治組織是由精神的需要信條的結合而發生，非係少數人所捏造；（二）政治社會原爲應一社會全體份之共同要求，而非爲少數特權者而在，所以原始政治社會反有一德模克拉西的意味。本這兩種教訓，我們相信政治社會以至國家這個較大的政治組織不是一種贅增無益的建設，而非一些說法便能取消了去。無政府主義之看法所以走入錯誤的地方，大半由於自中古以來爲君權辯護一些學說的反感，如神權說，天命說，在在都是使人誤會國家這個政治社會是爲少數或一人的利益而捏造的。事實上歷史事實上考求，這些說法雖與少數專制帝王之手盛行一時，但不久還是大多數的公意戰勝，以使一國內政的主權漸次歸於多數，而足顯多數

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古黑暗時代便有英吉利的法典運動（一二一五）以限制君主之行爲。自此以後，英人憲政日益進步，而引起歐洲大陸各國人民之覺悟，以有十八世紀孟德斯鳩、盧梭的說法。自從法蘭西大革命，民權國本重於君主之義大倡，從前是「天生民而立之君」，現在是「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了。於是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的憲法旨趣便大改觀：國民主權之基係奠於全國民之公意。這種公意便是每個國民生活之榮枯，全係於國家這個社會生活的榮枯，在國家這個社會之內，人人平等而得着相當的利益，則在愛國這個信仰之下，也是人人平等而去爲相當的犧牲。——這幾句話不應只當作原則看，應從歷史事實上去徵驗。自法國革命組織民主立憲國家，十九世紀歐洲各民族在建國運動都本這個原則，而現諸事實。——我在釋國家主義一文已經略略述過這類事實，這裏不再贅述，請讀者參看。——可以說自法國大革命以後一百餘年來國家這個政治社會的意識漸次真正成立，特別表現隨着這個意識，世界許多被壓迫的民族得着了解，自成獨立國家，而將他們民族的生活繁榮起來。十九世紀中間這些歷史事實，雖無政府主義者特別厭惡國家這個政治社會，而也不當一概抹煞了，以便完全否認國家主義的價值。

無政府主義者說：「若無國家主義，當無國家，若無國家，世界便太平了。」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夢想太平，不能不剷除國家，不能不推翻國家主義。這個論調和理想雖然很高，但是爲建立這種論調和理想的事實考察却欠周到透澈。無政府主義者既生在今日世界局勢已經成功這個樣子的時代，便不能從「若無」這兩個字起首去推論。自然是如果自來沒有，當然儉省許多事。——如果天不生人，世界便更太平了。現在既已有了，無政府

主義者使該當從有了以後，怎樣設法去着想。今日國界既已成立，被壓迫的民族要起來或是建國，或是復國，無政府主義者如果反對國家這個政治社會，該當快點設法使強者不會凌弱，被壓迫者早早得救。現在弱的民族或弱國還未曾得着無政府主義者來救他們，他們不靠自己全民族或全國的力量來奮鬥，他們靠誰呢？不過無政府主義者的施救的道路是本人類利害；他只見着人類的敵人，所以不願去分別國界。但是我們願意無政府主義者，試一用分析的眼光，從事實——歷史的和現今的——去解剖一下：全世界人類的利害是否是一致的，全世界弱民族的敵人是否都只是一個一種，而有其同德悔的可能；強者與弱者固然利害衝突，弱者與弱者又有無利害衝突之處？并且這種衝突——所謂凌犯，橫暴，壓迫與被壓迫等與各民族所具的知識與信仰，所處的地域與環境，有關係沒有？凡此種種，皆是事實，足資考察，而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寶貴他的甚簡單的理想，不願考察事實，而將所有罪惡歸之於國家。既謂國家為少數所捏造，而又謂國家之所以能成乃國家主義之過。國家這個政治社會并非為少數捏造而實應民族需要而生，我們已在前面略加辯白。至於一若無國家主義當無國家——一說，簡直係因果倒置，而將我們所詮釋的近代國家主義的真意義放在一旁，不加注意。我曾經在釋國家主義上說得清楚：國家主義的明白主張乃是近百餘年的事，其發生乃是由於拿破崙壓迫中歐南歐諸國而為其動因。所謂「國性」的要求，在十九世紀歷史上，一件一件的事實很明白。因此國家主義者所本的定義——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要求——不是理想而不問事實的。我們願意無政府主義者有時能够放下理想，而略對於我們就歷史和現今所有的事實而有的議論與主張加以注意的考察。

以上對於政治社會的起源略加說明，而主張其正當價值，以答無政府主義者的政治社會係少數特權者捏造之說。以下我們再來就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略加研究，看看人類社會就使如無政府主義者之辦法，而能够根本免却政府社會之効用麼？

無政府主義者相信他們所理想的或所要開始預備的社會可以沒有政府，沒有國家，沒有最高權力，因此他們便認政治社會和政治行為爲不必要，而可以免了去的。在這種想法之下，能够指出略爲具體的計畫，要算是蒲魯東與其徒。並且今日在法國、德國、意國有所謂革命的工會組織，與改良的工會組織相對立（*Syndicat révolutionnaire et syndicat réformiste*），便是根於蒲魯東的學說，以爲工會各個組織完善之後，大聯合起來，便可以調解一切，而無所求於政治權力的支配了。現在爲批判這種想法，請將蒲魯東的學說和革命工會的內容略述一下，然後便可見蒲魯東主張和工會組織，究能取消政治社會，免却政治行為與否。

我們知道蒲魯東是主張自由聯治主義（*Fédéralisme libre*）。他這種聯治說又係根本於他的「工作哲學」（*Philosophie du travail*）。工作哲學的意思是，以工作代表人類的全體人生，因此他不但，不願有職業以外的社會存在，並且不願意有職業以外的權力行使。蒲魯東曾說：「工作好比兩個人的愛情一樣，他是世間上最不能受其他權力干涉的東西。」蒲魯東之所以有這樣的哲學，因爲他的最終目的在人人自耕而食的農業社會。他這種思想很與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相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不過他生在近今交通已大便利，雖然願意人民一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不能再主張「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罷了。並且現今科學已發達，技術亦進展，工作的收穫全靠機器的發明與行使，蒲氏便不能同於老子的「絕聖棄智」與「削斗折衡」，而要尊重職業與技術的優良。於是他承認一種「技術上的權力」(Authority technique)這種權力乃是建設於分功制度與「工作知識」(Competence)上面。據他看由這種工作知識而生出來職業階級與政治權力所產生的政治階級不同，前者是由於職業能幹而自然有的責任的依歸，後一種乃是由於政治社會而遺留下的占有的衝動；簡單言之，前者是基於職業者個人本領，後者是基於政治家襲取的權威。蒲氏這樣說法當然不及老子的澈底。——老子在精神方面要根本使人無欲，在事實方面要根本使民不爭。蒲氏不敢這樣想，使根據他的工作哲學立出一種工作的階級，以求整理一切，繫屬一切。這一來，他的無政府便有變成有政府之勢，宗法他的革命工會的內容，也就不能不有政治社會的意味了。所以有人譏諷蒲氏所主張的是一「工作的貴族制度」(Aristocracy of the hand)。蒲氏的信徒如像主張大罷工以破壞政治社會的法人索爾乃爾(F. Solenne)便曾為蒲氏辯護，謂蒲氏所主張的工會工廠內雖有據職業知識的階級之分，而並無主人翁的地位，不得與政治社會的階級意義混為一談。他說：「蒲氏是主張以工人的羣力，本他生產者的精神，而脫離一切保護，以達到獨立的地位。在一廠一會所有的生產者中間雖有差別之見，但全在大家對於工作共同的感情關係，而自然樂意的公認最有工作本領者的權力。」索氏著進化的幻夢 (L'illusion du progrès) 歷數政治階級之黑暗，而結論在取消政治社會，雖「德模克拉西」的政府亦所反對，因此與法國擁護民主主義的學者大起辯難。如像他為蒲氏辯護主張建設權力於工作知識之上，而民主主義派便回答他道：

「這不是依照「德模克拉西」精神而有的選賢與能，倭倭在位的主張一樣嗎？我們德模克拉西的政治社會，不是以政治知識的本領爲階級的標準嗎？在精神上既不相衝突，而又何必如此非難呢？」（本 J. Guy Grand 著 *Le Procès de la Démocratie* 第二章中所敘述的大意）

主張德模克拉西的政府的學說家常與蒲魯東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爭論之點總在道德與精神方面，我們却不然，我們以爲道德儘可以主張得十分高尚，精神儘可以要求得十分純潔，而同時却不可不顧到事實，人類根性與現今社會的事實。因此我們總覺得無政府主義者甚高的道德觀在實施方面去證驗，未免有些簡單。就以蒲魯東主張取消政治社會而代以職業的自由集合一點而論，他所根據的有兩種重要的設想：（一）蒲氏相信絕對無限制的自由競爭（即人人皆有競爭機會與實力之謂）反可以有益於小產主與小生產者，因是而社會反可以得平均的發展。蒲氏曾說：「爲使自由競爭有利無害起見，只須使產業得着相當的保障。先改革交換制度，次改革教育制度，則是時自由競爭不但致爲壟斷者所利用，而且足以有利於小資產；因小資產乃最能生產而無害社會者。」（馬克斯呼蒲魯東爲小紳士，便因蒲氏有這一個根本主張）（二）蒲氏並且以爲小資產與職業的集合都最不能受政府權力的干涉，他們該當是憑着良心而自家裁制一切，因爲他們對於職業既有甚深的情感，而公道即自然發現，不必要第三者的審判了。（大意見 *Aime Perthol* 著 *Troublon et la propriété*）如果蒲氏這兩種設想都能成爲事實，那嗎，政治的仲裁權可以說是無所用之。不過蒲氏在第一設想上所謂之相當保障恐怕是終久難於實現的。就使能够實現，我們要問他究竟能够防止小資產不變成大

資產麼？如果要防止小資產之互相吞併，政治的干涉究竟可以少得了麼？推究蒲氏於此第一義還是在改良教育，使人人能得着相當的能力，然後無限止的自由競爭纔能有利而無害；這本來也是民主主義的政治的理想，而時時在向這一方面做去的。但一日民智未真正平等，則不能認此理想爲真實事情，而便要立刻否認了政治干涉和限制的行為。至於蒲氏所設想的第二義，全憑着良心與情感，更是難說得很了！如果這樣多的團體中份子不依着良心與情感，去向公道方面做，又怎樣呢？蒲氏於此會自己明明白白的答道：『如果人民自身不具兩種資格，即自己能監督自己而同時又能監督別人，則所有理想社會的基礎便都解體了，還是該當回到政治制裁與警察干涉的社會。羣衆的良心不重新改觀，他所要受政治的壓迫的痛苦是沒有藥醫的。』（見 *André Bérthod* 著 *L'Attitude Sociale de Proudhon*）蒲氏於此大有「慨乎其言之」的口氣。他自己所答既如此其明瞭，政治制裁之需要與否，不俟我們再來多言了。我們主張民主主義政治的人其所以極力尊重教育，限制資產，又何嘗不時有蒲氏的理想在。不過不像蒲氏有時爲理想而發狂熱，於是高呼：『自由的生產者，自由的交換者，爾等當不受一切以至最輕的政治權的干涉』罷了。

隨着蒲氏而起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活動家即所謂主張革命式工會主義（*Syndicalisme Revolutionnaire*）的人，其態度便不如蒲氏這樣坦白；他們無非藉蒲氏說法以爲鼓勵工人之具。在法國有 *Henri* 是而否認一切政治生活的必要，而主張以總工聯合（*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替代一國的政府，所謂以經濟的社會代替了政治的社會，以工廠代替了政府。——這個說法本來在十九世紀中葉聖西門便有說明白的表

示了，不過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趨向是兩樣的。——我們姑不論，就今日社會情勢，一國的總工聯會能够代替一國的中央政府與否，就使能够代替，我們願意考察一下總工聯會的組織及其行爲，是否使沒有了政治社會的意味。總工聯會還是要由選舉的形式，由各工會舉出代表以組織議事的機關，裁判的機關，以及一切執行工會規律的機關。我們姑放下職業以外的爭端而不提，——姑照着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人人安業樂居，便無職業以外的事可言，——單單論到職業上的糾紛，這是我們天天看見的，也是總工聯會所認爲唯一要務的，如工資規定的變遷，消費與生產之調劑等等，是不是政治的行爲，並且有時總工聯會處理這些事情，常常還靠政府的幫助。——固然是他同時又厭惡政府的存在，恨未能完全襲取着政府的權力，不過設使完全襲取了政府的權力，他使更成爲政治社會了。何況在職業以外，終不能免的個人間的糾紛還多得狠，總工聯會假如襲取了政府的全權，又焉能置之不理呢！

說到這里，我們更可以明瞭政治社會是有他的特殊功能（*Function special*）而不是一種理論或捏造的結果；不但是一種理論把他取消，而且就要在事實上取消他，也非有能完全代替他的功能的機關不可。無政府主義者假使能用革命的手段取消了一國的政府，而其總工聯會便非具有代替一國政府的能力不可，不然，一國的政府絕不會消滅了的。如果總工聯會完全代替了一國政府，則主張革命工會的無政府主義便將變爲有政府主義了。

現在只剩下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一義的解釋了。十九世紀中間社會哲學家如主張國家主義的黑格爾與

主張無政府主義的蒲魯東都是善於用邏輯學上的矛盾律來將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并立起來，以求一個自己滿意的解決；黑格爾是主張個人自由該當為政治社會犧牲的，他所謂客觀的精神（社會）當包含所有主觀的精神（個人）以成就絕對的精神（國家）；他這一說可以名之為絕對國家個體說（*Theorie de l'Etat individuel*）。而蒲魯東則不取黑格爾的綜合論，願意將權力與自由始終對立，而求有以兩實現之。他主張絕對的自由，同時又主張絕對的權力，以至不願意政治家去為彼而犧牲此，為此而犧牲彼，他以為兩者均不能少受損害，少受損害，則公道將受冤矣。蒲氏何以有丁這種態度——（而且這種態度占却了他一生；在他甚多的著作裏，無一本中不有這種矛盾對立的態度）——這是原於他的知識與情感不能相容的關係；他用社會學的眼光，認識了一個羣體單獨的存在，而同時又受大革命的影響，愛護不易得來的個人自由。所以他一面在論理上表明羣體的獨立存在道：『許多個人單位的聚集便新生一種特別的存在，這種特別總體的存在比較那個人單位的總合要多一些東西，是另外一種東西』（*La réunion des unités individuelles engendre une réalité originale, quelque chose de plus et quelque chose d'autre que leur simple somme*）（見巴黎大學教授Bongle著蒲魯東的社會學 *La sociologie de Proudhon* 敘言）而一面又為個人自由而反對一切由羣體所產生的權力道：『吾愛自由甚於真理，吾愛公道而同時不能棄自由』。於是他為感情所驅遣，而為一切自由將國家的存在理由都地却了。但他同時又贊美他的祖國道：『啊！祖國，啊！法蘭西祖國，永久革命家鄉的祖國，自由的祖國，我愛這個祖國，如同一種子大親其母，父老親其子的愛情』（見 *La Revolution sociale par le coup* 卷末頁）

蒲氏的論調雖呈現矛盾的現狀，但是我們對於他同時能認得羣體，而同時又能尊重個體，這種態度是不失爲情感與理想俱高的學者。不過他未能始終認定盧梭之說而去將個人自由與政治主權打成一片（蒲氏的根本思想與盧梭頗有淵源而蒲氏亦嘗道及之），以致矛盾到底，而遺下的無政府主義不但爲論理所不容，（馬克斯著哲學的愁苦一書即痛批駁之）而且爲後來信徒所誤用，對於權力與自由兩義均未做到恰當好處。近今主張德模克拉西的國家主義者於蒲氏所愛惜之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二義均未嘗一刻忘却，而欲以國家這個政治權力實現國民這個個人自由。德模克拉西的國家主義是根於盧梭所有的主張，基於國民全體的志願：『只有國民的全體志願能够本公利所在的社會目的，以爲國家權力之指揮者；因爲以互相衝突的私利而能必需社會的存在，乃是私利能有所共通之點而使社會的存在爲可能的；便是這個共通之點而成立社會的連結關係；如果沒有這共同之點，沒有一種社會能够存在的。』因此指揮社會者當唯一的認識此共同之公利而求有以實現之。（見民約論第二卷第一章）我們主張國家主義亦是深認識此國民共同之公利而求有以實現之而已。

（二）答共產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也好以其見地攻擊國家主義，并且主張國際解決的共產主義者知道民族自決，國家自強這種思想與他們以俄國政府爲中心，以世界平民爲一家的鼓吹大大不利；所以情見乎辭，劍拔弩張的定要將民族這種精神存在的理由取消了，國家這個社會發達的歷史抹煞了，以便使國家主義無立腳的餘地。他們所根據

以否認民族精神，國家社會的理由是本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照原文 *Le matérialisme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 該當譯爲「歷史的經濟唯物觀」方爲盡義，不過普通既已習用，便亦沿用此稱。但馬氏唯物史觀與其他的唯物主義，大不相同，不可混爲一譚。有德人 *Lange* 曾著唯物主義史以辨別之，可資參考。)因此我們不能不就唯物史觀加以批評。(一)我們去考核一下馬克斯以唯經濟的眼光所規定的社會進程的公律，究竟正確與否？如不正確，便不能據之以抹煞歷史上相沿至今而猶向前發展的政治事實。(二)假使其所規定的封建破壞，工作自由，資本集中，平民造成，這種種條件可以爲勞資對抗形勢所以成立，國家政治社會所以破壞的原因，我們便去考察一下中國現今的社會已具備這些條件否？如其不具備，則不能遽置國民一義，而只主張工人利益；換言之，則不能便棄全國合作之可能的趨向，而去取勞資對抗未成的形勢；更明白言之，則不能便棄國家主義而去行共產主義。(三)何況我們偶一用社會學的眼光去解剖一下歷史事實與社會組織，便覺着馬氏所指的條件并不相連系，而所認定的勞資兩階級對抗的方式也未免過於簡單，不能以爲社會革命的根據。(四)最後我們願意就歷史事實與社會組織，指示馬氏之徒以精神生活足以支配物質生活之義；明白言之，即生產方式不但不足以規定一切制度與信仰，而制度與信仰在在足以規定生產的方式。

上面所謂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乃是認定所有歷史的進程，社會的發展都隨着經濟組織的方式而有一定的變遷；這種經濟組織的方式的變遷又完全隨着生產的方法，所謂生產的方法——即機械之謂——規定出一定的政法制度，而道德宗教以及一切知識上的理想又都全靠這一定的制度。馬克斯有幾句話最形容

得出他的意思是：「以臂力磨麥的生產方法給我們一個有專制君主的社會，以汽機磨麥的生產方法給我們一個有實業資本家的社會（見哲學的愁苦）。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普通規定了一切社會，政治和智識生活的歷程（見政治經濟批評敘言中）。」馬克斯既認經濟組織為歷史事實的「實在間架」（infrastructure），而以理想道德、法制等皆為「空虛間架」（superstructure），又在共產黨宣言上面以純經濟觀的態度否認了近今國家存在的理由，所以他的信徒無論再覺得自家祖國到了如何危殆的地步，他們都不以愛國為然，不以主張國家主義為當。他們用馬克斯一句話便關了大門：「平民是無祖國的。」但我們現在一開始如果使用人類情感方面的解釋，去與馬克斯之徒爭辯祖國之有無，他們一定不願承受。因為他們的大前提既然是物質生活支配一切，情感生活本來是不重要的。因此他們屢屢非難國家主義，也是用精神不足靠，情感不足重那種老腔調；接着便是沿着馬克斯和恩格爾的進化定律說背誦一番，以為至當不移的根據理由。因此我們在為共產主義者說明精神生活，情感生活足以支配物質生活之先，必得要批評一下馬克斯和恩格爾的進化定律，以備共產主義者的參考和思量。

自馬克斯的說法行世以後，批評他的論調很多。舉其最著的，如蕭魯東「為自由一義而惡共產主義」，呂爾（Dühring）「重法制一義而薄經濟組織」。此兩種批評，馬克斯與恩格爾皆及身見之，而曾各著一書以為答辯。後來馬恩二氏已死，因為歷史遺蹟的發現，證人生活的參考，歷史學與社會學皆大大進步。德國新歷史學派有比舍爾（Bücher）出以社會分功的論調批評馬氏經濟學說之簡單，而莫法的名社會學家如弗列熱爾

(Frazar) 涂爾幹 (Durkheim) 等或以比較宗教學的結論而反對唯物史觀，或以社會連帶關係的說法而非難重工思想。其他哲學家以倫理觀念、邏輯方法矯正馬氏說法的甚多，我們不能在此一一詳舉。并且我們覺得馬氏既會時時以歷史事實爲重，每道『讓歷史說話』，我們便先來考核一下馬克斯所徵引的史事，恩格爾所依據的古人進化，究竟正確與否？究竟能就這些事實便定爲公律以概括全人類社會進化歷程與否？

馬氏資本論中所唯一依據的史料乃是『近代的英國』。他在資本論序言中便指明道：『我在這本書中研究資本家生產的方式和資本制度所應有的生產與交換的關係，英國便是這種生產的模範場。此所以我在英國這個地方搜出一些重要事蹟，一些重要比方，以爲發揮我的學說的幫助。』馬氏何以只考察英國一個地方，便敢定出他的公律以概一切社會，因爲他相信英國的榜樣便足以指出大陸各國將來應走的路子。所以他接着說道：『實業最發展的地方，在此時便爲後來追隨一樣實業階梯的民族指出他的將來的形勢。』馬氏據這種挂一漏萬的史事觀察，所以便敢取預知的態度而定下了公律，因爲他相信這是本科學家的態度。他在資本論序言上又說：『物理學家爲考驗他對於自然所應用的方法，或是趁自然現象不爲混亂勢力所遮掩而呈出最明顯的形式時去下一研究工夫，或是在最足以規定自然現象進程次序的條件之下求一些經驗知識。』馬氏原來是本物理學家的態度，他自稱他的社會主義爲科學的，也便是爲此，錯綜千萬，變故多端的有機社會組織能否與物理學上的對象視爲一律？這是第一個疑問。就退一步說，設使活人自動的社會組織與完全受氣候外力所支配的死物狀態能够視同一律，而馬氏只考察英國一個地方的事實，便能够算得盡科學上歸納方

法的能事，而遽定下公律以概括一切嗎？這是第二個疑問。第一個疑問已經爲現今一些社會學家所解答：他們就歷史過去事實的證據，近今社會組織的解剖而與科學派（scientists）的比擬論（paranaeogy）一個大打擊，使他們明白社會事情不如是其簡單，而不能够與自然界的死物相比。至於第二個疑問，我們願意在以英國社會歷程比中國社會歷程之先，於這裏介紹現今法國名社會學家加斯同里沙爾（Gaston Richard）一種比較的说法。里沙爾在他的社會主義與社會科學一三〇頁道：

「……馬克斯的結論是以爲英國社會足以爲大陸各民族指出他們各人將來的形勢。我們於是便首先不以爲然。法國在實業發展上自來并不下於英國，而以生產能力論，在一些地方看來，還等而上之。他的（指法國）生產的方面還要圓滿一些，調和一些。英法兩社會的分別與其說是人力，毋寧說是地利。英之所富在礦產，法之所富在農產。英法之資本兩不如下，然而自十五世紀以來，法國的經濟歷史在主要點上，使與英國完全異致。照馬克斯的意思，資本之集中於少數資本者之手是要在工作變成一種商品可以自由買賣的時候，爲此必須待農奴制度的取消，而且須「無土無家的平民階級」之造成，換言之，必須要土地與工作者斷絕了一切關係。馬克斯在英的考察到了這樣的事實，他便毫不遲疑的概括推論到別的國家。（參觀資本論第八部第二七八兩章）

但是只要略爲與法國社會相習的人都知道法國社會的變動歷程恰與上述是相反的。歷史的探討，打破一種偏見以爲小農主的產生是大革命時的事。其實這個事實，在很早便成爲法國社會經濟史的特點，而

且他有大造於法國大革命。(參看Daniel著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légalité*) 在取消農奴制度之後，法國的農人工作者不但未與土地分離開來，並且他們倆的關係特別比前密切，法國農民在革命前便有永久佃耕之權，而自革命後使得着永久地主之權。馬克斯所指定的資本組成的第一個條件在法國便算不具備的。在法國，土地是由貴族僧侶手中送到佃戶與農夫手中，不像英國是由「鄉紳」(Yeomanry) 送到「地主」(landlords) 手中。至於資本組成的第二個條件，照馬克斯的意思，是在於殖民地之掠取與開發。(參看資本論第三十一章) 我們姑且不必核其實事內容，因為如果英國荷蘭以殖民地而達到資本制度，但在法國這個條件之不具備是很明顯的。法國古來不但沒有比英國那樣繁富的殖民地，並且自十八世紀以來幾乎完全失去，經過大革命，便沒有一點殖民地。可以說十九世紀之初馬克斯所認為不可少的資本集中的中心力量，便在法國尋不出來。然而此時便是資本集中的重要時代。並且在這個時代，西班牙之向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的掠取遠過於法國，而西班牙之資本集中在當時反不及法國遠甚。這樣粗路的以英法兩社會相比，已足指出馬克斯立論方法的毛病：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不分辨社會的組織樣範 (types sociaux) 之各有不同。并且社會進化之於他，好像規定了一致的程序，無非在這裏早點發現，在那裏遲點發現罷了，而並沒有根本不同之點。他不知我們所能觀察的人類進化，欲求其正確不妄在在不能離開兩大事件，即各種環境的不同與各種環境的適應 (*la variabilité et l'adaptation aux différents milieux*)。

里沙爾這個比較非常明瞭，不但他根據很顯然的史事，證明英國的經歷不能斷為歷史的公律，并且他根據近今社會學的結論，指出馬克斯說法的簡單，而忘了社會環境一義。我們現在可以根據馬克斯所指定的資本集中的兩個要件，來在近今的中國社會考察一下：（一）馬氏所謂資本之集中，是必須土地與工作者斷絕了一切關係，這又必須待農奴制度的取消，工作變成一種商品，可以自由買賣的時代。就便這個條件不是馬氏個人的臆說，現今中國是達到這個時代了嗎？只要略一顧及中國社會現象，便知其不然。在嚴格說起來，中國的農奴制度還未曾取消。甚麼叫農奴制度呢？就是農人成了土地的附屬品，他隨着土地，賣給主人。他的勞力不但不能自由買賣，也是隨着土地的。中國現今的佃戶人家豈不是這樣的？據我個人所調查，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北方各省田地的買賣，只換主子而不換佃戶，已是一個最普遍的現象。所謂「千年田地八百主」，而張佃戶，王佃戶，子子孫孫屢世代耕下去。他們對於主人奉命惟謹，除了納租穀以外，主人有所需索，是不敢反對的。這個事實至少不能不說是有封建制度的色彩。農奴制度既未完全取消，所以工作在中國還沒有成自由買賣的商品，有時簡直無價值可言；不但不能應用馬克斯的代數式子去那樣精確的比較盈虧，可憐中國工作者的勞力，是屢次不惜完全奉送以要主人的歡心的。（二）至於第二個條件所謂殖民地的掠取，在現今中國不待事實的說明已大家知道可憐的中國漸漸已變為別人的殖民地而大受掠取，那還够得上說掠取殖民地嗎？

據這種比較的事實，現今的中國不能與英美各社會相提并論，已很明瞭。就使承認馬克斯的進化律的必然趨勢，現今的中國社會距實業發展，工作自由，資本集中這個階級還很遠，那裏便能說勞資兩方已成對立形勢，

那裏便能去講共產主義——至於說到俄國，在赤色革命以前，還是農奴制度的社會，也并未達到工作自由，資本集中的一階級。但是蘇維埃政府恰也因此未能達到共產革命的目的。革命之初，頗迫將全俄土地收沒了百分之二十七。到了後來，因農人大起反對，於蘇維埃政府前途大生危險，不得已又將土地漸次退與農人。去年第三國際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布加立金（Boulhacine）曾說得明白道：『我們原則上是主張大開發的，我們爲連絡農人起見，乃纔分給土地與他們。』可見俄國政府對於生產具集中一個辦法，在俄國現今這個社會是未嘗辦到的。何以不能辦到？自然是因爲不合馬克斯「資本集中於少數」的那個條件。因此可以說俄國這次革命并未遵照馬克斯的規矩。馬克斯雖有「早點暴動」的主張（Catastrophisme），但未會說是在農奴制度尚存的社會裏便開始共產革命。有人說俄國這次的暴動叫作「倒革命」，就是先把政治權奪着，然後用人工製造法去創造共產主義的環境。這又是另一種辦法，與馬克思所主張又不同。我們不必在此批評了——我們於此所欲警醒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的，只是不要固於俄國一時的現狀，而該當謹守他們的師說，先讓他們所不滿的小紳士們去用力把馬克斯所稱道的「在歷史上曾經太有効用的國民革命」（語見共產黨宣言）做成功了，然後再等機會——馬克思所指的機會——去實現他們的共產革命。我們儘可以說中國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完全是資本主義的罪過，但是不能立刻便結論說中國人此刻取消「國家觀念」，打破了國家界線，去與俄國政府合作，即足以打倒資本主義以至帝國主義。至少要照馬克思所說，等世界各國平民有了真正覺悟，真正團結的時候，據現狀看來，英法日美等帝國主義者正利用他們平民的汗與血來侵略別人，俄國政府竭盡全力，

困俄數年，僅以身免，而至今猶兢兢有不克自保之慮。何況中國列強早已殺入腹心，楚歌四面，不從團結國民一致對外方面下手，而還來在國內鼓吹階級鬭爭，以滅殺對外的戰國力？如此既不遵守馬克斯所指的條件與時間，而又不明瞭中國與俄國不同的形勢，任意孤行，徒滋紛擾，國家主義者以國命爲念，又焉能坐視不理？明白些說：我們國家主義者在此時之所以要積極的用力於團結民衆，一部分便是看着共產主義的行爲足以分散民力，有事誤國，而思有以矯正之，救濟之。共產主義者不知外觀內省，而反日與國家主義者爲難。雖加入素重民族主義的國民黨以從事於國民革命，而仍堅持勞資對抗階級戰爭之義，以釀成民黨內部許多不安的現象，大足滅殺國民革命的實力。因此我們不能不接着爲共產主義者一譴階級戰爭，勞資對抗之在社會實事上，并不如在馬氏筆下的那樣簡單而且真確。

照馬克斯和恩格爾的意思，由現代科學文明，機器世界所組成的生產方式，足使社會成立兩種主要階級，彼此對立着：資本或紳士階級，這個階級是把握着生產的工具的工人或平民階級，這個階級只有自己工作的能力，所以他必得要迫而出賣他的能力與資本把持者；於是便成了資本把持者的附屬品而大受其掠奪。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不但不相同，而且恰恰相反。因此戰爭的狀態便成立了：不是你滅了我，便是我滅了你，或者照馬氏的判斷，一定是平民起來滅了紳士。如果前者的階級意識已明瞭，用革命的手段，一旦便可推翻了資本制度的組織而代以共產制度的組織。在未推翻以前，馬氏教導工人們不要爲他們的主人——資本家所騙，而爲資本階級利益所寄託的國家去犧牲，所以他的共產黨宣言末尾一句是一世界的平民，你們聯合起來啊！因此，共

產主義者之反對愛國這種精神和國家這個組織，乃是因為他們只以階級的利益爲實，而不以國家的利益爲然，只以階級的生存鬭爭爲常，而不以民族生存的鬭爭爲然的。爲此我們不能不在這裏將馬氏所謂階級之義先行加以批判，然後再說到國家之內各階級共存的必要與可能。

我們知道馬氏之規定社會階級，是純從經濟方面着眼的。照馬氏的意思，每一個社會裏的階級的區分沒有不是完全系於其社會分子所保有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方法。但是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太狹。階級的意義中固然含有經濟的原素應當重視，不過情感的原素與社會的原素也應同等重視。所以後來的社會學家之區分社會階級另有許多與馬氏不同的看法。社會學家由考察社會事實的結果，不但見着此國與彼國間，此種與彼種間，其階級之觀念與分別各有不同；而且城市與鄉村間，商人與田家間，雖在一國之內，而其階級之觀念與分別亦各有異。在歐洲一鄉城中，其社會階級之區分并非由於經濟條件的結果尤顯而易見。貴族階級在今日歐洲最窮而無實力，然在鄉城則尙赫然居各階級之頂點；其次始爲所謂大紳士，即大農主與大實業家；復次爲官中執事人與學校教授；復次爲城中小商，所謂小紳士是也；復次爲店夥，最後乃爲工人。以最末一級之工人比最高一級之貴族，則工人之所入往往比貴族爲多；以小商店夥比之官中執事人，則其經濟生活亦前者遠過後者。但貴族之女無論如何，不願下嫁工人；而官中執事人雖終歲勞苦，無有存儲，而總鄙小商店夥爲賤業。并且不但同在軍中奉職之士官，出自行間者與出自學校者乃有階級的歧視；即在鄉村共同作業之農家，出自舊家者與來自遠地者亦有階級的等差。同是工人，做細工者每鄙粗工；同在一廠，爲工頭者每鄙雜役。凡此事實皆非一經

濟觀念爲之中心，而社會習慣與智識等差在在足以助成階級的歧視。如果要主張階級戰爭，則凡此等等皆是爲戰爭之端，何獨只取出大紳士與工人之對立狀況，而盡棄其他？馬氏以前之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皆未嘗立論於階級這一點，而主張「各盡其所能，各取所需」(A. chacun selon son oeuvre)，雖被馬氏呼爲烏託邦的理想；但我們認爲這種理想尙合乎社會的真象與正誼，而不似馬氏竟抹殺許多社會職業之功能，而只注重工廠工人之生產力，不如聖西門所定「坐食者與力食者」之分之爲妥當。且馬氏也未能始終只限於工人與紳士兩階級之對立，而在共產黨宣言上曾數到了四種階級：(一)有資產的紳士階級，(二)平民階級，(三)封建貴族階級，(四)小紳士階級。在 *18 Brumaire de M. Louis Bonaparte* 上，他又數到了五種階級：(一)有資產的紳士階級，(二)平民階級，(三)有土地的貴族階級，(四)小紳士階級，(五)農人階級。在 *la Lutte des classes en France* 上，他又分資產的紳士階級爲兩種對立的派別：財政家與製作家。在 *la Revolution de la contre-revolution en Allemagne* 上，他又分農民階級爲大農主與小農人。合攏起來，便已有七八種階級。如果馬氏再細心考察一下，或者他還要發現一些階級來的。不過馬氏相信這些階級將來都會消滅的，他以爲數年之間，小紳士爲大資本的競爭所敗，便會消滅；小農主爲機器農業所吞蝕，便也要變成以勞力賣錢的工人。但是據近今職業統計的結論，馬氏這種擬議已經又被事實否認了。從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二〇年，不但小紳士賴生產與消費協作社之力未曾被人吞滅，而且在德國法國，從前以力賣錢的小農人反轉因爲城市工業發達，鄉人減少，農力值錢，漸漸都變成小農主了。我們曾經走過德法許多鄉村，幾乎是每個農人都有幾畝田的，而且在德法

的城市裏，我們也未見得小商和手工業便消滅了。

馬氏學說的重心既歸到了階級戰爭一義，要階級真能對立作戰，則不得不把資本家與工人兩種階級明顯的對立起來，中間掘下一條深溝，使他們無論如何不會合了起來。其實他們倆平常合了起來用力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對於國家的救護上面。——馬氏及其徒要先否認國家存在的理由也正爲此。——祖國一義其在精神上足以維繫一國國民的心情，其在物質上足以保障一國國民的幸福，無論貧富皆是一樣的。敵國侵入，富者固受損失，而貧者在精神上與在物質上便毫無所損失嗎？國家衰亡，富者固然不爲人重，生趣甚少。——如猶太富翁——而貧者豈不更是要先陷於實質的奴隸之域——如印度紅頭阿三——了嗎？此其所以「顧念家邦，憂心如搗」，「天下興亡，鄙夫有責」，「祖國之義先於一切」，無論古今中外除了馬氏與其徒，大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爲防護國家的光榮與利益，不界於貧富，合力向前，雖萬死而不辭的此種心情。——救護祖國的心情，既由社會事理鍛鍊而成，已有了一種社會力，萬萬不可抗。馬氏自身欲抗此力，便大遭失敗。（請參看譯國家主義一文最後一節所徵引的馬氏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的活動）這回大戰開始的時候，所謂第二國際又蹈了馬氏的覆轍，所以眼界少廣一點的共產主義者，常不願抹煞這種事實，而直捷了當的承認祖國情或的正當，國家存在的理由。我們在釋國家主義第一篇文中已引過拉卜里約拉（Labriola）的話，現在我們再引一八九八年二月巴黎月報（*Revue de Paris*）上一位集產主義者的說法，他道：「國家既然在歷史上已有多久的變化時，既然他已由漸漸的在一大羣人裏創造成生理的相同，思想上的相合時，他便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體」（*ibid.*）

organique) 并且他的一些特點深深的印入個人之中，以致國家滅亡，個人不但覺得知識、道德和物質的生活一落千丈，而且精神的活動都衰滅了 (diminution vitale)。」他接着并且說道：『如果侵略的國家用侵略的方式在被侵略的國家裏就使實行了共產主義，而為平民剷除了資本制度的淫威，這種被解放而同時又被侵凌的工人階級還是將有一種不可救治的痛苦，去感覺到自身終不免於奴隸，雖得着表面的經濟上的勝利，而不能！在正誼之中去享受這種新得而與其本領相稱的經濟的自由與快樂。』這一段話形容得何等切實而且明瞭！人不只是為經濟生活而生，還該當是為一些理想一些情感，而其生始能暢；一國國民不會是因經濟生活有差別而便要解體，反之，乃是因情感相同而愈益集合。此所以馬氏之徒純從經濟的片面着眼，而不能見着一國之內各階級有共存之必要與可能也。

馬氏對於社會歷史事實所見終限於片面的，其原因還是在他的中心思想只承認經濟生產的力量，而以一切道德信仰為被動的。其說頗似自希臘以來一派唯物哲學。但唯物哲學大抵根於玄學上物之動力 (mouvement de matiere) 說法，而非馬氏偏於社會上的生產方式一面。「由物質到思想或由思想到物質」這本是玄學上的一個老爭點，而且是一個轉不出去圈子 (cercle vicieux) 馬氏所師承的費爾巴赫 (Feuerbach) 與黑格爾 (Hegel) 在宇宙進化論中，於此還再三辯論，而馬氏則願離開一切唯物哲學——即所謂玄學的唯物主義與論理的唯物主義等，其分別見「第一卷 唯物主義史」——的爭端，而只就社會經濟立論。故有稱馬氏學說為「唯物史觀」 (materialisme historique) 而馬氏則情願「歷史的經濟唯物觀」一稱為能盡其思想。他所

以必取歷史一字便是爲表示異於玄學的與理論的唯物觀，而係從社會事實解剖入手；其所以特加經濟一字，則爲表示其與普通的唯物哲學不同，而係專注意於社會經濟生活方面。他的立論既從一部份社會事實的解剖入手，我們也應解剖一部份社會事實以爲對證。他既以爲由解剖的結果而認得道德和信仰等精神生活係附屬於經濟生活的，我們也願就所解剖出來的試看一看這個認識可以得到一個反證與否？

可以說近今社會學家從觀察到解剖，一大半是將馬氏的說法反證了的。我們在前頭答無政府主義者文中曾引了許多社會學家的結論來證明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完全是根於其所信仰的宗教；他的經濟生活也是這樣；圖騰社會在生產方面專養一種禽獸，使之生長蕃殖。這并不是爲本族食料之需，是因爲信奉此種禽獸，而不敢殺了他以爲食料，反要用心象養起來。在每年一次的大祭的時候，纔就千百萬中選出一個殺以爲祭。祭後，族中各份子必分嘗一瓣，認爲這樣是自家血肉與祖宗的血肉親密的接觸了。這個祭祀名曰「因丟休馬」(Intichiuma)這種分食名曰「亞爾溫達」(Arund)在澳洲圖騰社會裏面算是最大的禮節。但是養着這樣多的禽獸而每年只殺一個，豈不是要無地可容了嗎？他們於是找信仰不同的鄰居來彼此交換；譬如信仰牛的與信仰馬的每年便以甚多的牛馬相交換一次，習以爲常，成了澳洲與北美圖騰社會的慣例。社會學考察家曾有這個經驗：此圖騰信奉牛而不殺牛，則其鄰居圖騰一定專以食牛爲事，而又并不必養牛。（祭禮的詳述與解釋見 Durkheim 的 *Forme élémentaire de la vie religieuse* 觀察的詳述見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p-204 及以後諸頁）

這種生產與交換的動因皆係根於信仰而來，與經濟史觀所見恰恰相反。馬氏之徒或將以爲野蠻人的生活不應與文明人的生活這樣的相提并論，但是馬氏之合作人恩格爾普取野蠻人生活以爲經濟史觀之根據。恩格爾普做家族宗教的起原時，曾據來威斯幕爾根 (Lewis H. Morgan) 在愛羅瓜 (Uroguis) 的觀察，用純經濟的解釋以爲人類社會的起原時是在共產的狀態，自由的取天然之物以爲生活。作者呼這社會爲絕對的共產社會。後來因爲要制服猛獸使成家畜，女子的能力不夠，於是男女的平等便取消了。這種家畜的私產既成了相應的遺傳物，小孩子和女人便成家畜保有者——男子——的私有品。這個時候便是女子在歷史上打了敗仗的時候，從此便再不能翻起身來。（見原書第二章）這個時候也便是野蠻狀態變成虐役態度的時候，鐵器發明使農業成立，田產私有，便規定階級之不平等的發明，商業的成立更使階級之分愈嚴，於是始「捏造」出政治社會的國家，以爲所有著階級保守特權之用。階級戰爭在此時便激烈起來。因階級戰爭之結果，奴隸制度一變爲農奴制度，再變爲勞工制度，便成功今日勞資兩階級對立的狀態。（見原書一五七頁及以後諸頁）

恩格爾普這樣的用純經濟眼光解釋蠻人生活的進化，又被後來的社會學家否認了。譬如他認女子之失敗原於馴養野獸這種生產狀態，而後來沒社會家都看見圖騰社會的女子在本族中與男子——如他的弟兄等人并不分高下的。這是因圖騰社會有一同族不偶 (unisex) 的迷信，必得要在仇敵的外族去奪取女子的結果，便把女子當作掠奪品或販賣品了。這個事實并與馴養野獸的事實無關。又如恩格爾普謂階級之分是原於鐵器

農業的生產方式；而後來社會學家都考察到澳洲社會階級之分，遠在鐵器農業成立以前，人類國家之成立，恩氏謂為錢幣發明，商業成立的結果；而後來社會學家都考察到北美和南洋新基列（New Guinea）羣島不但已有王立國，而且已有國際的關係，但尚無錢幣的發明（參看 *Smith* 和 *Malinowski* 對於蠻人生活考察之近作）

恩格爾特別要徵引原始社會的生活，來用純經濟的解釋，無非要使馬氏之說愈形圓滿，而不知經濟社會學家的考察，其受反證和否認也與馬氏之說同其命運。近今社會學家專研究印度風俗的，把印度人的生活考察了出來，更足以反證恩馬二氏之說，而為信仰等精神生活支配生產等經濟生活之明證。我們東方人大概都知道印度的社會階級之分，是由宗教信仰的結果，從波羅門教（Brahmanism）——印度最尊之教，教起有許多信仰，幾乎便有許多階級，波羅門信徒（Brahmins）是不服勞役賤業，而其他信徒也不替耕田，波羅門教徒焚香頂禮之事，因此種種信仰之不同，便將印度社會分成種種的帶宗教性的職業團體，名曰「加斯特」（Caste）法國許多印度學家如 *Lucien Dancie* 和 *Marcel Mauss* 等對於這個加斯特的團體考察得很清楚，每一加斯特操一職業，乃是由於信仰結果，子子孫孫，世世照一樣的製造方法做去，雖窮困至死而不改其業的，其所以不敢或不願改業，是因為信仰的觀念，他這一加斯特每視其業為高貴而鄙視其他加斯特之職業，所以法國社會學家補格勒（見前）為加斯特下的定義是分別階級的，世世傳業的和仇視外團的宗教的社會，由信仰的結果，世仍其法，世守其業，其影響於經濟的生產的方式甚大，機械不改良，工業不進步，差不多是印度的普通情形，英人以

其機器進據印度已及百年，而機器之力乃能不勸印度人改良之念，即各加斯特的信仰有以阻礙之，至於其生產之所趨重，也隨乎各加斯特內的信仰。在波羅門信徒家，或碗或罐稍有不潔，則碎而棄之。據 *Abelard Dubois* 之考察，每一波羅門教士廚中至少有碗及罐千數百個。因此印度有波羅門信徒處，造碗罐業必大發達。這是信仰影響於生產的方式和生產的趨向。至於影響於消費方面，則各加斯特有所禁用禁食，亦有所特別許用之物，尤其在婚喪等禮節之會。尚有影響於交換方面，則因信仰已潔而人濁，互相賤視的結果，甚至波羅門信徒手不執他教人之物；自己物件而不幸經他教人接觸者亦必棄之，然後心安。因此普遍的交換如近今的商業，在印度乃不能成立，而印度莊村至今猶有守「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狀態。（詳述見 *Seaward* 的 *Los castes dan Uptide* 1896 解釋見 *Bougle* 的 *Essais sur les régimes des castes* 1908）

凡此生產消費與交換皆係經濟生活，而在印度乃處處為宗教信仰所支配；馬氏之唯物史觀至此乃適得其反。可見其所謂公律至難成立，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大有問題。既然其說之本身尚有問題，尚難成立，又焉能據之以否認愛國精神，國家理由。馬氏之徒，其細思之！

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

曾愚公

今日中國之國事，曷爲擾攘十餘年而不克底於定乎？論者探究其原，亦嘗各有所見，或曰法制之未立也，或曰教育之未興也，或曰實業之未振也，或曰軍隊之未裁也，茲數說者，皆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實則未得其根本原因之所在。所謂根本原因爲何，一言以蔽之曰：無「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而已。夫一國之有「中心思想」，則國是所由而定者也。一國之有「中心人物」，則國民所望而趨者也。試觀日本，其在維新以前之中心思想，則爲「尊王攘夷」，而其中心人物，則有吉田松陰、西鄉隆盛、木戶孝永、大久保利通諸賢。當其時，日人外感列強之侵凌，內憂幕府之腐敗，全國人民心理，咸以「尊王攘夷」爲正義，不怕斷頭流血以爭之。而其中心人物，亦能奮不顧身以急國家之難。卒之「王政復古」之運動既成，勤王倒幕之兵以起，而德川氏三百年之天下，乃不得不拱手奉還於皇室矣。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效力，見於日本者一也。其在維新以後之中心思想，則爲「富國強兵」，而其中心人物，則有伊藤博文、福澤諭吉、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犬養毅、山縣有朋、桂太郎諸人。銳意振軍經武，變法維新，上下一心，奉爲國是，信若宗教。其進行之猛也，有若軍隊之啣枚急走然。卒之不數十年，一戰勝我而南割台灣，再戰勝俄而北夷高麗，區區三島小邦，遂由是一躍爲強國矣。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效力，見於日本者二也。今日本國既富矣，兵亦強矣，其國民第三期之中心思想，乃在於「大陸發展」。所謂「滿蒙合併」也，「滿鮮統一」也，「支那擁抱」也，「日美戰爭」也，無非爲達此中心思想之手段。而其中心人物，則有手定二十

一條之前外交總長現內閣總理加藤高明與大軍閥嫡派之田中義一諸人。至其目的之能否得達。則要視我之有無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與相抵抗以爲斷矣。又觀法國其在歐戰前之中心思想。則爲『對德復仇』。『收回失地』。而其中心人物。則有克烈滿梭 *Clemenceau* 普嘉寶 *Poincaré* 諸人。其視國仇。有逾私憤。苦心孤詣。志在對德慘淡經營。垂數十年。卒因歐戰勝利。收回亞勞二州。國仇既復。國勢愈強。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效力之見於法國近事可師者也。更觀德國其在普法戰爭以前之中心思想。則爲『聯邦統一』。而其中心人物除維廉一世以外。文則有鐵血宰相之俾士麥。武則有常勝將軍之毛奇。朝野齊心。發憤圖強。一戰勝奧。再戰勝法。而大一統之業以成。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效力之見於德國遠事可考者也。戰後法人之中心思想。在於『稱霸歐陸』。德人之中心思想。在於『重興德國』。而其中心人物。則有迭秉政權之各黨領袖。其在法國戰勝之元勳。若福煦霞飛諸將。固爲國民信仰之所寄。而在德國則戰敗之英雄。若興登堡盧登道夫諸將。亦爲全國物望之所歸。蓋其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不易變動。有如是也。他如意大利之建國。英吉利之立憲。美利堅之獨立。俄羅斯之革命。蓋無一國不各有其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以爲建國之根本。此固歷史之昭然可鑑者也。返觀吾國則何如其在民國以前。亦嘗有所謂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矣。咸同之際。天下多故。內有一太平天國之亂。外有英法聯軍之役。當時國人之中。中心思想。惟在於『堅甲利兵』。『略近於日本之『富強國兵主義』。而其中心人物。則有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諸人。皆所謂『有血性而無官氣』。少大言而多條理者。』是以海軍則有福建造船廠之設立。輪船則有招商局之創辦。其他鐵道。郵政。電報。電話。以及興辦。綱舉目張。而振之詞。亦

其遺緒，大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躬行而實踐之。湖北漢陽兵工廠，漢冶萍煤鐵廠，造幣局，紡紗局，次第成立，使國人至今猶受其賜，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效力見於前清者一也。其後甲午之役，海軍燬於日本，國人推究東鄰之強，非盡由於武力，法度修明，實其主因。於是中心思想，乃由『堅甲利兵』進於『變法維新』。其時之中心人物，則有康有爲、梁啟超、譚嗣同之流，隱然繫天下之重望。雖遭戊戌之變，康、梁逃而譚同死，反動潮流之所激，釀成拳匪巨變，清廷身受其禍，乃亦不得不改弦更張而趨於立憲，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效力見於前清者二也。其後滿清帝后同時崩殂，攝政繼位，親貴當權，滿漢之成見愈深，內外之事變紛起，國人咸知清廷立憲之無望，於是中心思想，乃由『變法維新』而進於『革命排滿』。其時之中心人物，則有章太炎、孫中山、黃克強、宋教仁，一方面爲言論之鼓吹，一方面爲實際之運動，革命之師，屢興屢起，暗殺之事，再接再厲。黃花崗一役，犧牲先烈尤衆，於是感動全國，辛亥之役，清社屋而民國成，此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效力見於前清者三也。顧自入民國以後，國人乃不復有明瞭之中心思想與確信之中心人物，以言政治思想，則『中央集權』之說，在民國元二年之際，似亦可爲中心思想矣。乃自袁氏利用中央威權以劫制天下，圖謀帝制，而集權說遂不復爲人所信矣。『地方分權』之說，自民國五年以後，國人之倡者漸衆，似亦可爲中心思想矣。乃自各省武人利用之以爲稱霸一方，壓制萬民之具，而分權說亦大有人懷疑矣。以言政治人物，則民國初元之際，袁世凱繫天下之重望，以爲惟一之中心人物。乃自帝制議興，私謀發覺，袁與衆叛離，而袁氏亦身死名裂，爲天下笑矣。袁死而段祺瑞繼掌實權，其人廉潔奉公，以亦可爲中心人物。乃以任用貪、污，製造私黨，海內譁然，怨憤所積，直系乘之，皖直之

役一興而段乃不得不遁處津門矣。段敗而吳佩孚繼掌實權，皖直奉直兩役，皆假藉民意，一時國人頗受其欺。而攻川伐粵，卒動天下之兵，人心亦轉移矣。北方之所謂人物者既如此，返視南方之人物則何如？黎元洪者，固所謂武昌起義之元勳也，民國元年嘗與孫黃並爲世重。顧自癸丑一役附和袁氏，聲譽漸墮，其後兩次棄職潛逃而信用全毀。至今國人視之，殆已無足輕重矣。孫中山者，固全國共仰之先覺也。當其南京讓位之時，國人就不擬爲吾國之雄盜頭。顧自近年屢遭失敗，舉措不無失當，內部頻起糾紛，而信用亦漸失矣。岑春煊者，固嘗有功於護國之役者也。其人雖屬官僚，而在清末夙著政聲，亦嘗繫一時之望。顧自廣州失敗以後，銷聲匿跡，毫無表現，殆亦不足爲中心人物矣。南北兩方之政治人物既如此，進而細察社會上知名之士，其足以爲全國重心，作國民之表率，轉移風俗而影響政治者，殆亦渺無其人焉。夫一國無中心之思想，則衆論紛紜而莫衷一是。一國無中心之人物，則民心惶惑而靡所適從。古今中外，固不如是。證諸今日，其例尤顯。國事之壞，豈徒然哉？今欲求國亂之底定，期國基之鞏固，惟有先努力於中心思想之製造。有中心思想，然後中心人物可得而出，而製造中心思想者，固不必卽爲中心人物也。予也無似，從事報界，既歷有年，以言報國，是其天職。中心思想之未獲構成，予亦分負其責。既灼見國內擾攘之根本原因，在於無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則姑就素懷所擬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條件，提供於讀者之前，以爲商榷之資料焉。

(甲)中心思想之條件 中心思想之構成，應以適合內外情勢，應乎國民需要爲條件。其在今日之中國，言論界所宜不斷鼓吹，期使成爲中心思想者，就予所見，略有二端：(一)主義——應絕對主張『國家主義』，使全國

人民皆了然於國家之組織，而以愛國爲惟一之天職，無復有『超國家』、『無政府』等妄想；（二）政策——應提倡『社會政策』，一本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義，以國家的權力，防止富貧之懸絕，消弭階級戰爭，而欲此中心思想之實現，對內則應本『四民平等主義』，聯絡全國各階級爲國民之大團結，以推倒專橫之軍閥；對外則應本『民族平等主義』，爭回已失之領土主權，完成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而其簡明之標語，則可定爲『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猶之清末志士之提倡『推倒滿清，建設共和』，然蓋期其易於了解流傳也。

（乙）中心人物之條件 中心人物之條件，至少應具備下列各項：（一）有一定之主義；（二）有一定之主張；（三）有其體之計畫；（四）有實行之手腕。此外如開大之胸襟，寬宏之度量，鮮明之態度，勤儉之習慣，亦爲中心人物不可缺之修養焉。

則者諸君試持右列之條件以觀今日國內之人物，其能合此者有幾人哉？則又何怪乎政治之不入軌道，社會之失其重心耶？嗚呼！國亂亟矣！國勢危矣！誦張定庵『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之句，安得不令人有『四顧無人之感』？昔作旅歐難友，舊有句云：『國病瘡無術，人亡政已非。借問求仙者，何年採藥歸？』蓋有感於國內人才之消乏，希望旅歐同學之自勉也。今若海外歸來，醫國無術，際茲國慶，愴懷國難，亦惟有以『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之說，貢於閱者諸君，而冀海內志士之當仁不讓焉。倘亦定菴所謂『藥方祇販古時丹』者乎？知我罪我，非所計矣。（民國十三年國慶日爲新聞報作）

推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

靈光

曾愚公先生在新聞報的國慶增刊中登了一篇「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的文，我讀了之後，覺得這一篇文章，在新聞報歷來所登那許多大文章中，真可謂之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文章。他的題目儘管沒有點綴着甚麼甲子的變十等等，而他的內容，却儘可使熱心的青年們於慶祝國慶之日過細的咀嚼回味。我讀過一遍，頗覺痛快，同時也不禁引起了許多意見。今日稍得閑空，因趕緊執筆把他寫了出來，以就正於愚公，並以請教於讀者。

對於中國應有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一層，目前已應該無人疑問的了。（我去歲在「創造週報」的一致青年的四封信」中，亦已論過。那個信一共作了五封，因為某種關係，只登了四封，我本來還有幾封的腹稿，亦因為某種關係，不願意再續下去，所以對於改造的方案，乃至於實行的手段等等，均未發表完全。至於中心人物的問題，差不多更未發揮盡致，所以現在不把他拿來與愚公的論說比較。）但是一說到中國需要怎樣的中心思想，與怎樣的中心人物，則不無多少異見。我對於曾先生以國家主義與社會政策作為中心思想的條件這一層，我在這裏敢聲明情願與曾先生一致。（一）因為我認曾先生的主張，可以達到我所理想的第一步，而且就中國目前的情事看來，除此以外，亦無更簡捷的方法與步驟的緣故；（二）因為我認定吾人目前有大同團結的必要，只要大致不錯，各人應該摒棄小異攜手前行，故即使國家主義與社會政策不是我的理想，只要也是一條到我理想之第一步的順路，而不是反對的途徑，我很願意把我的理想拋在一旁，與他合作。不過我在這裏得聲明一下，

就是我贊成國家主義，是出於全人類的愛，不是出於其愛國的盲情。關於此節我尚未與曾先生交換過意見，但我却深信曾先生之國家主義，其動機亦必如是。（詳細之處請參看創造週報中所登的那四封信。）

我所最有意見的，是中心人物的條件。關於這一層，現在不能不詳說一下，中心人物即社會的引導者（Leader）是。即小小團體，其行動亦必須相當的引導人，況且民衆是一團散沙，若沒有相當人物爲之中心，更是不行。不過中心人物，不應是一個兩個，應是一團，極少得有一打兩打纔行。不然者「人亡政息」這一兩個人一死，任你甚麼計劃，都得頓挫。昔日卡塔哥（Carthage）的罕尼波爾（Hannibal）羅馬的愷撒（Cesar）英國的克倫威爾（Cromwell）……便是這樣一個好例。故我們希望中心人物出現，同時却不能不先排除那妄自尊大，乃至於好用專制的人物。這是我論中心人物時最要緊的一個前提。

那麼現在得論中心人物的條件了。曾君主張四條：（一）有一定主義，（二）有一定主張，（三）有具體辦法，（四）有實行手腕，此外尙舉有闊大之胸襟，寬宏之度量，鮮明之態度，勤儉之習慣等項。這些條件自然都是不錯的，但是我於此外覺得還有幾個條件：（一）能不存私利之心，而富有同情心，（二）能躬自實行，（三）有勇敢氣概，（四）能與人同甘苦是。

一個人有救世濟民的心事，一定得大公無我，一定得富於同情，即他的努力，他的奮鬥，都得出於爲人類的愛。纔可，他若是只爲着一己的名利，那麼即其主義主張若何正大，即有何等實行力，其所事，既已全部爲的自己，那麼只要他一得到大權，他的假面一定顯露，即未得到大權，其心既已有私，其所行，亦必不能合理了。并且一個人

只要沒有私利之心，他便能恬淡，對於高位大權，便不會戀戀，便也不會妄自尊大，當日袁世凱所以會成爲民國之罪人，就因爲他有私；孫中山所以至今不能成事，亦因爲他在廣東要做甚麼非常總統的緣故，關於這一點，我不能不爲我革命的先輩請，同時亦不願爲我革命的先輩諱。

躬自實行與實行手腕相表裏，有了實行的手腕，必能躬自實行纔可。中國目前不少新文化大家，乃至主張甚麼甚麼主義大家，說來都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結果一般青年，更被他弄得一場糊塗。我在各種詩文，乃至於演說等中讀過不少「幹幹炸彈炸彈炸彈」等類的句子，聽過不少「推倒軍閥，暗殺，手鎗，炸彈」等類的話；但是試問作過這些詩文，乃至於說過這些話的人，有幾個是實行家？自己不去實行，只是空口說白話，那麼他的主義，他的主張再如何正大，他的方法再如何良好，又誰肯聽他的引導呢？所以我主張實行；我以爲中國目前問題，完全是行不行的問題，只要有實行家，其他的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只就提倡辦民團，以謀自衛說，現在若有人一面提倡一面使自己去作一團員，或有人贊成辦民團而自己去辦民團，那麼只要民團一風行全國，一切軍閥已不足除滅的了。

勇敢的氣概之有無，完全看他存心之公私以爲定，能够大公無我，自然能够勇敢不怯，但是這個氣概，也是必要的；因爲他是中心人物，非得指揮羣衆使人勇敢，他自己若先沒有勇敢的氣概，民衆自然不易受他指揮了。與人同甘苦，是由於同情，他能够同情，他必能知人之甘苦，他不忍看人之痛苦，他自必會與人同其甘苦，中國的偉人，均豐厚自奉，高自位置，而少能與人同甘苦，一半雖係爲「勞心勞力」之說所誤，一半亦由於同情心缺乏所致。

致。俄國革命後一時極困難而多數黨乃能堅持其勢力以不墜者，其原因雖然衆多，其領袖人物如列寧等人，能够與人同甘苦一節亦大與有力。這一條與曾君所主張的勤儉之習慣，實亦相表裏，與人同甘苦的人，自必先得有勤儉的習慣，總能如是，而所以發揮勤儉的習慣，則在於與人同甘苦，故我特表而出之。

愚公按靈光君此文，足以補予說之不足。吾人主張國家主義，純爲「自衛」起見，毫無侵略他人之意。蓋以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中國人民，日受列強之壓迫，勢將至於亡國滅種，當此之時，而言「自衛」，苟非喪心病狂之人，必不至於反對。既認「自衛」爲必要，則「自立」「自強」之策，又安能棄而不講？欲喚起國人自立自強之念，於提倡國家主義以團結全民族之精神外，殆無第二妙法。苟中國而能自立自強，列強無所施其侵略，則遠東戰禍可息，世界和平可保。故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不獨爲本國生存計，亦爲世界和平計，不獨爲弱者之保障，亦欲給強者以教訓。雖動端出於全人類之愛可也。特當此國際強權方盛，世界大同尚未之際，吾人殊不願高張「救世」之虛名，始以「救國」爲起點耳。

醒獅運動發端

陳啓天

我們的旗幟是『醒獅運動』。什麼叫做『醒獅運動』？我們中國綽號『睡獅』，我們中國四萬萬人就是四萬萬個睡獅。這四萬萬個睡獅當中，有的睡足醒了，大聲叫喊一齊醒來，却以聲嘶力竭，漸漸死去。而全國大多數的睡獅雖從夢中驚醒，聽着一聲『中華民國』，然仍在半醒半眠狀態中，不解『中華民國』是什麼！甚至又昏睡下去。完全不問中華民國了。於是中華民國的招牌雖然存在，而家內却有小竊大盜暗偷明搶，家外又有面似平和心實不測的強盜爭圖侵略，使得睡獅也睡不安甯了。睡獅要求安睡，須得個個睡獅一齊醒來，合力掃清一切家內家外的小竊大盜。這件事情，我們就叫他『醒獅運動』。換句話說，醒獅運動，就是中國國家主義的運動。

原來國家主義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從外國販進來的。從來諸家的忠孝思想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國家主義的結晶。後來忠孝思想被私人利用誤解，雖不免起了動搖，然國家主義却仍是股胎換骨，依舊存在。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固是國家主義的表現，而革命黨的排滿興漢也是國家主義的表現。推而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表現。表現國家主義的方法雖有當有不當，而一點國家主義的精神却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不可不急於扶植起來。這話怎講？且待我分別說來：

第一，我們深信現在的世界雖異說橫流，而主要的思潮仍為國家主義。英法日三國固是國家主義彌滿全國。即美國的國際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也都是國家主義在背後作主。我們若是誤聽人言，亂唱高調，就是自己

撤消自己立國的基礎而乞憐於人，怎能與人抗衡？

第二，我們深信一個國家要撥亂反治，須得先有一種思想，為全國人所信從，然後可以通力合作。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國家。我們要使這個國家成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只有以國家主義相號召，才適合當前的事實而易得各種人民的信從。若是以超國家的任何主義相標榜，我總覺得高遠不切事情，立意雖在救國，而結果恐益增亂國的種子。中國人民將越發不得安居樂業，恐非聰明才智的國民所忍出罷！

第三，我們深信振作國民的精神，激勵國民的感憤，團結國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國民的恥辱，在當今只有國家主義才能做到。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無論何種職業的國民均可一致趨赴協力圖強，否則階級劃分，爭鬭益烈，國內混亂的局面無由廓清，而國際干涉的慘禍終難倖免。

我們本着以上的三種信念，斷定國家主義是目前中國撥亂救亡的惟一良藥。其他任何高尚的主義，皆應認為不切時宜，不合實用，暫置不論，或待他日緩圖。

至若國家主義如何實現，首在建立各種信條為國民言行的標準，茲略舉其概要如下：

第一，關於體育應以魁梧雄健為標準，而立國民一切活動的基礎。力戒沒精打采，死氣沉沉的亡國氣象。提倡國民體育以鍛鍊國民的好身手。

第二，關於道德應以忠實貞潔為標準，而厚國民一切活動的意味。力戒狡詐圓滑，權利是視，而毀社會組織的綱紐。

第三，關於教育應以愛國衛國爲標準而定爲教育的宗旨，力戒徒重知識技能的修養，而忘却人格氣節的修養，只成功所謂職業教育。

第四，關於政治應以對外能獨立，對內能統一爲標準，對外要獨立則須抗強權，對內要統一則須除國賊，而其根本則在全國國民覺悟預備實力，一致進行。

第五，關於經濟應以增加生產，調劑分配爲標準，國民自動開發實業固屬緊要，而通籌全國的經濟政策也屬緊要，無論發展內國實業或增進國際貿易，均須依據相當的經濟政策，全國切實推行才易收效，而其入手方法在早日裁撤釐金，改正關稅，使內國實業得有保障，平穩發展，不致爲外商所壓倒。

總說一句，我們應認定國家主義爲中國目前起死回生的惟一法門，無論何種事業應以國家主義的精神一以貫之。

「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

曾琦

吾人熟察國內外之情勢，知今日而言救國，非有極鮮明之主義，與極簡單之口號，不足以號召全民，共同革命。關於主義之信仰，吾人絕對主張「國家主義」，其理由已有李璜君之「釋國家主義」一文為學理的說明矣。關於口號之揭發，吾人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二語，聞者或有所惑，茲請得而釋之。

（甲）國賊之定義：國賊者何？即其行為有背於國民之公意，有害於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吾人可發現若干之國賊，為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而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為腐心切齒而志在必除者也。

（乙）國賊之種類：國賊之種類，本難悉數，姑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者如下：

- 國賊之種類
- （子）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
 - （丑）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
 - （寅）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
 - （卯）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
 - （辰）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
 - （巳）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

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

(午)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

(未)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愿；

(申)倚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

(酉)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

由是觀之，所謂國賊，絕不限於軍閥，而軍閥則包含於國賊之中，吾人所以不徒以「倒軍閥」為號召，而特定為「內除國賊」者，蓋欲圖革命之徹底，一方面使國民知為害於國家者，不僅一二軍閥，尙有其他種種國賊，悉應在鏟除之列；一方面亦豫為後來之計，將於「澄清政治」之後，更進而「澄清社會」，使政治上，社會上，所有危及國家生存之一切害蟲病菌，皆絕跡於禹域，夫然後國家之安甯可保，國民之幸福可圖，不致若從前革命之不徹底，養癰遺患，為害至今耳。抑一國賊二字，以語平民，最易了解，譬如吾人言某賣國舉實例以相比擬，遠則有秦檜張邦昌諸賊，近則有溥宗與章宗祥曹汝霖之流，皆足以為國賊之註腳。吾昔在北京，曾向鄉鄰農民演說「五四運動」之意義，鄉人茫然不知所謂，吾乃告以學生乃今日之岳飛，章氏實宋朝之秦檜，彼為國賊，故應誅除，鄉人於是恍然爭欲殺秦檜而助岳飛，吾以是知「除國賊」三字，較之「倒軍閥」尤易於宣傳也。

(丙)強權之定義：強權者何？即以種種壓力強加於個人或國家者是也。其方法有為「直接的」或「間接的」，吾人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有自稱為列強之英法日美意諸國，最足以為強權之註腳，蓋其侵凌弱國，有如虎豹之對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能忍也！

(丁)強權之種類，強權之種類，大別爲下列四種。

(甲)武力侵略政策；

(如直接以兵力佔領土地是)。

(乙)文化侵略政策；

(如提倡英國化的教育是)。

(丙)經濟侵略政策；

(如掌握經濟命脈之關稅鹽稅是)。

(丁)宗教侵略政策；

(如派遣教士來華傳教是)。

強權之種類

列強對華有採甲乙丙三項政策者，如日本是也。有採乙丙丁三項政策者，如美國是也。有先採甲項政策，後採丙項政策者，如英國是也。有先採丁項政策，後採甲項政策，最後採乙項政策者，如法國是也。有關於能力，始終祇採丁項政策者，如意大利是也。然無論「武力侵略」也，「文化侵略」也，「經濟侵略」也，「宗教侵略」也，其爲對我施行有形無形之壓力則一，要皆吾人所宜反對之強權國家也。或者以爲彼列強所以對華施其侵略者，無非爲「資本主義」之故；吾人反對之口號，何不易爲「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此說似是而實非也。何則？他國之以壓力加於我者，非必卽爲資本主義國家也。例如中東戰役時之日本，彼固未嘗形成資本帝國也，其對

我施行侵略，亦志在得領土而已，證以資本帝國，未免名不符實。且以吾人所見，今世界亦但有一「英吉利資本帝國」，「美利堅資本帝國」，「法蘭西資本帝國」，「日本資本帝國」而已，無所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何則？彼等之利害衝突，固無日不在暗鬭之中也。所謂「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乃自實行共產主義之蘇俄發出，彼以共產黨之眼光觀察世界列強，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視為一邱之貉，故特標此口號以期他國之左傾而共圖「世界革命」。此在信產仰共產主義者，固應作如是語，而吾人信仰國家主義者，則萬萬不能與之苟同。其理由：第一爲吾人認定列強之對峙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當分別對付，如土耳其之所爲，斷不能同時反對蘇維埃之號令。第二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爲「保護本國」，初無「干涉他國」之意。「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志，顯然爲一種「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尙受羈絆之際，恐無餘力及此。第三吾人若僅以打倒資本帝國爲號召，世界上有非資本帝國而以武力臨我者，或據我之領土或強我奉號令，彼時吾人將何辭以對故不如改爲「外抗強權」表明吾人但求「保護本國」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壓力相加之強權國家，不問其爲何種制度，吾人皆當依「民族自衛」之原則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則國家主義者之天職也。

由是言之，「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一語，既有深厚之根據，復合時勢之要求，予是以在法實以此提議定爲「旅法各國總聯合會」之宗旨，歸國後復揭櫫以聒於國人，其有主義相反者，固不敢強使從同，而在信仰一致者，當亦無取立異矣。

中國的國家抵抗及其步驟

靈光

我在這個題目下面，依照順序不能不討論的，有三個小題目：（一）所謂西洋文明的本質，（二）中國的國家抵抗與無抵抗之比較，（三）中國的國家抵抗進行之步驟。以下請依次論之。

（一）所謂西洋文明的本質

若是文明的定義，爲人類愛的表現，人類因爲要發揮他的仁愛心，而用科學的方法，去發明互助之工具，以謀人類同胞的幸福，其表現即文明是那麼，我敢斷言，今日的世界，去文明之期尚遠！若是文明的定義，爲人類發揮其鬥性的表現，人類因爲要發揮其獸性，而用科學的方法，去發明種種戕害同胞的工具，以達其弱肉強食的目的，其表現即是文明，那麼，我又敢斷言，今日西洋的文明，恰足爲此。但是那一種的文明，是人類進化的結果，是人類共同的幸福，是真正的文明？恐怕稍爲具有仁心的人們，都能自行辨出來罷！科學的方法，爲促進文明之一種良好工具，其本身并非文明。猶之一把利刀，視大人與小孩之操縱而異其用，在大人善用此利刀，可以宰割一切物品，若在小孩則轉足以自割其身。固是一個科學的方法，可以善用，亦可以惡用，故只是會用科學的方法，其人之爲文明與否，尙不能斷言。

今日的中國，動輒崇拜西洋的文明，一似文明這個把戲，只有他們西洋人纔有，亦總會要，我們中國人絕不會有，亦絕不會要。同時把西洋人看作文明人，而自慚形穢，我實在大惑不得其解。今日的中國，所差者只是一個

科學的方法罷了！但是沒有刀子的便不是大人麼？我們現在若以科學的方法，爲文明的要具，我們又難道不會把他拿來善用起來麼？所謂西洋人的文明，其本質到底是些甚麼？這一個西洋鏡若把他弄穿，我恐怕會不值一文罷？

今日的西洋人，常笑我們中國人同種相殘，謂此舉爲野蠻。這的確不錯，今日的中國人誠不配說文明兩字。但我同時反問，今日的西洋人，又幾曾沒有作過同種相殘之事？歐戰的慘禍，尙歷歷在吾人眼中，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等等的民族，考其本源，是不是同種？他們同種相殘的方法，是不是比我們更慘？他們有科學的方法，乃不利用此，以發明同種互助的工具，而惡用之以發明無數殘害同種的武器。西洋人文明的地方，是在那裏？他們較諸我們中國人又高着那一層？充其量西洋人與中國人對於這一點，不外一個半斤，一個八兩罷了。西洋人有甚麼地方，足使吾人心服？如其會發明戕害同種的武器，便是文明，那麼我情願我們中國人不會發明這種戕害同種的武器，而被他們笑作野蠻了。

西洋人又常笑中國人沒有教育，常謂中國的教育不發達爲野蠻國當然之結果。不錯，中國的學校，誠沒有他們多，其內容亦沒有他們的完備，他們的教育方針是甚麼？「德育」「體育」「智育」三育並行，他們又有甚麼愛美的教育，甚麼「道爾頓」教育，凡此都是今日中國人所欲學而學不像的。不但此，他們於學校之外，在德育上還有甚麼星期的說教。但是他們學校教育的結果，所造就的人材，又多是甚麼人材？如其只是會讀書識字，便算是文那明麼？我又情願我們中國人，不會讀書識字，沒有這個文明的好了。

西洋的制度又是怎樣？甚麼民主共和甚麼代議國會？說得錦上添花，使人目迷五色。其結果，不論那一個文明國，其國中都產出極貧極富的兩個階級，少數的富人食則有餘肉，衣有餘服，住有餘屋，大多數的窮人，則無一不凍餒飢餓，而戰慄於資本主義淫威之下，其結果更釀成階級戰爭，岌岌不可終日的形勢，更進一步說，即是甚麼階級戰爭，無產者專政之事，亦不外同種相殘的一個演繹，一個階級的人們，壓迫他階級的人們的一個方法罷了。在他們那種制度下的人民，蓋亦絕無何等幸福之可言，而「平等自由博愛」三語，則是他們所常常標榜的美語也。像這樣，真能說是文明人的行徑麼？如其像他們那種制度，可謂之文明，那麼，我又情願我們中國沒有他們那種的文明了。

在理論上，我更可以舉出無數證據，以證明西洋文明的本質。在倫理學方面，高德文（Godwin）奧文（Owen）一派的道德的社會主義，曾爲馬爾薩斯（Malthus）慘無人道的『人口論』所壓倒；在生物學方面，克洛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論』，至今仍不能發揮光大，而達爾文（Darwin）一派之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說，則尚在支配着西洋一般的人心。至於近世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勢力亦如旭日東升，風靡全球，一切個人資本主義的學說，均不能不屈伏於馬克思（Marx）學說之下，而馬克思所提出的是甚麼？仍是慘無人道的『階級戰爭說』。在他們西洋人，凡所以得人心的學說，都不外戕害同胞的學說，那一種戕害的方法，來得更凶，那一種學說便較他種學說易得人的信仰，卽論宗教，像基督教那樣，亦論戰爭的宗教，纔能够支配他們的人心，以至於今日。簡單說，就是因爲他們西洋人富於獸性而乏於仁心的緣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外君子

而內小人是他們一般西洋人的居心，會發明科學的方法，而不知善用，是他們一般西洋人的本領。我對於西洋人的文明，無以名之，名之曰「殺人的文明」，這就是西洋文明的本質啊！

真正的文明，絕不應如是，必須內君子而實君子，能利用科學的方法，以發明同種互助的工具，以實行人類的互助。纔可。但是一說至此，固不必限定於西洋人，即我們中國人，亦無有不合的道理了。我們中國人，只須能够選擇利用別人的長處，來改良我們的短處便行了。更具體的說，我們只要把科學的方法善用起來便行了！我們又沒有雙又沒有瞳，又沒有瞎，又沒有癡，我們正不必妄自菲薄，同時我們既然發見了他們西洋文明的本質之所在，我們中國人今後對於世界文明上所應盡的貢獻，亦可以自行明白了。同時像西洋那種文明，若是讓他發達起來，其結果，會不會把全世界的人類都吃盡了去？全世界的人類，是不是都得屈伏於西洋人之膝下，而為他們的奴隸？像他們那種文明，若是傳遍世界，全世界的人們，若是都去倣效他們那種文明，世界的人類，還有何等幸福，可以實現呢！

(二) 中國的國家抵抗與無抵抗之比較

我在上述大前提之下，來引伸本題的意義，甚麼是國家的抵抗？即以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對外防守的目的物，以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其目的在將此國家弄到文明的地位，而後更進一步，再將此文明為全世界人類謀其幸福。在此義下之所謂國家主義，蓋為防守的而非侵略的。那麼，甚麼又是國家的無抵抗呢？即無條件的破除國界，將此國家完全放在無武力的狀態之下，以為世界大同的倡率。在此義下之所謂世界主義，蓋以國家為世界政

府一個單位，如維素等人所主張，乃積極的以個人爲世界之構成分子者。這兩個態度，在實行上步驟雖各不同，而其實則均是異趣而同歸，其究極目的，蓋均不外乎世界的大同。

抵抗與無抵抗，是相反的兩種態度，而自效果言，彼此亦各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中國的歷史上，亦多有無抵抗成功的事例，譬如古代有苗弗順，則不以武力征服之，而只是自修其明德，更難那甚麼干羽於兩階，其結果有苗來格。周朝太王又是避甚麼獯鬻，遷徙到岐山之下，漢族的祖宗除了一個黃帝是文治武功并重的之外，其餘恐怕不是無抵抗，極多亦只是防守的抵抗，如秦始皇漢武帝那樣罷！可見抵抗與無抵抗對於中國國家，亦非一定不變的公式，亦只是適應環境的一方針罷了。

我們中國現在應取那一種？我以為中國若是一個極小之國，如比利時，瑞士那樣，防無可防，守無可守，那麼，自然是不能不取無抵抗的態度，而且中國若在這個狀態之下，列強不會以中國爲其侵略的目的，現在中國不是這樣狀態，故這一問題，是不成問題。其次，中國的文明若是較西洋的程度高，或是西洋文明較中國高，那麼，我亦主張中國取無抵抗態度，因爲真正的文明人是不會侵略人的，同時我們若已有程度比人更高的文明，我們亦不會爲人所侵略。故然而目前的世界，目前的中國，都沒有這個程度，他們西洋的帝國主義更正在那裏想把中國收入其版圖之中，以作白種人的殖民地，我們若取無抵抗的態度，其結果不獨中國人永無幸福可言，即世界的和平，因此亦必難保，如其不信，請靜聽吾言！

今日中國人中，有不少因爲過於希望和平，因爲過自卑薄，過把西洋人看高了，而希望列強對於中國的共

管以爲只要列強一行共管，甚麼軍閥都可因此消滅，甚麼秩序都可因此成立，而中國人亦遂可以因此而得平和之幸福了。現在我且不说這種人的卑鄙無氣力，只問他們像這種希望，可以達到目的麼？他們白種人，同種間已如上述的情形，因爲權利利害不同，已經爭個不已了，像他們那種野蠻的性質，他們一行共管中國，他們能够不因利害的衝突而不爭鬭個不已麼？若其如是，那麼不外把歐洲的戰場遷移一下，把中國作爲他們的新戰場，讓中國人去替他們白種人效死罷了！即退一步，而沒有此事，試問像他們那種野蠻人能够替中國人謀其幸福麼？不錯，他們對於中國的秩序，一定要努力維持，但是他們所以維持秩序的意思，亦不外爲着要發達他們的實業罷了！而像個人資本主義那種發達法，於我們中國人，又有甚麼好處？我敢斷言，共同管理的結果，只是操縱了一共有知識或有勢力有財產的洋奴！中國人大多數的人們，非呻吟於奴隸的勞動者，地位不可假使中國的人口極多，白種的人口極少，那麼極少數人爲極多數人犧牲是應該的！然而中國的人口不獨較歐洲的白人多，在世界的人口中也差不多佔四分一的數目，現在叫這許多人爲着那少數的白人去犧牲，其結果更於世界人的幸福絲毫無益，我恐怕不獨我們人，即稍有理性的中國人，亦都不會答應罷！那麼，現在再退一步，就假定共管後中國一時能够把秩序維持住，又試問這許多中國人作奴隸的結果，又能够甘心屈服不起而反抗麼？這一來，和平的希望，又在那裏？即世界的平和照得西洋人這樣幹去，其不能達到目的，亦是顯而易見之理，總之，西洋的個人資本主義，一旦不除，不獨西洋人自身不能够得到幸福，即世界全體亦必永受其害，而不知伊於胡底！故在這個意義下，我贊成中國國家之抵抗，而不贊成中國國家之無抵抗。

主張無抵抗的人們，是主張立時撤廢軍備的。他們的理由如下：（一）在各國政府尚在那裏競行擴張軍備，同時各國國民均已相當覺醒的今日，我們若能撤廢軍備，必得世界之同情，故我們若率先實行，更同時將中國宣告成世界永久中立國，則中國不獨可免一切戰爭之禍，更可因撤廢軍備而得財政上之充裕，更可以此實力開發富源，促進中國的文明。這一種理由，實有一面真理，蓋今日各國軍費均占全國歲出預算之過半，即極少亦占其半，故我們若能廢兵，我們國家的支出，自可減少一半，以此用於生產事業，必更足以促進中國文明。但是，我們要達這個大理想，我們必先有一個大前提，即中國能因此而不受列強的侵略與否？是中國儘管自行宣告為永久中立國，而在這種不講理的時代，自己既已沒有武力，列強能够讓你如是麼？歐戰時的比利時便是一個好例，故我們即有這個大理想，我們亦須先有獨立自主的實力，故為達這個大理想起見，我贊成中國採用最少限的國防主義。其次，他們所主張的理由：（二）是當大家執戈相向的時候，大家儘管口說平和，若大家都不肯將武器放下，則此平和仍必無望，即無抵抗主義亦然。苟大家都贊成無抵抗，而大家都從事於抵抗，其結果無抵抗之事，仍必永無實現之日。故我們須率先無抵抗以為世界倡率。這個理由，亦有一面真理，但是無抵抗之抵抗，必視對手之程度對手的程度若是很高，那麼我們無抵抗的態度，一定可以感動他，反過來，若是對手的程度過低，他對於我們的無抵抗，不但不會感覺，還會因此而增長其惡呢！現在的西洋人，有了程度沒有我恐怕我們一出於無抵抗的態度，他們纔是正中下懷呢！若是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沒有貢獻的能力，而且是個很壞的人種，他富強之後，若是會擾亂世界的平和，為人類的大害，那麼，我不但主張中國的無抵抗，還情願把這個種滅去！但是中國

人。是。不。是。平。和。的。國。民。呢？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到底有貢獻的能力沒有呢？關於這一層，恐怕不須我多說，也不須提出許多證據，四千年來對外的歷史，業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再一翻開大學的第一頁，我們的精神，更已明明白白地寫在那裏；我們現在實行國家的抵抗，不外是實行着治國平天下的第一步啊！

(三)國家的抵抗進行之步驟

國家的抵抗的步驟如何？這是實行上的問題，而我對此則主張先作一個政界大掃除的政治革命，即把一切在政治上作過罪惡之人，——即一切軍閥及其爪牙之官僚政客，更通俗說，即一切貪官污吏，土霸惡豪，略依其罪惡之大小，同他算一個總賬，而懲治之。先使農工商各階級無辜之人能各安其業，使社會中良善之人，能各有出頭露地，同時改良軍制鞏固國防，再施行國家的社會主義之社會政策，以增進人民之幸福，在革命期中，我們對於外國一切之既成條約，均照舊遵守，俟實力充足之後，再來收回一切主權，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條約，要之，這裏所主張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對內，而不是即時主張甚麼反帝國主義。

現在有許多主張反帝國主義，謂一切軍閥均是帝國主義的爪牙，我們不先行推倒帝國主義的本身，而先去其爪牙，是無益而且做不到的。不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是極厲害的，我在這裏主張中國的抵抗，亦是爲此。但是我問一句，我們現在即行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得不得與外國宣戰？我們於實力未充足之前，我們即行如是，我們有得勝的希望沒有？并且我們現在連帝國主義的爪牙的軍閥都沒有力量剪除，我們還配反對其主人的帝國主義麼？故我以為反帝國主義的第一步辦法是在於先剪帝國主義之爪牙，而且是內政不濟，未

有能够對外的。我們若不先行肅清內政，我們的反帝國主義，不終於宣傳不止。故我以為反帝國主義在目前，只是宣傳時代，而我們實着手之處，仍先在於內政。現在一定有人說：我們若不將敵人本身推倒，若只思去其爪牙，這個爪牙，恐將去不勝去。我對此要問一句：他們帝國主義，可所愛於軍閥，而必爲之保護，是不是因爲他們能履行他們與帝國主義所定的不平等的條約？那麼，我們現在若只是對內而不對外，對於不平等的條約，我們若亦暫行承認，一方面肅清內政，更爲全國民衆所擁護，我們又何爲必須與軍閥結其死結？他們目前必暫退一步，而觀我們革命的成績了。若是帝國主義，一定要出死力幫助其爪牙，則滿清政府，當日亦曾作過帝國主義的爪牙了。辛亥的革命，爲甚麼未聞有外國的干涉？總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雖然儘管是一致，而他們帝國主義的團體，本身仍各有其利害，故我們的革命，只要不與他們所一致的利害衝突，他們因爲彼此的態度，不能一致，對於我們的革命，絕對不會伸手干涉。這實是我們肅清內政的好機會，亦實是他們帝國主義本身的弱點啊！

對於全民革命，亦必有人反對，尤其是共產黨人如是。他們深信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而主張無產者專政，反對全民革命，謂一切革命，只有階級革命，沒有甚麼全民革命。像這種說法，對於西洋的國家，可以如是。我們中國，除非把西洋一切制度都採用施行之後，纔會如此。目前我敢斷言絕對沒有此事。不錯，中國的社會，目前亦是有種種階級，但是階級鬥爭，必甲階級與乙階級的利害絕對衝突，纔會發生。中國目前試問有了這種階級沒有？如其有之，只是貪官污吏土霸惡豪與非此之兩階級罷了。但是他們貪官污吏土霸惡豪這個階級，配不配與非此的階級對立？即梁任公所謂有槍階級與無槍階級，亦不能成立。那些土霸惡豪是屬於有槍階級的，而他們與他們的

長官利害能够一致麼？其他農人階級與工人階級在中國今日亦不如外國那樣，亦是顯明之事，故我敢斷言，我們革命的目的物，只是少數的貪官污吏與少數的惡霸土豪，其非此之人，不論是那一階級，都是立在同一戰線之上的。這實在是我們中國固有的情形，而不是外國那一本主義的書上所說得有的啊！情形既然如是，那麼甚麼西洋式的革命，對於中國都不能實現一層，亦可以明白了。

故我對於中國的抵抗的步驟，其第一步認定在於肅清內政，在於全民革命的政治革命。

教育建國論發微

余家菊

或認定教育爲立國之本，或認定教育之職志在使國家昌盛；此兩說吾人皆名之爲教育建國論。其淵源甚早，而其主旨對內則在使國民有公共的志趣，而無黨派的齟齬；對外則在抵抗強權，延存國脈。亞里斯多德曰：

立法者應充分注意少年輩之教育，原爲絕無疑義之事。國家而忽視此點者，則必危及其組織。一定之組織，必須有適於其組織之教育以維護之。誠以組織之維持一如組織之創設，皆恃有適於此組織之精神在，然後可能。平民政治之創立與維持，須恃有平民精神；貴族政治之創立與維持，亦須恃有貴族精神。精神愈好，則其所產生之組織亦愈好。

亞氏此言可謂爲近代國家教育理想之先河。一國立國，各有理想，此理想之現於政治，則爲政制法律之精神。此精神存，則政制法律皆得無恙；此精神亡，則政制法律亦必隨而破產。故謀國者必須培植一公共精神以爲政制之基礎，而教育則其所用之工具也。

十八世紀末年，在法國有拿沙洛台者（Nicolas）爲國會議員，銳意反對由教會執掌教育權及其所施行之世界主義的教育。其名著國家教育論文集有警句曰：

我敢代國民主張應依國策以建立教育，誠以一則教育本屬國家分內之事；再則教育其人民本爲國家之確實職權；三則國家於其子民之教育應責由國家之臣屬施予之。

又其友人杜克洛 Duros 亦有言曰：（見鄺伯赫教育史）

斯巴達所施之教育，其目的在養成斯巴達人，乃確切無疑之事。故國家教育之目的在激發其人民之國民精神。就吾儕法國人言之，則在訓練其人民使爲法國人，使爲法國之國民。

此又爲欲使國家振興教育之實益，而主張應由國家執行教育權者。蓋當時教會乘其中世紀之餘威，雖已喪失其政治的勢力，而教育權則仍在其掌握中。教師恆爲牧師，學校恆附屬於教堂。非宗教家而從事教育者，每受其擠斥。其所施之教育又皆爲反國家的，以世界主義之名，而行其培植宗派勢力之實。於全國國民共同精神之養成，爲害不小。有識者之主張由國家經營，亦由於勢所不得不然者。其在英國，亦有同類之主張。登Thomson Sheridan 著不列顛教育論有曰：（見亞當·生教育簡史）

國家有必遵之軌道：一則少年之教育應與政府之性質與目的相符合。二則全體民庶所依以生存之精神，須深植於人心中。順此者昌，逆此者亡。依此種原理而建設之教育，或可養成好人，不足以云培植好國民。

其言亦可謂深切而明者。一析言之，第一國家須有一定的理想；第二此理想須隨處表現，而無間於政治或教育；第三此理想須用教育以傳播之。世有普議之者，以爲如是則是教育隨政府以爲轉移，勢且成爲政府營私自便之工具。專制家更得藉以愚弄人民。此說也，雖不無若干事實爲之張目，但熟考其實，則捨此實無他途。第一，依近代觀念，教育爲公共事業，應用以傳佈公共的理想精神，不應用以鼓吹一黨一派之所見。第二，此理想之是否

公共的，當以是否取得政府之容允爲比較可恃的判斷標準。蓋自理論言之，政府之權力來自大多數之國民，依少數服從多數之義，應爲全體國民所遵守；自事實言之，意圖顛覆現行制度或保障私人利益之教育，不爲政府所不容，即爲國民所共棄，政治制裁終必隨之。第三，所謂政府理想與政府政策有別，政策可因執政政黨之更迭而有變遷，理想則可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如一日，教育之所應與政府同者，在此永久的立國精神，而不在一時的施政方針。以黨派政見宣傳於教室，此教育之所深忌，而爲教育界之所宜互戒者也。明乎此三者，則勿囿乎教育之爲政府所利用也。

世界各國，無不發揚其立國精神，如獨立自由之於英，民主主義之於美，平等博愛之於法是也。既有立國精神矣，其教育亦無不竭力求所以傳播之，其政府亦無不竭力求所以提倡之。回顧吾國，數千年之立國精神已由東西潮流之激盪而震撼，淺薄學說之摧殘而消亡。國人既失其中心信仰，八心自無所維繫，而精神上的感應遂無從發生，猜忌之風，傾軋之習，乃不期然而然矣。此國家所以紛擾之原因，亦教育的根本問題也。

在國家既受大創之後，思以教育之力求國民復甦者，則爲德國之非希的氏。氏嘗德國大敗於法之後，見國家窮困人民沮喪，乃大唱新教育論而極力宣傳教育救國之說，有云：

依新教育之力，吾將陶鑄德意志全體國民使爲一協和的團體而受刺激與鼓舞於一共同的興味。

氏意所重，蓋在使國民人人皆受教育，而此教育又須以養成共同的團體興味爲職志。嗣後各國相競以從事於強迫教育律令之制定，氏實與有力焉。以抵禦外侮，維存國命，爲振興教育之神機者，於近代爲一最普遍的現象。

象。遠則德國，近則日本，皆最著之例證也。

以培植愛國精神爲目的之教育，於偏頗的宗教教育，又澈底遏抑不遺餘力。法國教育素號獨立於宗教紛爭之外者，固無論矣。即以英國論，有識者每懼宗教門戶之爭，足以減少國民之愛國心與團結精神也。而倡爲超宗派教育之說，意謂學校教育僅以提示各宗派所同之博愛教義爲限，其他一切皆置之不論不議之列。於法律上，則定爲「良心節」(Conscience Clause)之條。其在德國，則可以巴色多(Bardow)之言表之。

……學校利益應爲人民所共享，不得因宗教門戶不同之故，而使任何兒童失其享受此項利益之機會。國家既向其各個子女要求，且亦有權要求，同等的忠心與熱情，則教育之應迴避一切政治的黨見也亦明矣。……於教授時，教師與教科書皆不得利用世俗學科之教授時間以宣傳居民所信各宗教中任何宗教教義之真實或虛偽，更不得詆毀任何宗教。

宗教最富於束縛之力，因宗教之故，雖使之赴湯蹈火而不辭，喪家亡國而不惜者，比比皆是。如十字軍役新舊教戰爭之於歐陸，義和拳事件之於吾國，皆其例也。宗教之勢力既如此偉大，謀國者欲使其國民和諧，勢不得不求其有相當的共同性，此所以各國有國教之設立也。然人性各有所適，信仰殊無一致。若強使之同，則宗教的流血將無已時。故近代各國皆不以宗教求國民之融和，僅求各宗教之互不相仇視，而將國民融和之基礎建立於超宗教的教育上，故教育之中立於宗教紛爭中，乃近世各國通行之政策也。況在我國，固有宗教與外來宗教性質懸殊，加以宗教問題與外交問題錯綜糾纏關係尤大，關心國運者不可不注意及之。

上言國家主義的教育在確定國家立國的理想，涵養國民融和的精神，而使之攜手偕行一致努力於共同目標之下。苟有妨及此目標者，則不惜以身殉之，雖訴之武力，不辭也。此本至當之義，有識者莫不主張之。顧吾國猶有反對之者，則因誤於西洋少數理想家之和平論，而認定大同主義神降實現，又因誤信淺薄的個人主義，而懷疑國家之真實存在。

信仰個人主義者，以爲惟個人爲真有，國家乃幻造之虛名也。若從此說，則個人亦將爲幻造之虛名，惟構成此個人之細胞爲實有，其不中理可以常識定之。蓋孤立的個人爲絕對無有之事，而羣體之行動，亦有以異於各個。人單獨行動之總和。吾人墮地即生於一人羣中，此人羣之衣食言語風俗習慣，乃其數千百年之祖若宗所創造而遺傳者，與其他之人羣顯有差別。又吾人生於此羣，長於此羣，與之同其休戚而共其榮辱，以較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又自有間。故認個人可爲孤立的生存者妄也。吾人之思想行動羣居時與幽獨時不同，在羣居時又隨其所居之羣而異。吾人有若干羣可生關係，即有若干人格可以發現。如見富者則諂，見貧者則嘔，又如頭腦冷靜，一入大衆廣衆之中，亦不免感情用事者，皆其例也。依此謂個體爲實有，羣體爲虛名者，可以悟矣。

持個人主義者，又常高唱世界主義，而認定教育活動爲人類之所以使人成爲人者，意謂吾人初生時，僅備具本能與嗜慾，人類之所以有異於禽獸者，全恃其自行創造的努力。欲使創造之速率增高，則教育其下代子女時，當勿求現狀之維持，而應以養成更好的人類爲目的。欲養成「人」，一則不可以教育委之於國家，因王侯將相皆欲使其臣民成爲更好的工具，而不欲其爲更好的人類也。故教育的目的在充分實現人性，以使人類成爲更好。

的人類，而不問其是否爲好國民。此說在歐洲十八世紀時頗多主張之者，康德即其一也。氏反對由國家經營教育，而其後起者菲希的黑克爾則竭力主張之。十九世紀以來，二氏之主張已成爲各國之公共政策，是康氏學說之不中於事理，已爲歷史所證明矣。

吾國之反對國家主義者，又有所謂國際主義派。彼輩認定國家之起源爲各部落爭殺之結果；國家之作用在保障資本家之利益。爲此說者大多勇於持說而怯於思想之流。就歷史言之，國家主義之發生，蓋先於大資本制度。其在西方，則國家主義實誕生於希臘。其在吾國至遲春秋時代即已大中於人心。近則如岳武穆之報國，文天祥之捐軀，亦何嘗有資本家鞭策於其後乎？若謂國家爲部落時代互相砍殺之產物，則尤爲譌說。國家之如何發生，歷史學者臆說紛紜，莫衷一是，要之皆視之爲人類演進上之一大進步而絕無視之爲人類之一不幸者，則固事實也。就從來國家之職務觀之，對外則爲抵抗外侮（保障國權），對內則爲扶持正義（保障人權），國家之爲人生之一重要工具也明矣。自視其生爲有價值之人類，烏可不愛護其自身所在之國家哉？

抑且國家之價值不決定於其所由生，而決定於其所以生，換言之，即決定於其立國之理想也。吾人當竭其能力，殫其才智，使吾國之生死存亡皆與一定的高尚理想相終始。因其生存也，固不失其頂天立地之本職，即令滅亡，亦大可告無罪於先民。吾安得見吾國立國理想有發揚光大滂薄大地之一日哉？

國家之立國理想必由教育以滋潤之，於是教育宗旨尚矣。吾當思之，教育宗旨須具有五種性質，方能生其作用。五種性質爲：（一）時間性，合於此時之需要者也；（二）空間性，合於此地之需要者也；（三）歷史性，合於此民族

之需要者也；此三者，合名之曰國家性；（四）滲透性，可以貫徹於各項教育活動者也；（五）確定性，可以明示教育者以努力方針者也。於此五者，有一不合，即不足以爲教育宗旨。考吾國教育宗旨之沿革，共起三次變更。第一次定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時在清季；第二次定爲「以道德教育爲主，以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爲輔，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時在民國初元；第三次定爲「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時在民八。此三者以上述之五項標準審核之，則吾不得不欽佩第一次立法者之具有教育政治家之氣魄與識力；第二次宗旨，則可謂策論式，因其祇可稱爲教育政策之縷述也。第三次宗旨，（彼輩自名爲教育本義）則可謂講義式，因其僅爲留美學生之應用其教科書上之心得而已。吾於是不得不歎息於吾國自有新教育以來，除清季一二大老外，未有真能灼見吾國教育之所必需的方針者！吾國教育應有之宗旨，愚意當爲：（一）精忠報國；（二）慈祥愛悌；（三）獨立進取。以上頗合於國家性，且又鮮明而易於把握，非贅施也。其詳細理由，則見於他處，不具述。（見教育與人生簡易齋教育雜記）

中國教育宗旨問題

陳啟天

吾人試執一當道之教育家而問之曰：『中國教育宗旨何在？』彼等將旁皇不能立答。然則中國教育果無宗旨乎？彼又將以爲不然，而應之曰：『有。』有則何在乎？於是彼不得不舉新學制系統改革令中所謂教育標準以對。按教育標準有七：（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於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

教育標準雖有七條，而其要義不出兩端：一曰平民教育，二、三、六、七等條屬之；二曰職業教育，四、五兩條屬之。自五四運動之後，此兩義在中國漸各形成一種教育思潮，至民國十一年始明定爲教育標準，蓋卽教育宗旨也。然則此種教育宗旨果適於中國之需要否乎？吾不能無疑，請得而暢論之。

夫國家之貴有教育者，以其能解救國家之危亂而開創國家之新生命耳。今日中國危亂之繼有二：一曰國內之政治社會，以及思想之狀況，無一不由混亂而入於恐怖；二曰外來之政治、經濟、宗教以及教育文化之勢力，無一不由侵略而至於壟斷。質言之，中國之現狀無處非內憂，亦無處非外患。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中國，如何之教育與夫如何之教育宗旨，乃能適於中國之需要乎？曰是有教義焉。

一曰教育宗旨須能喚起國民對於國家之自覺心，與夫國民對於國家之責任心。然後可以養成能除內憂抗外患之國民。

二曰教育宗旨。能激勵國民對於國家之感情，以成扶危勸亂之熱誠，然後能對國家盡維護之責。

三曰教育宗旨。須能涵蓋立國之各要素，而無所偏倚與遺漏，然後施措得宜，利多害少。

吾人試準上述三義以評所謂『平民教育』則何如？平民教育者以個性發展為神髓者也。為謀個性發展，則學校之規矩可廢，教育之宗旨可無。（新學制系統改革令之有教育標準而無教育宗旨者，即以教育宗旨之重一致而有害於個性發展耳。）而教育遂成混亂之局，不惟無以救國，亦且無以自救也。近年來學潮之層出不窮者，其因固甚多，然以個性發展認為平民教育之神髓，亦與有力焉。此固非盡平民教育本身之罪，而誤解者以平民教育僅在謀個性之發展，而不謀羣性與國性之發展，則流弊所至不得不如是耳。

抑平民教育原不能舍國家而獨立者也。而倡道者又盲從外人之言，而侈談所謂國際主義，於是平民教育益為國家之累矣。國際主義者以國家之獨立為前提者也。今中國在政治、經濟、教育諸事上已非獨立之國家，則國際主義之妄談，固不能倖獲外人之愛憐，且足以盡撤國之藩籬而無以自衛也。以故吾人可斷定國際主義的平民教育實誤國而有餘，吾滋不滿於當今教育家之所謂平民教育者以此。

至勸勵一時之『職業教育』又何如？黃正之先生者職業教育之主倡者也。彼之言曰：『職業教育之宗旨在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斯固可以一洗吾國教育不重職業之弊矣。然以是為中國教育之重要宗旨，則吾期期以為不可。職業教育原不過教育之一方面，今張大其詞以之涵蓋教育之全體，則不但使人誤解職業即教育，致有『飯碗教育』之譏，亦且使人昧於教育之根本，而以教育之能事僅在求得職業也。今之倡導職業教育

者固莫不曰中國之大患在國民之無業者多，而有業者又多不樂於從事，是則昔提倡職業教育不可，斯固似待之有故，言之成理矣。然其所謂職業教育，多以個人爲立論之出發，致其成效遂難實現。夫個人職業之有無，以國家實業之盛衰爲斷，國家實業之盛衰，以國家政治之隆污爲斷，今之言職業教育者只言職業而不言實業，不知實業不發展，安有職業之可言？今之言職業教育者，只言教育而不言政治，不知政治不澄清，安有教育之可言？今之言職業教育者只重個人而不重國家，不知國家不鞏固，個人焉能安居樂業？今之言職業教育者只重手段而不重正義，不知正義不伸，手段終有窮盡之時。凡此種種，吾甚爲之憂。職業教育者惜焉，而冀其能幡然改悟，以全國之福利爲懷，以光明之態度相與，則幸矣。

或者曰：子所謂實業教育與職業教育亦有異乎？曰：有。職業教育在英文爲 *Vocational Education*，而實業教育在英文爲 *Industrial Education*，此不同者一也。職業教育重在謀個人生活之解決，而實業教育重在謀國家產業之發展，此不同者二也。職業教育可支支節節而爲之，而實業教育則須因國家之教育政策與經濟政策而通籌之，此不同者三也。職業教育可避難就易以乞憐憫，而實業教育須有良政府乃能施而得宜，此不同者四也。有此四不同，故吾不贊成舍實業教育而徒言職業教育也。

或者曰：子既抨擊所謂「平民教育」與「職業教育」，不遺餘力矣，然則平民教育與職業教育固全屏於教育之外乎？曰：是又不然。平民教育與職業教育在教育事業中尚有相當之位置，特以是爲國家之教育宗旨則期期以爲不可耳。然則又當如之何而後可？曰：平民教育發展個性似也，特發展個性而摧殘國性，斯國民只有離心

力而無向心力。國民無由團結。故須提倡國性教育以矯正之。又職業教育揭鑒職業似也；特揭鑒職業而忽略實業，斯國民縱有職業之技能，亦無職業之機會，產業無由發展，故須提倡實業教育以補救之。而國性教育與實業教育之設施，須一本國家主義之教育政策與經濟政策，然後不至舍本逐末，遺大務小而確有助於中國之獨立與統一，是則予所理想之中國教育宗旨也已。

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

吳俊升

一、序引

國家主義的教育，在歐戰以前，我國教育界頗有討論，而且見諸實行。前清興辦學校抄襲日本陳文，已經不加思索的把尊君愛國定作教育宗旨了。民國成立修改教育目的，把尊君一項去了，愛國一項，比較的具體些改爲實行軍國民教育。及至歐戰告終，代表國家主義的德意志，一蹶不振。教育界震於國際主義，大同主義，和平主義之說，遂不免以成敗論人的眼光，詬病國家主義的教育，不遺餘力。於是我國教育目的一變再變，國家主義的教育，遂無立足之餘地。但是近一二年來國內目光深遠之士，內感國內戰禍頻仍，軍閥跳梁，國民無法制止，外受國際壓迫，共嘗之聲，驚心動魄，又觀察世界各國教育現狀，國家主義的色彩甚濃，於其北大首先提倡武化，訓練學生軍。最近國內外一部分教育學者更明白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一般人對於本問題之態度，已經不像從前的認爲不識時務，漸漸加以討論，中國應否實行國家主義的教育呢？這是當前急待解答的問題。在解答本題之先，應當把國家主義的教育的本身研究清楚：國家主義的教育，爲何而起的呢？本身的價值如何呢？有無改變的餘地呢？本篇目的，即在答覆這些問題，以爲研究和解答以上中國此時應否實行國家主義的教育一問題的準備。

二、國家主義的教育背景

無論何種主義，斷非僅是思想家冥想的結果，她是各種因子相並而生的產物。國家主義的教育，當然也不是

例外。細考此種教育的原來，在政治方面和哲學方面，都可找出牠的原因。

第一發生國家主義的教育的原因，在政治方面。原來國家主義的教育，是跟着國家主義發生的。在十八世紀內，歐洲各民族，已經漸漸有了國家的觀念，即是各個民族的團結的觀念。及至法蘭西革命以後，民族精神更爲發皇。拿破崙蹂躪歐洲以後，促成各種民族內部的團結。到了十九世紀的歐洲，便起了一種很強烈的運動，即是各種渙散的民族，依着自然的境況，團結成幾個較大的國家的運動。在一八一五年以後，德意志的統一，意大利的獨立，希臘和巴爾幹諸邦的脫離土耳其，瑞典和挪威的分離，都是此種民族運動的結果。歷史家用一個抽象的名詞，來代表這一類的事實和精神，這一個名詞，便是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國家主義的意義，並不僅限於聯絡民族而成國家而已，還要顧到國家的安全方面。原來一盤散沙的民族，由分而合，分子間的黏着力當然很薄弱的。民族的結合，是依着民族性 Nationality 的。要增加結合力，便要注意到民族性了。什麼是民族性呢？現在有許多學者討論到這個問題。種族是民族性的主要分子麼？不是。有許多國家，並不是一個種族的。而且照人類學的研究，現今的種族分類法是很膚淺的，並沒有什麼歐洲民族，堪爾脫民族，條頓民族的區分。實在考究起來，不共戴天的德法兩國，種族都是分三部的。西北方的德意志人，和北方的法蘭西人，種族方面並沒有什麼分別。所以種族不是重要的分子。

語言是民族性的主要分子麼？不是。在法國軍隊裏有 Bretons，有 Basques，有西班牙人，他們都不會說法國語的，但是他們的心，都是歸向法國的。在奧國軍隊中有十一國國語的兵士，但是他們的團結力，還是很大的。

還有顯明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有三種人民，有的說法語，有的說德語，有的說意大利語，雖然國境以外，他們的親族爭鬪不已，但是他們還是相安於無事。何以如此的呢？因為語言不是國民性主要的分子的原故。國家的版圖，是主要的分子麼？也不是。猶太人亡國多年，仍然沒有喪失他們的國民性。還有一種 *Gypsy* 民族，游行世界，沒有一定的疆土，但是他們的民族性還是卓然不磨。

究竟什麼是民族性呢？許多學者如比人 *Balkans* 英人 *Rose* 美人 *Partridge* 都承認是屬於心理方面的。民族相同的理想，興趣，和習慣，乃是民族性的重要分子。所謂相同的理想，興趣，和習慣等，換言之，即是同心 *likemindedness*，更切實言之，即是生活的態度相同。國家的團結力的強弱，便看此等生活態度相同點之多少，以及民族有無此種生活態度相同的意識而定。所謂生活態度相同的意識，換言之，即是民族的意識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十九世紀的各民族，既然團結而成國家，上文曾說要求培養國民性的方法，以保持國家的安全，所謂國民性，即是同心加意識。那麼要怎樣才能培養同心，提醒此種意識呢？這便要應用教育來達到這種目的了。要想達到此種目的的教育，便是國家主義的教育。

以上說國家主義的教育，是起於政治的要求，現請更舉二事，以實吾說。

國家主義的教育，以一八〇七和一八七〇兩年為兩大關鍵。在一八〇七年以後，德國教育，充滿了國家主義，一八七〇年以後的法國教育亦然。何以有這樣的結果呢？是起於政治的要求。

在一八〇七年以前，德國盛行國際主義，康德 菲太 Fichte 等，都主張國際主義，毫不帶國家主義的色彩。康德的著作中充滿著用人道觀念灌輸全世界造成永久的和平和兄弟精神的理想。歌德 Goethe 竟至贊揚拿破崙，把他當作增進人類生存的幸福一種宇宙力 Cosmic force。薛綠兒 Schiller 一七八九年與友人書中詆斥『最有力的國家，不過是一個斷片；而且能思想的心意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沒有熱情的，除非牠對於種族的進步是有影響的。』在一八〇六年德法兩軍在介那 Jena 交綏之時，黑智兒 Heine 在槍林彈雨之中，安然寫他的著作 Die romanische。菲太在一八〇四年到五年，在柏林演講『近代之特色』，承認全歐為一社會的單元，而且全不承認國家主義為健全的政治的動機。

但是在一八〇六年普魯士失敗，一八〇七城下之盟以後，普魯士思想界翻然大變，國際主義者一變而為國家主義者。詩人與哲學家鑒於各小邦的分立，不能維持安全，而鼓吹組織德意志聯邦。凡是說日耳曼語的人，或是從日耳曼種族傳下的子孫都團結起來，準備逐法軍出境。此時最需要的便是發揚民族性的方法。於是菲太復於一八〇七年到八年間到柏林演講，演講大意曰：在教育祛除普人自私的根性，養成國民團結效忠國家的精神。Humboldt 即為實地表現菲太理想之人。國家教育的系統，由此而定。德國的國家主義的教育，即以此時為起點。

在一八七〇以前法國教育上的國家主義，並不顯著。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役，法國大敗以後，法人遂垢羞一如德人。一八〇七年以後所為，極力鼓勵民族精神，藉謀報復。法人認此次失敗，為教育的失敗，有菲愛者一如菲

太之舊事，起而極力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著書名『以國家爲重之教育』論國力恢復和教育的關係。菲太論普國敗績，由於利己主義所致，因而喚起愛國情懷。菲愛亦觀當時法國偏重智識教育，墮於偏狹的功利主義，故排擊個人主義的教育，提倡以國家爲本位的教育。自經菲愛提倡以後，法國遂和德國同爲有名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的國家了。

就以上兩例，可以證明國家主義的教育，實起於政治的要求。

在德國方面的哲學思想，亦爲國家主義的教育盛行的一個原因。康德的哲學，把世界分爲兩種，一是感覺的世界，一是理性的世界。我們人類應當力爭上游，行爲應當超於感覺而訴合理性。此種哲學，本來不帶國家主義的色彩。但在一八〇七年以後，這派哲學也有變更。菲太在戰前的演說，說人道的目的在於建築一個王國，在王國之下，所有人道的關係，均以自由或『理性』而決定。這是康德的精神相合的。當他在一八〇七至八年演講時候，都說德國唯一的使命即在建設此種王國。這是爲了統一德意志，趕走法國人而發的。他說日耳曼人爲唯一的人民，他是能認識精神自由，因根據理性的行爲而獲得自由的原理的。如能不負此種使命，『便能提高日耳曼的聲譽，在所有恢復祖國的民族中爲最榮譽的。』他又假託先人的口吻向日耳曼人說：『吾們在吾們的時候從羅馬世界帝國教了日耳曼』但是『你們的時候，是更大的幸運，你們可以一次便建成精神和理性的王國，取消管理世界的物質的勢力，但是這不是自私自利的。他以爲這是對於所有的國家有益的。』這種正當理性和真理的世間國的大期望，不當變爲泡影的。現在的鐵器時代，不過是達到較好階段的過渡，』所以

結論是：「此間并無中央的路；假若你們墮落，那麼人道也隨你們墮落，永沒有恢復的希望了。」

我們從菲太的哲學思想中可以看出兩點：一是日耳曼民族的誇大，二是德國國民統治全世界的理想。這兩層意思，也許是為激發當時民氣而發，並不實心主張，但是後來一班德國的理想主義者，更接受了他的哲學見解，造成一個哲學系統，使得德國國民個個夢想此種理想王國的實現，個個想盡他們優秀民族的責任，征服世界，宣傳他們的文化，把全世界人類帶到至高理想之境。這種夢想，為黷武好兵的君相所利用，於是便利用教育為宣傳此種夢想的工具，養成誇大好勝的精神，以致造成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從這一方面看來，德國國家主義之趨於極端，實由於哲學思想的相輔而成。

還有國家主義的教育的重視國家，抹殺個人，哲學思想也當負一部分的責任。黑智兒承康德一派的哲學，尊重理性。他又假定一切制度為理性的表現。國家為制度之一，尤為較高的理性的表現。個人行動，應當根據理性，即應當絕對服從國家以完成其理性。更就此定他的政治哲學的系統。梟悍榮豔之君相，奉此為護符，便不惜以全國國民為遂其大欲之工具，而國民習染此等哲學思想，亦認為當然。因此國家教育，乃成為國家造工具的工具，并不在造就各個能思想的國民。所以國家主義的教育的抹殺個人，亦本於哲學的思想。

三、國家主義的教育的實施

國家主義的教育的實施，有兩方面為必然的結果。一為國家管理教育，二為課程方面之注重愛國主義，茲分述梗概如下。

(二)國家管理教育 國家既以教育爲團結民族之工具，那麼教育政策必須統一，要求教育政策的統一，那麼教育權必定要國家管理，此爲當然的結果。關於這一方面可分兩層說明：

甲收回教會教育權 在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各國教育權，均操諸教會之手，教派紛歧，不能養成一德一心的國民，與國家主義根本不能適合。在十八世紀晚年，即起所謂教育返俗（Secularization of Education）的運動，法國方面以 La Chalotais, Duques, Rolland 等提倡爲最早。Rolland 主張收回教會教育權，由國家施行統一的教育。他說用統一的教育『可以把各省青年與有生俱來的成見去掉，他們可以形成同樣的德性和公平的觀念，他們需要統一的法律，這種法律，他們的父親也許是厭惡的』。他又說『教育是養成愛國心的惟一工具』。從他的說話中，可以見得國家主義與教育的精神。一七九一年，Talleyrand 在國會提案，主張以學校爲促進國家文化之機關，視爲國家職能之一，不當認爲教會的職能。一七九二年，法國一切教會教育的機關，都經國會取消。拿破崙時代教育權集中於『皇家大學』（Imperial University）。教會雖然恢復教育權，但在皇家大學嚴重監視之下，與國家主義并不衝突。以後國家教育逐漸發展，教會學校逐漸減少。一九〇一年國會通過一議案，非經政府認可的教會學校不許設立。一九〇四年法令，無論政府認可與否的宗教團體都不准從事教育事業，到一九一四年爲止，凡專爲教育事業設立的宗教團體，一律勒令停閉。雖然不幸一九一四年歐戰起事，此條法令沒有實行，但是政府總無將教育權交還教會的意思。

普魯士的收回教育權，從一七八七年起始。後來威廉第二反對國家主義與俗化主義（Secularism），又將教育

權交還教會。一九一四年普魯士民治公布後，國家的管理教育權，始經確認。教會設立學校，永受國家的支配。

乙國家教育系統的確立 德國的國家教育系統建立最早。第一個提倡者是非太，即當一八〇七年普法議和以後。此後法、意、英、美諸國在十九世紀中相繼建立國家系統。此種由國家管理教育的理想遍播全世界，其他各國如瑞士、荷蘭、丹麥、挪威、瑞典、中國、日本，皆受國家主義的影響，視教育與國家前途有密切關係，和極實行國家教育系統。

克柏萊在他所著的教育史的一章教育爲國家工具中曾說：「現在進步的國家，認定國民的教育和他們的社會的、政治的、實業的進步和國家的幸福，有密切的關係，因而國家的管理，便視爲國家不可少的機能。」國家教育系統的確立，即是國家主義在教育上的表現。

* * * * *

(二)課程方面所表現之國家主義 課程爲達到教育目的的工具，所以實行國家主義的教育，對於學校課程，都有一定的規定。戰前德國學校課程，自全體言之，有以下幾點國家主義的精神。

1. 愛國主義在課程中雖然不是獨立的科目，但是從小學到大學，從低年級到高年級關於愛國主義的教授，是很有系統的和各科聯絡的，此種教授充滿了尚武的精神。

2. 學校培養帝制的信仰，和對於威廉二世朝的忠心。與現政府有妨礙的學說，大受排擊。

3. 學校因爲誇張德國的事業和文化，并且否認己國的缺點，遂發展成一種國家的自私主義 National

c. 學校幻想一而更雄偉的國家前途，暗示增加勢力於海陸軍的希望。

e. 條頓主義 Teutonism 的稱揚，為德國教育的特性，因此自然伴起一種輕忽別國的性質。

法國課程中的愛國主義集中於下列五點：

a. 愛法國，b. 尚武精神與從戎的義務，c. 培養勇敢精神的責任，d. 納稅供給軍隊餉糈的重要，e. 關於國防的知識，f. 人口減少的危險。

關於以上諸點的教授，也是有一定的系統的。有些教科書中敘述這些理想，而且還附述主張的理由，茲摘舉數例，以見一斑：

你們知道祖國是什麼嗎？牠即是你們的母親在懷中抱着你們的房子。牠即是你們在上面做快樂的遊戲的草地。牠即是你們受第一次教育的學校。牠即是飄揚法國國旗的城市會堂。凡是你們的祖宗所在的地方，即是牠所在的地方。牠即是你們每次回到村裏帶着歡愉看的大鐘。牠即是你們的父親耕作的原野。牠即是你們常登的山。

同國的人為同胞，他們組成一個大家庭，一個民族。

三千七百萬的法國居民組成『法蘭西家庭』。他們有同樣的歷史，同樣的歡樂，同樣的希望，他們對於祖國的衰落，感覺愁苦，他們對於祖國的興盛，表示驕傲，他們與國家是休戚相關的。

祖國是你們應當愛的國家，盡你們的心力尊敬和效忠國家。

※ ※ ※ ※ ※

假若你們的家庭受人侵害了，你將怎樣辦呢？你將聯合你的父兄抵當牠的仇敵了。這是同樣的情形，當祖國受人欺凌的時候，所有的法蘭西人起來抵抗外國的敵人。

※ ※ ※ ※ ※

當戰爭日來時，備戰者爲了祖國忍耐飢渴寒冷，寧可準備著死，不要離開了駐紮地。

以下更略略敘述德法兩國各科目的教授的大概情形。

國語地理歷史三科，和國家主義尤有密切關係，兩國都是很注重的。法國革命時，各部人民語言紛雜，彼此理想情感，不能自由表達，對於民族的意識的發展殊有妨礙，當時政府便設法統一國語。一七九四年制定學校教授國語法，把會說法語的教師分配到通行外國語的城鄉，教授法語，每十天此等教師應有公共演講一次，講譯法國的法律，法國對於國語教育的注意，可稱很早。德國對於國語，當然也是非常注重。小學校教授德語，永不許混用一個外國字，假使遇了不得已時，須用外國字，教師還要先道歉一番。詩歌文學爲民族性的結晶，德法兩國都非常注重。歷史與國語在發揚民性方面，有同樣的重要。關於國語，兩國均反覆陳述。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法國阿爾撒斯羅倫州給德國，法人認爲奇恥大辱。法國小學教科書中，時常論及「他們（阿爾撒斯羅倫州的居民）是怎樣的受一八七〇年野蠻戰爭的痛苦呢！」還有一本教科書中敘述一個對話體的故事：「唉！

爸爸！』小路易叫道：『兩州的人眼有德國的兵士命令他們，遠遠看見法國國旗，他們却不能安排他們自己在牠之下，他們將要感覺何種的痛苦呢！』諸如此類的課文，是不勝枚舉的。關於歷史的教材，德國用爲誇大己國文化的最好工具。他們是純粹的條頓民族，沒有經過羅馬的征服的，他們的血是純粹的，和其他民族不同，沒有羅馬人的血混雜在裏面的。條頓族是得天獨厚的民族，負有主宰世界的使命的。菲列得力克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是神聖文武的皇帝，德國人民受他的恩賜是很大的。這些誇大的口語，是在歷史教材中充滿了的。地理也是激勵兒童愛國心最好的科目。法德地理上的關係，兩國都研究得非常清楚。法國學校教授德國地理時，故意把阿爾撒斯羅倫兩州用深色線隔開，表示這兩州原不是德國的，是被她搶了去的。美人亞力山大 Alexander 所著普魯士小學校一書中詳載德國小學校教授法國地理上課情形。教師對於法國的山脈，河流，商埠，鐵路，軍事要害地，指示得非常清楚，兒童都能把個個名字背數出來，絲毫不差。德人教地理，又常有朝乾夕惕之問答：『什麼是德意志？』『德意志是爲敵人所包圍了的！』

戰前德國小學校對於宗教特別注重。尊君，愛國，敬神，本是三位一體的教育目的。君，國，神，三者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君是國家的元首，又是代表上帝的意旨的。個己藉國家而完成，君主復藉國家實現上帝之意旨。所以個人尊君愛國，還要敬重上帝。德國宗教課程所佔的時間是很多的。

四、國家主義的教育之評論

國家主義的教育理論與實施，既如上述，此時應問此種教育之功罪如何？我們從此種教育的背景看來，此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

種教育實出於政治的要求。我們若是不能反對民族自保的政策，我們便不能反對國家主義的教育。國家主義的教育在德法的起原，上文已講得明白，所以國家主義的教育的發生，實是自然的結果，是無可非議的。德法兩國實行此種教育，都收了效果，達到最初的目的。一八七〇年，普之勝法，普國大將毛奇歸功於小學教師，國家主義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在民族自保方面，國家主義的教育，實有相當的價值。世界一日不和平，便一日離不了此種教育。

還有國家主義的教育，在發揚國民性，宣傳國家文化方面，也有相當的價值。國家之有國性，猶之個人之有個性。個人的個性，應當儘量發展，以效用於社會；國家的個性，也應當發揚起來，以效用於國際。人類的幸福，非各種民族儘量發揮特長以貢獻於全世界，是無由增進的。國家主義在發揚國性方面，也有相當的價值。

不過以上所舉的兩種效用，推至極端，便造成許多罪惡。民族要求民族自保，遂致窮兵黷武與武力主義（*Militarism*）合流，因為要發揚己國文化，遂致流於矜誇，浸假而思以武力宣傳文化，其結果遂致釀成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極害了國際的和平。這是極端的國家主義釀成的罪惡。

國家主義的教育，在一方面受了理想主義者的影響，遂致過分尊重國家，輕蔑個性。機械的教學和訓練，只造成許多做國家的機器而不能自由思想的國民，這又是極端的國家主義的第二罪惡。

方今全世界的人，正詛咒此種主義，即是因為牠釀成這兩種罪惡。國家主義的教育的功罪，既然如此，此時中國如若與德法從前的情形相似，便有實行此種主義的必要，要問能否實行，便要看此種主義能否避免上述的

兩種罪惡

第一種罪惡是和國際主義相衝突的。有些人因為這層原故而反對國家主義的教育。但是國際主義，難保不是空談闊論，距實現的時期尚遠。德人菲太在一八〇七年以前，何嘗不是國際主義者，但是自介那一役，忽然變為國家主義者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法國 M. Gustave Herve 教授，著書污辱法國國旗，并鼓吹軍士革命，假若法國要宣戰，但是歐戰既起，他却反過來寫愛國的歌詞，鼓舞法國兵士了。這樣看來，國際主義，不過是一座海市蜃樓，虛無飄渺，不知哪一天才能現實。而且即是承認國際主義的實現，是眼前之事，國家主義的教育，若為有限制的實行，斷不會妨礙國際主義的。Patriotism 在他所著的民族之心理中說：“The emotions, the func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nations ought to be made to grow rather than be lost in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ism... Advancement toward internationalism will be made by a moralized patriotism rather by outgrowing patriotism.” 國家主義的教育，如常避忌「國際」的題目，和民族誇大狂，實在是和國際主義並行不悖的，而且是相輔而相成的。

國家主義的教育的第二種罪惡，是和國民的個性 Individualism 衝突的，也即是和平民主主義的教育的原則相衝突的。但是這種罪惡，是德國的政治哲學造成的。最初菲太和柏林的一八二七、二八年的演講，有他所主張的教育，實在和國家主義，平民主義兩種原則相合的。Reinert 所著之一七八九年的國家主義與教育一書說，「他（菲太）主張一切教育不當有階級的區分，階級的制度他認為和德國國民性不合，他以為每個兒童無論

社會的地位和經濟的情形如何，都應當給與充分的機會，在德、智、體、職業的教育方策中發揮他的固有的才能，爲國家服務。……菲太在他對於德人演講中曾經聯合了十九世紀政治發展中的兩個重要觀念，即是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

國家主義的教育與平民主義的教育的分家，實在由於以後的德國君相利用理想主義所行的「愚黔首」的政策。我們此時再把這兩種主義融合起來，一方面尊重兒童的個性，一方面使得兒童明了對於國家的責任，這樣是可以避免極端的國家主義的教育的第二罪惡的。

這樣一方面尊重國家，一方面尊重國民個性的國家主義的教育，可以名之曰「相對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以與前之極端的絕對的國家主義的教育相別。我想此種主義的教育，有最初國家主義之精神而無現時國家主義之弊害，在中國是可行的。茲爲評論此等主義之價值起見，故略帶論及關於此點，當另作文論之。

本篇所參考書目

- Riesner: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since 1789
Rose: Nationality in Modern History
Oberley: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Dewey: 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cott: patriots & the making

Payre: Comynayre's History of Education

鄭次川：教育思潮大觀

Peter sandiford: Comparative Education

Partridge: The psychology of nations

再譚國家主義的教育

李璜

國家主義的教育與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

我們何爲而主張國家主義的教育？其理由至爲明瞭而且簡單：

(一) 對外爲抵抗文化的侵略政策。因爲我們認定以外人的信仰與教條，不自然的強加之於我們的教育界，足以損害或竟淹滅我們多數國民的獨立人格。因之國家主義的教育在提起國民對外獨立的精神；有了一個很清楚的獨立的「我」，然後纔能取客觀選擇的態度，然後對於挾流沙雜毒質以俱來的西方文化，纔能加以判別而去取之。

(二) 對內爲喚起全中國國民的團結與活動，以共同消弭今日之大患，而籌謀來日的大業。因爲我們不承認中國國民在消極方面，完全沒有抵制目前盜賊的能力，在積極方面，完全沒有共宏祖先遺業的志趣。我們知道這是因爲他們還不大明白公利之所在，還沒有倫理上公共的大目標，所以不是人自爲戰而力弱，便是各顧其私而壞事。因之國家主義的教育是爲中國國民在各個人私利之上，指出全民族公利之所在，實言之是要爲今日之中國人建設一個道德上的新信仰。

這兩個對外與對內的理由我們在一本最近出版的小冊子——國家主義的教育（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中華書局印行）——裏面已經解釋得很清楚。既然這個理由是本乎眼前最明瞭的事實，而在大勢上，爲中華民

國的前途計，也是唯一應走的路子，我們本來可以不再說話，立刻希望我的教育界去採擇實行便好了。不過今日中國的智識界正是衆說紛紜，莫知所向的時代，中國青年的教育家在選擇他的根本主張的時候，很怕照着這一條路子走去，前途或者有了很大的衝突，使他們的精力陷於不經濟或竟自白費的地方。因此我們在這裏繼續次第的將我們所主張的國家主義的教育理由與所謂進化趨向的一些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比較而略譚一譚。今日本是自由批評的時代，我們所主張的理由既非本乎一個哲學家在屋子裏的玄想，又非隨着一些宗教家在教會裏的信條，我們儘可以比較的討論，使我們的理由意見明確，并希望愛國的青年教育家不斷的注意這些比較討論的理由。

* * * * *

(一) 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教育——民主主義是甚麼？這個問題的解答，大家早已預備下了，一定是一齊答道：民主主義是民有的 (of people)，民爲的 (by people)，和爲民的 (for people)。政治主張，就其實事言之，便是全民所有的自主國家；就其個性言之，便是民族自決的獨立國家；前者本其在內的組織，敵對其歷史上的專制政體而言；後者本其對外的態度，反抗其侵略者的強暴行爲而言。原來在專制政體的時代，一國的人民實在說不上愛國，更說不上國家主義。國家的領土主權都是一國的帝王私有了的，人民不過是附屬品。「朕即國家」，一家奴只要愛主人便好了，那裏還够得上愛主人的房屋財產呢！我們從前很憤怒拉那氏這句話：「我的江山寧給外人，不與家奴。」其實這句話是本乎專制國家真實現象而言的，所以民主革命的第一義首在取

國國權；民主主義的教育首在認識國的本身與國民的本身。因此之故，國家主義實在可以說是由民主主義產生出來，民主主義實在也可以說是由國家主義醞釀而成。法蘭西大革命的山岳黨人（Montagnards）當時都被人稱為國家主義者，并非沒有原故；他們之所以不能不起來做那流血革命的事業，因為照路易十六那樣幹下去，國家已見危殆了。所以法蘭西大革命民主黨的旗幟是「祖國危殆了」（La Patrie est en danger）！孫中山先生之立意革滿清的命，也是由於愛國之一念。他曾自述他在廣東時，看見台灣的難民，因為父母之邦遭外人割據了，携幼扶老的逃回福建廣東，狼狽之狀，不忍目觀，而清政府置之於不顧。他纔深明白了專制帝王之可惡：一國的領土由他割讓，一國的人民聽他死亡。（見十二年上海「新聞報紀念冊」）可以說這個觀感便是他後來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一個動因，而且是他至今拚命要將政權爭歸民有的一個理由。

雖然民既有之矣，還要民能為之繼續事。今日的中國，在表面上，何嘗不是民有的政治，而其實又何嘗民能為之。要民有民為，起碼便須中國人大家有個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趨向，能同心方能協力。像今日這樣一盤散沙，同牀各夢，雖有大力者亦不能挾之以趨。況既主張民主，最要緊的是國民自動，不假他力。要全國國民本乎自動之力而有所為，又要他們動的趨向不彼此衝突，而歸於公利的總目標，則又焉能少却國家的這個理想（National ideal）！「國利民福」，中國官場早有這一句常話，但是他們說這話時，是眼鏡放在鼻梁上，從高向下看的。國是他們主人的，有青草的山坡，民是他們主人長白毛的羊兒，只要草兒長得茂，羊兒養得肥，牧人便算對得着主人了。所以他們這個國利民福是平行的，是對峙第三者君主而言的。今日的國既係民主，則國之利即民之福。

國之不利即民之不福。這個道理非常明瞭，奈何今日有心民福而主張民主主義者反有時畏國家主義之名而不敢倡言呢！

其不敢倡言的原故，或者以爲國家主義往往帶有軍國主義的色彩，不合世界觀的民主主義的潮流，不錯的，我很贊成我們中國人能有這個意思，我很主張中國人握着這個理由（此點詳後譯國際主義一段）但是歐美的國家，如美，如法，他們都是以民主主義自詡的，又爲何不肯棄却這個軍國主義呢？他們是積重難反呢，或者是不得不然之故？他們不過是受了歷史的教訓，他們在歷史上看着以強吞弱，以衆暴寡，有些國家因無抵抗能力已經亡了多年，還沒有恢復的希望，有些民族簡直被強有力的驅散四方，至今數千年，尚爲人所不齒，雖富可敵一國，而反無家可依！黑格爾（Hegel）曾說：『世界的歷史便是世界的審判廳』（L'histoire du monde, c'est le tribunal du monde）。黑氏意謂古往今來的國家——在歷史面前經過，好像是在受審判，存在着的終不會輟理，而此理終歸於強有力而久存者。我們一着眼這樣的話，真是覺得日爾曼主義的色彩很盛，其實這未免冤枉了日爾曼人。歐美的強有力國家那一個離却了這個思想，無非說法各有不同罷了。在他們國內隨時都在提倡凌蓋世界，惟我獨尊的主旨。在國際上說起話來，做起事來，也是要爭他的「見去強迫」的國家服從。在從前智識未十分進步的時候，這樣說話做事，便不知慚愧，不用遮飾。在今日智識大進步了，便巧名之曰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e），或者是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或者是第二國際或第三國際（II^e ou III^e internationale），都一樣的是以其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上的主張而自居於首領的資格，強加之於少數弱小

國家——對於強國，其國家資格的觀念很深，其國民的團結能力很大，當然不易信從這種由外而來的國際主張。

米 米 米 米 米

(二) 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教育。——這樣的國際主義我們實在不敢盲從，不願領教，因為我們自視是個弱的國家，假若我們的力量也同別人一樣，我們至少可以同別人假意周旋周旋，或者竟可以同我們祖先哲人所有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拿了出來叫別人認識認識，這個理想比他們的武裝和平或階級戰爭高明得多！無奈我們現在自己還站不住脚，焉能說得起話？既說不起話，只叫我們加入他們這種國際聯合，去無條件的信從，豈不是一種笑話？百年以來，我們因為相信世界和平，我們受的苦已是很夠了！種種割地受辱的事實我們很不忍去回想。十年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以我們中國為殷鑒，而很沉痛的告其國人：「諸君相信無武裝的和平麼？請看中國，以其四萬萬人口，因為棄了所有武力組織和戰爭思想，到頭來落得在外國列強手裏，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東西慘遭蹂躪，地被侵害，城被砲轟，人民被屠殺，宮室被焚毀，甚至侵凌及父母祖宗之墳墓。」羅氏的話是如何的沉痛，而法蘭西人時引這幾句話在他們初級師範課本上，後面更加一句說：「此種教訓，真值得為吾法蘭西人去玩味哩！」（此節見沙各卜 Jacob 所著「初級師範倫理講義」第四百五十一頁）

別人方以我們的和平主義的結果為殷鑒，我們現在無論如何精心我們這個大同的道理是真實的，說了出

來也無人肯信或者還要被別人笑我們至死不悟，豈不太辜負了我們祖先哲人這種說法！因此，我很贊成我們中國人有了這個意思，我很主張我們中國人握着這個理由，我却很不願意中國人現在便拿出來，因為在別人看着有些滑稽。「請看今日之域中」，已是誰家之天下！至少要等揚子江和珠江流域沒有列強兵艦開砲示威，至少要等北京交民巷的太上政府退了威風，至少要等關稅航道的全權由我們自主，簡單言之，至少要我們中國路爲像一個獨立國家，然後出來加入或竟提倡國際主義，纔有人注意。因爲既曰國際主義，本來是以國的個體爲單位，今日的中國在別人眼中看來還不能算一個有團結的獨立國家，那裏能够得上與他們去譚國際主義呢！

現在這個國際主義，首先要每個國家武裝起來纔能去譚，本來便大不合於我們祖先哲人之所理想的。這是強盜式挾刀相向的要盟！不過我們既處在這個二十世紀，遇着了這班強盜式的國家，除了嚴裝以備而外，又有何法！將來到了我們能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的方法，達到能够充分抵擋這些強盜而有餘力的時代，然後慢慢教訓這些強盜：「你們終朝相奪掠的生涯，不可以當作長計！」那時候他們或者能够聞言驚悟。

著「永久和平」一書的康德，他也是與我們先哲抱同一理想的哲家。他時常愛着這種已往戰爭不息的歷史經過是很不利於鼓勵他所主張的永久和平的成立。但是他有希望於他這個理想的將來：將來終有一日，各民族的程度增加，能力相仿，大家由理性判斷的結果，知道相讓而並立的利益，慢慢的真正聯絡起來。

我們對於我們這個大同理想的將來也一點不失望。我們現在要極力做的，便是使我們人民的程度比人增

加，使我們國家的能力與人相仿，然後我們進而以我們的和平主義，大同主義號召於天下，為全世界謀共同的幸福，於是庶幾不愧愛和平的中國之名，因為他有本事積極的為和平努力。反之像今日這樣衰敗不堪，自顧不暇，不但不能為世界謀和平，而且將為世界和平之累。所以就是為中國人的大同主義，為世界人的永久和平起見，中國人也當先自愛我國，自強其國。由這方面看來，國家主義與真正的國際主義——不是為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設立的國際聯盟或第二或第三國際——毫不衝突，不但不衝突，而且如此設想的國家主義正可以扶助我們理想的國際主義成功。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中國國民努力自強，同時又希望不要棄却這個更大的思想。尤其是愛國的青年教育家該當注意這一點：當着向學生發揮中國的道理的時候，還要指明出我們所以愛國，一方面更含有最高的理想，換言之，愛國即所以為達到愛世界的心向，這并且是心理學上一條最要的原理，將個人習性所有的情操連系在一個更寬大的情操上，則前種情操更加發達而不害於大體。一個國民抱着一種理想去捍衛他的國家，必能格外有氣力一些。

唉！如果中國竟不幸隨着今日這種現狀而滅亡，則世界的永久和平真正的便算絕望了！一則因為從此人人更以中國的愛和平為前車，而愈逞其強暴的野心；一則要望歐美來真正主持世界和平是句欺人的話，他們卑視異種，敵視他族的心性簡直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有些中國國內的人說這無非是幾個歐美資本家政治家方纔取這樣的態度。我們願意說這個話的中國人來在外國——無論英、法、德、美或日本——與大多數外人無異，平民，無論貴族，無論智識界，無論工商界，相處幾年，便明白了！我有一個法國朋友名叫寶來（Belle）的，他

克所著的 *La Commune de Paris* 我引的係 Cl. Tonguet 的法文譯本。但是一點效力都沒有。德國的工人說是要保衛德國，非勇敢的去戰不可。法國的工人說是他們要盡國民的天職。於是眼看見這些贊助國際最烈，也在前敵當衝鋒隊去了。十月三十一日把這國際工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點一點名，一大部份執行委員都已經去當前敵第一隊的步兵。一直到底，德兵攻到巴黎，反轉是法國的農人商人首先提出講和的話，而法國的工人還要戰。（上節見 A. Goyau 的 *Le Message des secours françaïses de L'Internationale*）

至於說到第二國際圖的笑話更是不少。第二國際的中堅份子（Kautsky, Longuet, Ramsay MacDonald）到了一九一四年開戰前後竟明白承認「祖國的防護」（*Défense de la Patrie*）因為他們在情感上和事實上都抗拒不下去。他們心目中或者早已料定了後來一定有列寧（*Lénine*）這樣的人來批評他們道：「在學理上講來，這種主意（指祖國的防護）是表明他們毫無能力離開好戰的社會黨，在祖國的防護」這個問題，他們一點也不該加入。在政策上講來，他們簡直讓有產階級的國家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是走入改造派而退出革命派。」祖國的防護」這個原則，在平民眼中看來，是一種內奸的主張，是戰爭的導火線……」（見列寧著的「平民革命」中）

既然列寧這樣批評我也不再引第二國際失敗的事實了。因為共產主義的朋友們本來說：『就因為這第二國際靠不住，我們真正的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纔由列寧另行組織起來。』雖然，第三國際便靠得住了嗎？國際共產主義的朋友們！你們又有甚麼把握？我們自然不願意輕視你們的努力，但是我們既認定馬克斯「平民無

祖國」這句話爲不合事實與情感，一面既見着他在已往的失敗，一面又見着大戰後歐洲大勢的趨向，恰恰與這句話更去得甚遠，怎樣能使我們輕於相信而棄却這個祖國呢？在第二次大戰未來之前，我們也不願意便判定第三國際將與第一第二國際有同一的命運。不過我們就現在的形勢而論，第三國際的前途實在是不很健康，就舉眼前的一兩件事來說說：法兵占領魯爾（Ruhr）德國平民自然反對，法國下院議員國際共產主義的首領加山（Thorez）很表同情，便到魯爾去演說「法國平民并無意於此。」法總理撲加來（Poincaré）大怒，立刻叫法庭提起公訴，說加山賣國。法國的平民如果是相信第三國際的原則，贊成加山的行爲，該當大家起來反抗撲加來這種無理的暴舉，大罷工，大示威，是法國工人常做的事，何爲此次寂然不動？反而是法國上議院的紹紳先生們看不慣撲加來這種過甚之舉，等到加山案交到上院審察時，簡直置之不理。於是撲加來方敗了興，不過結果因爲加山不得大多數平民的後援，便判決了六個月的監禁。照法國言論自由的慣例講來，這回撲加來實在是過渾，有意蹂躪國際共產黨。我曾親自向法國工人譚起，問他們爲甚麼任撲加來這樣橫行，不大家起來爲他們國際共產黨爭面子呢？有些竟說：「德國破壞了我們的北方，不任賠償，我們焉能不力追求，占領魯爾還不夠呢？」有些說：「不占魯爾我們那有炭燒，等我們的爭戰創痛好了的時候，再講國際主義罷。」加山太勸得早了。一聽這兩個法國工人的話，立刻便覺着國家情感與實際生活已充滿了法國平民的腦筋。前幾日英國大選結果，英國的社會黨大獲勝利，但是前次選出的一位主張第三國際的共產黨議員反選落了，可見英國的平民雖趨向社會主義，也是不以第三國際爲然。

我所以不嫌煩瑣將這些近事敘述了一些，無非是要說明歐洲平民雖有社會主義的傾向，而都不能棄却國家觀念。——並且我們相信永遠是不能棄却的。——在這種形勢之下，第三國際首領的俄國蘇維埃政府便勸我們中國平民先棄了祖國，去同他們一路，他又用甚麼來保障我們的將來呢？說句老實話，就是蘇維埃兩三年來的政策還不是取的「遠交近攻」的老法子。我們想，我們的外蒙的那一大塊土，真不敢亂相信蘇維埃外交官的話啊！有人說中俄一親善，中國使立刻脫出了各資本帝國的羈絆，這句話未免太不明事實了！世界上也從來沒有專靠別人而能自由獨立的道理！更有人主張用俄國的紅旗兵來征服內亂不休的中國。我們很佩服他這種相信俄國現政府的決心！在前三四百年這個辦法或者可以成功，吳三桂不是曾經做過來。但可惜今日民族思想大昌明了，莫以為中國人全無國家觀念，不過他這個潛意識不十分明瞭罷了。不然，三百年根深蒂固的滿清如何會一旦掃除而不存！如共產主義者相信主義，定要試驗一下，寧肯犧牲中國而不惜；但我們却不能讓我們的祖先數千年辛苦遺業拿去當犧牲。一個國家不是化驗室中的藥品，隨便可以用來試驗臆說的。

我們曾經為共產主義的朋友設想過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是不難推翻，因為他并無實力與氣魄，大都虛有其表而已。中國未來的資本主義也可以設法預防，如像先用「森的加」(Syndical)的方式，慢慢集合起工人罷工，加以教育和訓練，使他真正有了抵抗壓主和商家的知識和精神，然後對於罷工示威等舉動纔能發生真正效果。馬克斯曾說得好：「一個階級要達到他的充分能事，第一要有連帶利害的觀念 (the solidarity) 第

「要有全國的連合 (Je liou national) 第三要有政治的組織能力 (Organisation politique)」(見 *Another* 譯註的「共產黨宣言」第八十三頁) 我們很願中國共產主義的朋友們照着馬克斯的話，先求訓練，團結中國一國內的工人，使他具備了這三個條件之後，則對於中國的資本家和外國的資本家都不愁沒有法子去抵制。萬不要今日一起首便完全希望外國來幫助！我敢大膽說一句話：無論中國講何種主義的朋友們，如果他們一起首便完全希望外國的幫助，未有不失敗的！請看列寧這幾年來的奮鬥，又依靠過那一國？至少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要做到列寧這樣內患莫能發生，外侮無法侵入，然後進而譚國際主義，其庶幾！其庶幾！一句話說完：對於中國今日的這般內奸外寇，完全要憑中國國民全體自家努力纔能除去，要團結起大多數的實力來，非用一祖國危急了！——這個切己的事實和明確的概念不可！中國社會主義者今日的努力當在此而不在彼！

* * * * *

以上不厭繁複的將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等一一比較而譚，無非是說明我們這種教育的主張，並不絕端的與這些思想立於反對的地位。不過既自信認清楚了此時中國的緊急需要，我們不能不主張國際主義要退一步，並且主張國際主義一定要先做了我們所主張的這一步，然後纔有希望達到他的目的。有人說：「你們的意思，只要切切實實的現在教育上施行就是了，又何必標新立異的弄一個主義的名稱？」說者的意思是以爲只要在公民這一課上用力就好了，不知我們的意思還不只要中國人消極的當一個良好公民便算滿意，我們是要他積極的能够犧牲私利而竭力服務國家的這種精神。簡單言之，我們的國家主義的

教育，是針對個人主義的教育而發。因此我們標出國家，便是指明眼前公利所在的社會，——從前中國人都認得并且主張公利所在的社會是家族，所以中國歷史上確有了許多孝子賢孫，今日家族主義不行了，正是國家主義出來代替的時候，——請大家向他寄托一個理想，對他承認一種義務。我們深以為人生不只是飲食男女的問題，解決了便算圓滿，如果沒有道德上的一種理想，維係着精神，不但社會不能治安而定，就是一個人吃得飽飽的，坐在沙發椅上，也會不知不覺的煩悶起來。別嗎？別人說：『你們何不把他係在公利所在更廣的社會，國際社會或世界上？』我們回答他道：『我們相信教育家這句話道德觀念的起點是在對於一個羣體的系屬起點的時候。』(La morale commence à ou commence l'attachement à un groupe) 現在中國人雖然離於家族這個羣體的系屬，對於這樣明白的一個國家羣體，有一定疆界，有一定主權，并且隨時影響着自己切身利益，他還麻痺糊塗的看不清楚，係不上去，何況更難於世界這個大而不可捉摸的羣體！所以我們每每覺得教育家要叫現在中國人爲世界的公利而抱一種普遍的犧牲精神，犧牲私利的想法，未免有些虛欺欺人，就是現在中國人認清楚中國全民族的公利而去賒賒犧牲他的私利，都還很費事呢！此所以我們更不能不要在教育上明標旗幟，盼望教育界多數同志的瞭解，一齊努力進行罷！或者言之之後，能於八歐戰後之世，爲中國人建設一個道德上的共同信仰。

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 巴黎

國家主義與教育

陳啟天

I 國家主義對於近代教育的貢獻

近代教育與國家主義的關係至爲密切，無國家主義即不能完全產生近代教育。美國賴士祿著國家主義與近代教育一書 (Risner's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Since 1789) 專門發明國家主義與近代教育發達的關係可謂詳贖。其開宗明義說近代教育發達有三大主宰的要素 (conditioning factors)，一爲國家主義 (nationalism)，二爲平民主義 (democracy)，三爲產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三個要素有時相輔，有時相反，而對於近代教育的貢獻却各占有重要的位置而發生極大的影響。我國近年來最時髦而最有勢力的教育思潮莫過於平民主義，而汲見者遂以平民主義爲決定教育問題惟一無二的要素，是未免近於偏了。殊不知平民主義固對於教育有極大的關係，而平民主義乃建基於國家主義之上，教育與國家主義的關係亦大。現在所謂平民主義實不能完全脫離國家主義而存在，通常以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相反的誤解，乃生於侵略的帝國主義，而非生於合理的國家主義。合理的國家主義乃用以改造國家使之外可以獨立，內可以統一而成功世界具有國性的一個國家，固不可過於自尊自大，也不過於自暴自棄。這種合理的國家主義可以叫做國家的平民主義 (national democracy)，也可以叫做平民的國家主義 (democratic nationalism)。普通談到平民主義的，總以爲與國家主義兩不相容，這不是不同侵略的國家主義與平民的國家主義的分別，就是理想過高太無

國家觀念，不切我國目前的需要！

法國不是實行平民主義的一個先進國嗎？然而不以實行平民主義，即完全拋棄國家主義，並且因為要真能鞏固平民主義，更不得不切實提倡施行國家主義。一七九一年九月四日法國所公布的共和憲法即規定創立教授一切公民的普通教育制度而以國費維持之。同月陶乃南（Talleyrand）提一議案於議會，極力主張全民政治教育的重要，務使全國國民可由教育而知道，而贊愛，而服從，而完成國憲。其意似在以國家主義的方法實施平民主義的精神，可見平民主義與國家主義不相衝突了。其他若（Condorcet）若（Saint-Just）等關於教育的議案雖在共和旗幟之下也多少含有國家主義的彩色。一七九三年「洛門律」（Romme Law）更極力宣示培養學生共和的態度和愛國的精神，是融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於一爐了。以上數例乃法國大革命時厲行國家主義的方法，其後法蘭西能到今維持其共和的一大原因，即在其於共和政體之下厲行國家主義的教育。我國民以為有了共和國體的招牌，平民主義的高調，就可完全排斥國家主義，豈不是太無歷史常識嗎？

我們既知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不是絕不相容，即可進而說明國家主義與近代教育的關係或其貢獻。我們翻開近代教育史一看，可知國家主義對於近代教育有兩大貢獻如下：

（一）教育是國家的任務——十八世紀以前各國教育權多在教會和私人手中，不但他們的經濟和能力不能勝教育之任，而各自為教，亦不易普及統一，有益於國家。故自法國革命以來，拿破崙首先創立中央集權的教育制度，從教會和私人手中收回教育權，或由國家經營或由國家監督。自此風氣各不相謀的教育，遂大減其勢

力當一八〇七年普敗於法，菲斯的（Fichte）欲以教育上的國家主義再興德國，而普國國家學校制度完全成立。教育經費由國家擔任，學校事務由國家經營，以求教育可完全普及，此非以傳教為目的之教會學校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私立學校所能辦到。日本仿效德國，以教育為國家的任務，而採用極端的中央集權制度，雖偏於整齊劃一，而非如此不足有造於日本的崛起，可與列強並駕齊驅。美國教育權原屬於私人與地方，而近來多認教育有中央集權的必要，始由各地集中各州，近復有集中聯邦政府之倡議，雖未至國家經營教育的一步，而國家監督補助指導教育的方法已漸次推行了。美國自經歐戰，人民對於國家之覺醒頗為激發，教育上雖一面提倡國際主義，而一面仍厲行美國化教育，是非國家主義之表現而何？至若我國以教育為國家的任務，雖自光緒末年建設新教育制度，已建立一個基礎，而輿論尚未完全造成，以致推行不力。加以歷年政變，財政不足，而外人以傳教為目的之教會學校，遂得林立於各省，為我國教育統一的大患。若不設法取締，則中國不必亡於武力與經濟的侵略，而要先亡於教會教育的侵略了。我們要知道教育是我國國家的任務，不是外國教會的任務。在本國私立學校，中央或地方政府，應加以嚴格的監督，而外人辦的教會學校，反享有治外法權，國家毫不過問，且有人以為可以不必過問，天下怪事，真無過於此！

（2）教育是國家的工具，國家以教育為實現國家目的的工具，發揚國性（nationality）或共同的文化（common culture），培養國民，以為立國的根本。所謂義務教育，公民教育等均由此而生。關於教育為國家工具的理由，美國孟祿博士曾做教育上的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一

文述其大概，茲節述如下：

『十世紀以來的歷史，要不外求國家實現的戰史。由此長期的戰爭，遂漸認由共同的習慣、理想和目的所組成的共同文化，爲國性的一個要素。近代多數戰爭，皆由破壞此種原則而生。例如一八一六年的維也納會議和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所決定的各事，只以勢力爲根據，而不顧及各國的國性，以致釀成空前的歐戰。而由某種真義說來，歐戰乃改正拿破崙失敗以後各國所訂不公的條約呢！』

『自十八世紀以後，公共文化，乃成國性的主要要素，而生出兩種相關的根本原則：第一，公共文化乃超越一切社會的宗教的經濟的分別之一種性質，因此而國家的重心遂由專制君主或少數貴族之手，而移於全國民。第二，公共文化是人爲的結果，可以任意製造。製造共同文化的方法就是教育。故自一種見地說來，十九世紀乃國家發達的時代，一面以民治解釋國性的問題，而一面以教育爲製造國性的工具。』

『首先有意應用教育的方法以決定國性的，爲德國。在拿破崙戰爭以前，德國分爲百餘邦，而於其後，漸合併爲一聯邦，不可謂非教育之功……』

『實際近代國家，都已知教育爲發展國性最有力的工具。教育是促進文化的工具，可使後進的人民與先進的人民齊等。教育是改造國家的工具，可使弱小的國家，成爲強大的國家。教育是過渡的工具，可使閉關的國家，成爲世界的國家。教育是爲有國家組織的世界的保安工具。』

『由此看來，十九世紀的國性發達史與教育問題有不解之緣。而現在的教育問題若目的、教材、組織甚至方

法等也均可找出以國性解釋的問題。』

我們由孟祿博士的言論，可略知近代國家以教育爲製造國性的工具之大概，至如何利用教育製造國性，本篇不暇論及，若我們取賴士祿的國家主義與近代教育一讀，將可知其詳情了。

II 中國教育與國家主義

中國舊教育權，多操私人手中，無所謂國家主義的意味。良以閉關時代，既無異國之接觸，遂無己國的覺識，故不能產生所謂國家主義。自鴉片戰役，英法聯軍，甲午戰役而後，國家的覺識漸漸萌芽。教育與國家主義，漸生因緣。同治年間容闈曾國藩們所提倡的兵工教育，與光緒甲午敗後張之洞所主持的西政教育，其目的似均在『強國』，稍有國家主義的意味，而尚未成系統。明日張謇主張國家主義的教育，第一個代表人物當推梁啟超。梁氏於壬寅新報發表論教育當定宗旨一文，即以教育爲國家製造國民的工具。他說：

『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勝劣敗之場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熟考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

梁氏所謂公教育，即國民教育，或國家主義的教育。這種教育思潮，原非創自梁氏，他不過將當時的世界教育思潮之最要者，應用於我國耳。簡直些說他的論旨不外想以日本的國家主義的教育，推行於我國耳。這種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潮，當時很爲流行，梁氏乃其中的一個代表。這種主義對於中國教育有三大貢獻：

(1) 創設國家的教育行政機關——前清原無專設的教育行政機關，光緒二十八年於政務處設管學大臣，是為中國國家專設教育行政機關的萌芽。光緒三十一年創設學部，專管國家教育行政事項，而中國國家教育行政機關乃成立。民國元年以國體變更，改學部為教育部，迄今無多改變。

(2) 建立國家的學校制度——前清原無新教育的學校制度，光緒二十八年，乃由張伯熙奏定學校章程，二十九年頒布本國，於是國家的學校系統，初有頭緒。到十一年新學制系統改革案成立，雖其間經過許多變遷，都是因時制宜，以形成國家的學校制度。

(3) 宣示國家的教育宗旨——光緒三十二年宣示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實、尚武五項，是為中國明定國家教育宗旨的發端。及民國元年以國為民主，乃新頒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而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前後兩個教育宗旨均含有國家主義的彩色，如尚武和軍國民教育是也。民國八年教育部調查委員會所議定教育新宗旨為『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遂由國家主義的教育而趨向平民主義。民國十一年學校系統改革案所定的教育標準者：(1) 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2) 發揮平民教育精神，(3) 謀個性之發展，(4) 注意國民經濟能力，(5) 注意生活教育，(6) 使教育易於普及，(7) 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等七項，更少國家主義的彩色，實有討論的必要，請另節專論之。（參閱中國教育宗旨問題）

II 中國教育重新採用國家主義的必要

我們由第一節可知國家主義對於各國教育的貢獻最大，若各國無教育上的國家主義，即不能造成各國的

特殊國性而在世界上占一位置。由第二節我們可知我國教育上的中心思想由國家主義而趨於平民主義。此種趨勢固為時代思潮與國體所致，而國人過重理想以為平民主義全與國家主義相反，因急於舍棄國家主義，亦為一大原因。

所謂德模克拉西 Democracy 我們不是從美國販來而認美國為實施 Democracy 的模範國嗎？然美國參加歐戰惟一的理由說是為平民主義而戰（fight for democracy）。我們由這個宣戰的理由可知美國人所謂平民主義，不但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不但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不但是和平的，還是戰爭的；不但有自由平等的要素，還有急公好義的要素。而我國所謂平民主義則兼有各種相反的要素，不是流為苟安乞憐的和平主義，就是流為享樂自私的個人主義。如此的平民主義何所恃以立國？在美國以擁護平民主義統一國民的精神向世界發展，而我們則以平民主義離散國民的精神，內而任軍閥專橫，外而任列強宰割，這與我們提倡平民主義的原意豈不大相違反嗎？所謂『發揮平民教育精神』的教育標準只產生這種結果，不是我國教育家所應加以考慮的嗎？

自然平民教育精神，在我國有發揮的必要。不過我們如何發揮？又發揮何種平民教育精神？實為必須認清的問題。爭個人的自由平等，固為平民主義，而爭國家的自由平等也是平民主義。向政府爭自由平等，固為平民主義；而向外國爭自由平等也是平民主義。平和的方法可以實現平民主義，則取平和的方法；平和的方法不能實現平民主義，則不得不取激烈的方法以爭之。不然則平民主義只是破壞國內的統一，無一共同理想相為維繫。

又足減低國際的地位，無國家的資格以與列強講和平。我們已知教育為改造國家惟一的工具，則今後中國教育宗旨應由平民主義趨重國家主義，即由個人的平民主義趨重國家的平民主義，實為目前教育上救亂救亡的要策。若只高唱和平的個人的平民主義，則中國內亂與外患永無肅清之日，實失國家教育的主旨，又何必要教育，更何必說教育救國以自欺欺人呢？

一國教育能有造於其國與否，全恃通國教育均有一種共同的精神貫注其間以爲之主宰。我國教育的共同精神是什麼？耶穌上帝嗎？這是教會學校破壞我國國性的第一大敵，我們再不要認賊作父；是職業生活嗎？這是國民教育的次要目標而不是他的主要目標；是科學知識嗎？這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目的，不是國家教育的共同目的；是人道和平嗎？這是世界最高的理想，而不是我國目前內亂外患交逼而來的國家有倡言的資格的。總說一句，這此理想的教育都不能完全救濟目前危像的中國，真正能救國的教育理想，不但要能增加知識，還要能激勵感情，訓練意志，不但能促進個人的福利，還要能保障國家的安寧，不但要能愛好和平，還要能捍衛正義。實現這種理想的教育，纔能製造國性，發揚國光，以救濟國家。不然，不是破碎不得要領，就是抄襲不切時用。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毫無繼續的努力，你是這樣，他是那樣，毫無共同的目的，辦教育到了這個地步，真是混亂已極，還講什麼能救國與不能救國！

真正救國的教育，首須全國國民至少須直接或間接從事教育的人士，認清國家教育的目的，真正在什麼地方，決不決定實施國家教育目的的方法——國家教育政策，而全國上下一致組織措諸事實，決不輕易變更，照

這樣做下去，不到十年，至多二十年即可以根本改造中華民國，剷除一切強權，而與世界各國居於同等的地位，到那時候再講人道和平，方能實際發生效力。我們果何苦自甘於無國的地步而向人乞憐空講和平嗎？某法將於其被命來中國指揮水兵時，對一個留學生說，中國內亂不絕，致外國不能不派兵的原故，即在太平。我以為今日中國教育的結果不能促進國運的原因，也只在空傳和平和教育的聲浪，以取媚於軍閥與外人，而不知從教育上培植國民，保障和平的能力與勇氣，又何補於國是呢？因此國家教育目的今後必須由空洞的和平的世界主義而趨重切實的，合理的國家主義，而後教育乃有生命與正氣呢。說者謂國家主義的教育之施行，須賴有良好的政府。歷觀各國，無不皆然。今日我國政治紛亂，尚不得謂有政府，教育政策何從統一？此說極是。但我以為有執行的機關，尤須賴有適當的學說。年來我國教育界形式頗為團結，觀念并不一致，倘提倡國家主義，向此中心目標進行，則凡足以危害國家者，人人皆有勇氣以遏止之。而凡選舉守法奉公等等，因有國家覺醒之驅迫在前，自然走上軌道，苟無中心觀念，而枝枝節節以為之，定必事倍功半。是必先有國家精神之教育，以轉移政治，否則好政府且不能實現，況欲待政府以實施國家的教育政策嗎？

關於國家教育政策應如何見解，至關於以國家主義為國家教育目的的要義，不能不略談談以結本篇。第一國家主義的教育在藉教育的能力喚醒國民對於國家的自覺，不要灰心喪氣，不要自暴自棄，以為國家真不可為。國家的危亂，沒有那個國家不經過的，救濟國家危亂的方法，惟在國民均有愛國的熱心而不甘於亡國。這種國家自覺心全國自小學以至大學應急培養，而後國事纔有生機。

第二國家的教育在以教育鼓勵國民，扞衛國家正義的勇氣。我國民近數年來對於國事毫無勇氣，實爲內亂不能停止的惟一大原。軍閥有武力在手，自然敢於專橫，官僚有政權在手，自然敢於肆行；而我國民只靠烏合的羣衆運動與郵電的和平呼聲，真不免以爲誦經可退賊的笑話了。民氣到了這個地步，根本培養振發的方法即在教育。若現在教育長此東塗西抹不痛不癢的下去，則急公好義的民氣何從產生？國家將益敗壞，而無人擁護了。

第三國家主義的教育在以教育培養國民對於國家服務的觀念和態度。我們要一個國家可以存在甚至進步，全靠國民對於國家服務的觀念和態度如何而定。我國民大多數不知國家爲何物，日常只用盡心力於家庭和個人的問題，還講什麼服務國家？而少數智識階級有的迷於國際的和平主義，而不講擁護和平的方法，終成一箇空夢；又有的誤解平民主義而成非國家或反對國家的平民主義。這些觀念，當藉教育的力量，根本改造一番，使知當今的問題是個完全不講國家，或國民對於國家無服務的態度，均不能安然講什麼高尚的理想或主義，更不能達到什麼高尚理想或主義的地步了。

最後我還要附說幾句研究中國當今的教育應否採用國家主義的話。我這篇文章的主意雖在教育目的應由平民主義趨重國家主義，而我却不願國人遽加以贊成或反對。但願教育界從此將他當個問題詳細研究，從世界歷史與現狀，和近代中國歷史與現狀，以探求國家主義在教育上和政治上的變遷後再下斷語，以如此的中國，在世界居如此的地位，我國目前的教育方針應或不應着重國家主義——平民的國家主義，然後設法施行。

至我所謂國家主義與通常國家主義的意思稍有不同，略散見於本文，尙有一文叫做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專論我所謂國家主義的意思，已載本集，可參看。

十三年，一月，南京。

國家教育政策發端

陳啟天

I 國家教育政策的必要

國家爲甚麼要辦教育？這個問題可單簡答一句要以教育建國。中國要以教育建成一種什麼國？這是政治的問題，也是教育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國家教育目的的問題。中國國家教育目的應採何種？所謂「教育宗旨」與「教育標準」是否適合於今日的中國？這兩個問題非本篇所能詳論。不過我可暫且簡答一句，就是中國教育，須由平民主義趨重國家主義，然後教育乃有精神，國家乃有起色。其理我已於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和國家主義與教育兩文大加發揮，此地可不復談。但我們無論定國家教育目的爲什麼，非有一種相當的國家教育政策不能實現。中國現在的教育，不僅沒有相當的國家教育目的，而且完全沒有國家教育政策。自小學至大學，固沒有一貫的精神，而由甲省至乙省，也無相同的理想。教育的實況既如此分歧，國民安有統一的思想？今後教育的急務在認定國家的教育目的，而以相當的國家教育政策實施之。否則雖有目的，也無補於國運。所謂教育救國，是空談可以救國的嗎？又是支離可以救國的嗎？所謂建國教育，更不是支離的空談。做得到的。總而言之，非有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不可。分而言之，則有下列數項：

1 國家教育目的非有國家教育政策不能實現。

2 培養中國的立國精神須有持久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

3 整理教育以改進國度，須有持久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

4 剷除教育上不當的分歧與支離，須有持久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

5 求教育最大的效率，須有持久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

6 挽回教育主權的旁落和防止國民性的摧殘，須有持久與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

由上六項看來，國家教育政策的必要，似爲鐵案，不能爭辯了。不過談到政策的問題，就牽連到政治的問題，中國的政治問題不解決，就不易談教育政策問題。現在國家無教育政策的一個大原因，就在政治問題未解決。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本大法不外兩種：第一爲激烈的革命，可以根本廓清政治上的問題，最爲難能可貴之事。我們教育界縱不能都從事激烈的革命，而對於有主張，有研究，而有操守的革命家，當表示敬意，以愛護立國的種子。第二爲緩和的改進，以求漸次廓清政治的問題。此法似爲當今教育界多數人所信奉，然因有的理想，不切當前的需要，有的措施，只知支離破碎，實難有成效可見。由我看來，即緩和的改進，非有持久一貫的教育政策，也不足以言教育，更不足以言改進！現在的教育界至少應聯合起來決定一種持久與一貫的國家教育政策，竭力施行，總比各自爲政較有效率而能改進。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縱不能望政治家定個國家教育政策，也當由教育家定個國家教育政策。我們不希望現在所謂政府定個國家教育政策，令我們教育界施行，我們教育界當自定個國家教育政策，由教育界自行協力施行，然後教育才有方針有步驟而有較大的結果。

中華教育改進社是合中國各省的重要教育機關而成，如能在開年會時，由全國教育家共同決定國家教育

政策而切實分途實行，或者比徒論教育上的零星問題爲有功用。我並不反對研究教育上的零星問題，但我反對只研究零星問題，而忘却教育上的根本問題，使教育失其主腦而無大益於國家。所以我鄭重希望今夏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議定國家教育政策以立「建國教育」的基礎。

II 中國教育政策要義

國家教育政策與他種政治政策相同，也可分爲集權政策與分權政策兩種。絕對的集權與絕對的分權已不適用於今日。故集權與分權的實際分別，不在性質而在程度，即不在專用那種政策而在注重那種政策。換言之，也可說這個問題是集權與分權的劃分問題，而不是是非問題，即何者應該集權何者應該分權是也。這個問題條目過於複雜，本篇不能詳論，茲且舉出中國教育政策要義兩條以作發端。

第一中國教育當確定「國辦教育」的範圍與維持的經費——我國教育原以國辦高等教育，省辦中等教育，縣辦初等教育爲原則；殊不知高等教育不必盡由國辦，而中等教育與小學教育也不可全讓省辦或縣辦。真正要以教育建國而可得到確實的效果，則國辦教育至小的範圍應如下：

1. 國辦高等學術的教育——我國學術和教育不能獨立，從前依靠日本，現在依靠美國，將來不知依靠何國，這成一種什麼國體？無論何種高等學術都須取自外國，這可認爲滿意嗎？無論研究何種高等學術都須留學外國，這可常常引爲榮譽嗎？我以為中國要能在世界占一位置，須急求學術和教育的獨立，可與外國學術與教育比美，而不出國的大學畢業生和大學院的研究生又可與外國所謂博士碩士的學生齊驅，如此就非建設文理

設備的大學和高等學術的大學。院不可在中國配辦大學的國辦教育機關不過四五個而設有研究所或大學院的只北京大學一校，尚限於中國文史方面而無他種科目。真正的高等教育機關既如此不完備，那里能造出高等學術人才？即有人從外國購買高等學術回來，也因沒有適當的機關可以繼續研究，無從長進，甚至荒廢了。

2 國辦義務教育與平民教育——立國的根基既是國民，則欲定國基，促進國運，非普及國民教育，使人人有國家思想不可。義務教育與平民教育，自以國辦為最有成效，而中國只由少數私人提倡運動，費力大而成功少，非改由國辦不可。縱國家不能鉅款，也可由地方分攤款項，由國家主辦，并監督之。若完全由地方自由辦理，則不知義務教育何年可以普及，而國民思想更不知何年可以統一，將何以挽救目前的危亡！

3 國辦師範教育與模範中學——師範教育操國民教育的命脈，非由國家主辦不能收整齊劃一之功，更不能實現國家的教育理想。至中等教育可以省辦為原則，但各省由國辦一個模範中學，就各省特殊情形從事中等教育的試驗研究，以求切實改進其他非國立的中學，使之有所取法。

至國辦教育經費如何確定，尚待另為研究，本篇可暫不詳。

第三中國教育當嚴定各種教育的標準與考成方法——我國教育無一定的標準，在今日可謂到了極點了。公立學校是一種風氣，私立學校又是一種風氣，而教會學校更是一種特殊的風氣，絕無相同的標準。即同是國立學校，小學教育無一定相同的標準，中學教育也無一定相同的標準，而大學教育更無一定相同的標準，這還成教育嗎？固然過於整齊劃一有礙特殊的需要，而全無共同的標準將可以綜核實效，既好的學校固以無暇

制可自由發展，而歹的學校將敗壞教育貽誤青年不堪設想了。我以為今日整頓教育的要務，嚴定各種教育的標準，無論何種學校須一律遵守，實為一大端。教育的實施可以自由，而教育的標準不可以自由。國立學校固須守規定標準，而私立學校和教會教育尤須遵守國家規定的教育標準。無論何種學校遵守國家規定標準的才可開設，否則必須停閉。教育上不應有所謂治外法權破壞教育的統一。藐視教育的標準，摧殘國民的國性，而釀成媚外的奴性。今日教會教育的結果，已昭昭證明如此。縱然他們對於中國教育有些貢獻，但不足以抵償他的罪過。他們的教育不是中國的教育，是外國的教育，故他們教育的結果，對於外國的多，而利於中國的少。他們不但養出傳教士與通譯生破壞中國的國性與民氣，還養出所謂高才生，為他們辯護以鞏固他們在中國教育上的治外法權。總而言之，無不破壞中國的統一與國家的精神。我們已公認消滅極端殘廢教育的罪惡，而於積極擴充國家教育的教會學校，反有人歌頌功德，未免太怕外人的勢力，而忘却國家遠大的計劃。今後無論何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學校，應先立案許可，而又按章辦理，遵守同一的教育標準，才於中國有實益。

有了共同的嚴格的教育標準，還須嚴格的考成，才能確切收效。中國學校自五四以來，考試制度為人所攻擊，而不敢嚴用，遂使教育無較大的成效。殊不知不經嚴格的考成，不能養成真人才。德法兩國已示我國嚴格考成的好模範，以後須以嚴格的考成，剷除敷衍的的惡習，才易收教育的實效。至如何嚴格的考成，留待他日另論。

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國家主義與國民教育的改造

陳啟天

近兩年來我們爲什麼提倡國家主義？我們稍稍研究世界近代史豈不知國家主義有許多流弊嗎？衆口一詞的都說歐戰是國家主義的惡果，從今以後當是國家主義完全破產的時代，而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因之代起。這種說法是從前過重國家主義的一種反動，謂爲一種理想則可，謂爲一種事實，則爲時尚早，恐全是一種夢想了。我們已習聞美國是大唱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國家了。我國一般留美的新教育家更醉心美國人所謂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在國中大吹大擂而咀咒國家主義了。他們心中以爲中國只要相信美國人的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即可與列強居同等的地位坐講國際的和平。哈哈，這真是笑話了！美國政治上的傳統政策不是門羅主義嗎？門羅主義就是美國國家主義的別名。美國教育論壇上不有所謂『美化主義』(Americanization)嗎？美化主義也就是美國國家主義的又一別名。他們所倡道的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也許有少數學者是出於好意真心，但他們的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有國家主義做後盾，故無害於美國，而反可以外爲國際主義，內爲國家主義的政策，博得中國人的歡心，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我們中國人尤其是留美學生總信了美國人高唱入雲的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而在尚未真成國家的中國也發熱鬧唱高調，以爲國家主義成了過去的骸骨，而當今的孺子只有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了。他們的老師美國恐怕他們誤解師說，於是急忙痛下一針，限制黃人移民，並且中國留學生也要受極嚴格的限制，使得一般留美學生預備隊都着急起來，並且嘆道美國居然也要限制

我們留學生了。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中國夢想和平的人也應大悟美國人口中所謂國際主義就是一種變相的國家主義。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深得老氏此種秘訣。我國人失了祖傳而對於祖國也不肯自謀振作，只知乞憐外人，外人施了些須恩惠如退款興學，即歌功頌德認爲慈父。外人侵奪了中國的教育權在各地自由設學傳教潛移默化中國的人心，而當代所謂教育家者反爲之辯護，我真不懂外國人所謂國際主義是開放門戶機會均等，而中國人所謂國際主義是苦口乞憐任人侵略。外國人已經立定國家的根基，乃談國際主義以謀國家的擴張，而中國人尙未做完建國的工夫，即侈談國際主義使國度益趨於敗壞與渙散。中外國際主義的號召雖同，而國際主義的影響則大不同。這不是我們國中國際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所應當覺悟的嗎？我並不根本反對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我只反對拋棄國家主義而空談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我更不根本反對行了國家主義再談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我只反對未行國家主義即談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我亦不反對以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爲外交上的一種方便法門，我只反對不以國家主義爲當今立國的根本方策。總而言之，我們就世界過去的歷史說，就各國現狀及其與中國的關係說，就中國的現狀與將來的命運說，無一不有提倡國家主義的必要。不過我們所謂國家主義不是侵略主義，也不是帝國主義，乃是內而團結國民力圖建國，外面發揮國性與人同的一種政策。這種主義與從前的國家主義大有分別，故名爲新國家主義，亦無不可。

要求實現我們所謂國家主義，須從政治、經濟與教育三方面分途下手而通力合作。詳細的辦法千頭萬緒，須有政治專家、經濟專家和教育專家依據國家主義的精神分別規劃實施的辦法。規劃國家主義的政治政策與經濟政策，現在尚有志未能。規劃國家主義的教育政策，我已在國家主義與教育及國家教育政策發端兩文中發其端緒。現在且特別提出關於國民教育應行改造的幾點意見陳述如下，以就正於教育界。

一、須確定國民教育的宗旨——現在教育論壇上有人談平民教育，却少人談國民教育，好像國民教育已成過去的古董，無討論之價值了。政府對於國民教育既無何種特殊的計劃，而新學制系統改革令於國民教育宗旨也無特殊的規定，尤其奇特！究竟小學教育本旨如何，不應明示國人使從事小學教育者都一致同此目標進行嗎？七條教育標準只是一種普遍的規定，而小學教育的特殊精神——實施國民教育，製造國民意識，尙應有特殊的規定。否則所向不同，歸途自異，將何以團結國民而有共同之理想與習尚呢？

二、收回國民教育的主權——國民教育的主權應操於國家，而後設施有共同的標準，改進有全部的計劃，易收他應有的效果。而我國小學的主權已由中央委於各縣，各縣不能辦，又聽之私人自辦。於是小學不但全國無通籌全局的計劃與標準，而各縣亦自爲風氣紛歧異常。求其能一致實施國民教育，製造國民意識，眞已成了夢想！除本國人自辦的小學外，又加上外人代辦的教會小學，已有下表之多：

校 別	幼稚園	初 小	高 小
校 數	一三九	五、六三七	九六二

學 生 數	總 計	
	男	女
四三三四	一〇三、二二二	二三四九〇
一五一、五八二	四八、三五〇	九四〇九
三二八九九		

(見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

教會小學既如此之多，而其目的又如何？據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一書中所說，則「教會小學最初設立之宗旨，為宣傳福音。其目的在破除偏見，招致學生父母之信任，並在城鎮中設立一種公認之教會機關，而使人信奉耶教。耶教會團體既日形發達，小學乃得一新責任，兼為團中兒童，籌備一種合於教義之健全教育，俾於兒童易受感化之時間中，造成耶教美德之基礎……」從這段話看來，則教會小學惟一的宗旨在宣傳耶教，製造教民。而於中國國民教育外別樹一幟，此實是破壞我國國民教育之完整，與國民意識之養成，為目前國家分崩離散的一個大原因。如不急於收回此種國民教育權，小學一律由中國人自辦，並不得設有關於宣傳宗教的課程與宗教的儀式，則中國前途將益趨混亂，無法團結統一了。

三、劃清國民教育的責任——我國小學素以縣辦為原則，而委其責於各縣，國家全不過問，何能達到國民教育的宗旨？我意以為國家財政固極困難，然於關係國命的小學教育，應負擔相當的責任，以促進國民教育的實施。國家立一個全國國民教育的計劃書，明定國民教育的宗旨、標準、步驟、責任、考成方法，與獎進方法，而切實施

行。國家所負國民教育的責任縱不能完全以國費設立通國小學，也當劃定經費於各省各縣設立模範小學一所，以爲國民教育之指導機關。再於國立模範小學外，以的款獎進各縣立和私立的小學而切實致察是否合於國民教育的宗旨與標準。國家給與各縣小學的補助費以各縣小學經費爲比例。國費與縣費最好爲一與二之比。國家出一分各縣出二分設立小學。萬一國家無此鉅款也當國家出一分，各縣出四分。關於此種經費問題尙須詳細研究，此地只能表明一個大意而已。

四、釐訂國民教育的材料。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個大大的改變。人人以爲有國家采色的教材太狹隘，不如採用含有世界采色的教材；紀述戰事的教材太慘酷，不如採用歌頌平和的教材較合人道；培養愛國思想的教材太危險，不如培養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贊賞。這種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矯枉過正殊非當務之急。理想過高終亦無法辦到。還不如斟酌時宜，卑之無甚高論，較易見教育的功效，而度過國家目前的難關。因此小學教材不可不重加釐訂，其最要者約可指明如下：

1 言文科內的國語教材須多取自本國，而取自世界者當直接或間接有助於國家思想的養成。無論如何要使國民明了非先建設獨立的國家不能進於世界和平的理想。外國語在小學應以不教爲原則。一來因爲小學無良好的外國語教師，將如基弄堪，一來因爲小學學生應集中精力學會國語完備一種國民資格。其他各科不可雜用外國語教授致失教旨。

2 社會科內的歷史應着重本國史，引起祖國的觀念與民族的思想，萬不宜將本國與世界平列，失却歷史的

重心，文化史固有酌量教授的必要，而國恥史亦不可忽略，使學生全不明瞭本國過去的一切困苦羞辱，而毫不知憤發自振。地理有關於國恥的材料，應盡量編入教科書中，以激勵愛國的思想，萬不可將本國地理與世界地理平列，詳於外國而略於本國，致失我國地理教授的主旨。公民應以養成本國國民爲惟一的宗旨，使小學生明了國民在政治上所負的責任與應具的知能與氣節，萬不可使國民過於苟且柔順，而無一點正氣，或高談世界的理想而忘却切身緊要的责任。

3 體育科應看重雄健的體質之養成，自由活動固重要，而規律訓練亦爲養成國民必要的原素，不可如現在過講平民主義而輕視公共的紀律，全任小學生自由活動，缺乏團體一致的嚴肅精神。

五、改正國民教育的訓練——自平民教育說輸入以來，學校訓練趨重個性的發展，而無所謂共同的理想了。這種訓練的長處在求學生之自得，任其自由；而其短處則有失却訓練的中心觀念，爲全國學生所趨赴以立國民服務國家的基礎。從訓練上發展個性只是訓練的一個目的，而非惟一的目的。與個性發展居於同樣重要地位的，尚有國性發展。發展個性所以求盡個人的特長而貢獻於國家，而發展國性則所以立國家的基礎，使個人有用武的地方。兩種目的在今日的中國須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不然過重國性發展固使個人近於機械，而過重個性發展亦使訓練失其主宰，無相忍爲國的習性。這是國民教育急應改正的一點——訓育目的還有一點也是急應改正的就是訓育方法。現在的訓育方法太隨便，太不嚴格，太任學生自由，似乎有人將小學生當做從心所欲不踰矩的聖人，何能有嚴整的國民訓練呢？我們固要逐漸增加學生自律的機會，却不能完全舍却他

律的權威而任其自治。不但小學生離了他律即陷於危險，而成人離了他律也多墮於罪惡。故他律的方法在訓練上不可過於蔑視。而在國民教育的訓練尤非他律不能養成共同的理想與習慣，這是教育界不可不深加致意的。

我的話說到此地可以告個結束了。國家主義是中國目下必要的一種主張，改造國民教育又是實施國家主義一種必要的方法。如有人說我這是一種胡說與不當的反動，我要勸他仔細研究世界近代教育史，各國教育現狀，中國現狀與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將來的命運如何，或者可得一種較為正確的批評。

十三年九月上海